中国的反右运动



CHINA'S HUNDRED WEEDS

A Study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China

根据印度加尔各答巴格齐出版公司1979年第1版译出

ISBN7－80549－220－4/C·8
定 价： 3.20元

中国的反右运动

【英】纳拉纳拉扬·达斯 著

欣文 唐明 译

花城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鸿
封面设计：韩继勇

中国的反右运动
〔英国〕纳拉纳拉杨·达斯 著
欣文 唐明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787×1092毫米 … 170千字
1989年7月第 … 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49—220—4/C·8

定价：3.20元

内容提要

本书分析了中国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根源，阐述了中国当时的内政和外交背景，追溯了反右运动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作者不仅强调我国领导人在这场运动中的个人作用，也重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是置身于我国的社会环境之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研究反右运动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嫌，故请读者加以鉴别、判断和批评。但是，书中展示的一系列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如：

八十八名章罗同盟骨干名单；
在全国人大作自我检讨人员名单；
一百名大右派名单及言论著述等；

对我国的当代史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前　言

1957——1958年发生在中国的反击右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国内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展开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这场运动打击了从1956年5月宣布的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及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毒草"，导致了中国政策自由化时期的结束。1957—1958年所开展的这场运动，与共产党中国在此之前进行的政治运动不同，斗争矛头并非仅仅指向一种人，虽然基本上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实际上却将全体人民不大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大辩论，以分清"大是、大非"。

研究一场政治运动，自然需要探讨民众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和态度，但就中国的反右运动而言，我却无法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场运动中使用的所有舆论工具都严格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中。有鉴于此，我只得在民众的反应方面少发议论，而将精力集中到探讨官方与右派之间的分歧上。本书除了这个局限，还有别一弱点，这就是困于缺乏历史根据，无法探讨对右派分子的有些指控是否在理。不过我仍然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未来的研究人员们经过持续的努力将会在这方面发掘出更多的资料，由此得出信心充分的结论，也就彻底摆脱了我目前所受到的局限。但在眼下，我仅

希望此书有助于：一、反映在共产党治理七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内情和紧张关系；二、洞察异端邪说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允许存在的限度；三、考察处理异端邪说的方式和动员群众批判异端邪说的方法。不过需得说明，本书并非研究中国的持不同政见问题的专著，因此切望读者不要从中寻求从社会结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广泛角度所展开的对持不同政见现象的议论，否则会大失所望。

本书的蓝本是我向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连书名也未做改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该校中国问题专家加吉·杜德教授的精心指导，她纵览全书，不仅帮助我处理了许多学术问题，而且指点我解决了不少具体障碍。可以说，没有杜德教授的有力帮助，本书的问世是绝不可能的。（加吉·杜德夫人系印度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五十年代中期受聘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六十年代初返国后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八十年代中印关系解冻后曾多次应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和交流，译者1983年曾陪同她访问北京郊区农村——译者）我也应向已故的C.T.胡先生表示敬意，他热情地帮助我翻译了大量的中文资料。

我还应该向印度社会科学的研究协会表示感谢，该协会向我提供了部分资助，使我得以完成前往香港搜集资料的工作。另外，香港联合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和良好的合作，使我得以在短期内完成赴香港的任务；印度世界事务协会及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图书工作人员们的尽力协助，也使我获益非浅，特在此一并

致谢。

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表妹麦娜丝，她专心致志地为本书打完全稿，以及我的妻子莱芭和女儿施乌丽，她们在此书诞生的过程中饱尝了生活艰辛，表现了勇敢精神。

纳拉纳拉扬·达斯

1979年10月 于新德里

目　录

第一章

反右运动的根源

第　一　节

百花齐放及其后果

反右运动的背景是百花齐放与整风活动，而百花齐放的方针则是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的。在他讲话以后，又有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发言，强调要在文学艺术界迅速采取这项方针。早在1956年元月25日，毛泽东就在那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了百花齐放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8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党内外人士。斯诺于1963年问世的《在河流的那一边：今日红色中国》一书曾对此有所报道，现引用他书中原话如下：“在赞扬了全国的大团结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迅速前进之后，毛突然莫名其妙地谈论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这发生在赫鲁晓夫公开诋毁斯大林之前一个月。在同年3月8日于北京举行的全国现代戏剧节活动中，刘少奇特地向文化部党组发出了有关戏剧问题的指示。据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于1974年发表的《文化革命之根源》所载，由红色宣传兵组织所散发的“刘少奇在文艺问题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的传单引了刘少奇当时的指示是，“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不能因为是旧事物就将它一笔抹杀……。百花齐放允许长期共存……。”3月14日，周扬也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说，如果要开展百花齐放，首先应该保留和发掘民族遗产”，这是上书中所载红色批判家组织散发的“请看刘少奇、彭真和周扬是怎样反对京剧改革的”一文中透露的。

尽管毛泽东是在1956年才完整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此方针的前半句他早在1951年总结党对戏剧改革的方针时就提出来了，他当时把这个意思总结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后半句取自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史《春秋》。实际上，该书主要记载孔丘家乡鲁国自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政治事件，也附带记载了其它诸侯国的情况。春秋二字意指春夏秋冬，为逐年记载之意，后竟以这二字表达这一历史时期。据说《春秋》由孔丘亲自编纂，因而受到儒家学派的高度器重，到了汉朝时期更捧到圣典的地步。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司马迁也编纂了一部名为《战国策》的史书（原文如此——译注），是春秋时代结束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这段时间的编年史，所谓战国时期即指这一段时间。那时候，战争和骚乱连绵不绝，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孔丘、老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和韩非。这些学派互相竞争，都想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于是产生了“百家争鸣”之说。

文化革命中透露，周扬曾于1956年8月1日在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发言说，毛主席给加上了后半句话，是考虑到斯大林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遭到了批判。文革中还透露，刘少奇曾于5月13日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发表讲话，

解释百花齐放政策。刘当时说，“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口号最初是由陈伯达提出来的，后经毛主席修改加工，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许多东西最初都不是毛主席想出来的，只是由他进行了加工。”

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并没有公布，但可以从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北京对一群知识分子的讲话看出究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的这次讲话受到攻击，说是“未经许可擅自解释百花齐放的方针。”据《中国大陆报章杂志概览》介绍，陆的讲话认为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为前提的。鉴于毛泽东的讲话原文无从可得，就连文化革命中也未能披露，也就无法辨清这些指责究竟有多少道理。然而，陆定一的讲话毕竟是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新政策的唯一表述，当然也就大体上能够代表毛讲话的意思。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方针？陆一开始就解释说，中国为了变得繁荣富强，除了要有巩固的国家政权、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国防，还必须有繁荣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而为了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繁荣昌盛，就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那么这种方针意味着什么？用陆定一的话来说，这种方针意味着“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方面拥有独立思考、互相争论和创造性工作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坚持和保留自己看法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能否是绝

对普遍的？当然不能，陆的讲话清楚地道明，他所说的自由是人民的自由，而决不是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他坚持认为：“……人民内部必须有民主和自由，但决不能给予反革命分子以自由，只能对他们实行专政。”即便在人民内部，有些问题也是无可争辩的，如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等。但也有些问题是允许争论的，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陆说，因为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论者，他们不仅要坚持唯物主义，而且要反对唯心主义，他们还坚信唯物主义最终会战胜唯心主义。“然而，正因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正因为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和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斗争。”他还坚持认为，用行政措施决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只有通过公开争论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为了促进这种争论。

陆在讲了这些开场白后，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法是三大部分：一、文学与艺术；二、哲学与社会科学；三、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并不具有阶级性，因而其中任何一门分枝学科都不能被冠以“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相应地，无论正统观点或非正统观点都不得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端邪说。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却有明确的阶级性，它们既不能独立于政治，也不能独立于社会。“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有时用间接的方式，有时又用直接的方式来表现阶级斗争。如果以为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与政治毫不相关，或者坚持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片面地看问题，那就是右的观点。”

他不仅否认文学艺术的独立特性，而且明确要求文学艺术作品要考虑自己的表现目的。“至于文学艺术作品，党只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它们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服务。”但陆又说，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作家或艺术家可以选用他喜欢的任何方法。而且他还补充说，尽管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最有成效、最有创造性的方法，他们却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至于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陆定一也没有附加任何限制。对于社会科学，他也没有特别提到应该服务于哪个阶级，但他坚持认为，自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从陆定一的讲话可以清楚看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们完全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压根就不会对此作出任何让步。不过，对于完成这种历史使命的途径，他们心中却不那么有把握。因而他们请教知识分子阶层，寻求后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曾对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无数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议，使之能够有效地安邦治国。所以共产党人相信，知识分子仍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充分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奋斗目标，什么是实现手段，他们需要的是知识分子对实现手段发表见解，而不是议论奋斗目标。奋斗目标早已确立，因而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共产党人还坚信，如果有人执意要非议党的奋斗目标，那通过讨论是完全可以驳倒他的论点的。这就正如陆定一所说，只有通过公开

争论，唯物主义才能最终战胜唯心主义。对于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绝对真理，决不能有丝毫的背离。“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理论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切都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且陆定一已经清楚说明，只要写进了宪法的，都是经由人民大众点头同意了的，不能再随便给予诽议。“人民中间有各种看法，其中有认识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的地方。但我国有一部宪法，每个人都有责任遵守它，这是全体人民的一致认识。”

知识分子对宣布这种新的方针有何反应？就在陆定一发表这篇著名讲话后两天，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代表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欢迎，并分析了新方针的目标和性质。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有党派人士还是无党派人士，毫无疑问对赋予他们的新自由表示了欢迎，但对这种自由的广度又感到迷惑不解。他们担心，万一对新自由的局限理解有误，那将会带来令人不快的后果，因而最初十分谨慎，不敢放心大胆地尝试新的自由。后来又要求对陆定一的讲话发表看法，这更使他们感到困惑不安。于是，由国务院科学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作家协会及各民主党派分别组织了各种讨论会，邀请知识分子参与讨论新方针的作用和意义。自然，许多人是按照报章杂志上的观点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与会者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执行这项方针与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极大发展，但在是否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这场“齐放与争鸣”活动的问题上，与会者中间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基本上有这么两

大派：一是认为应该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另一派则认为使用标准衡量会妨碍人们畅所欲言。这里的分歧实际上是：前者认为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坚信，如果已经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讨论的基础，实际上也就等于已经把其它学派赶出了争鸣场所。在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属于前者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属于后者的有上海《新闻日报》总编刘徽木（音）、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郭沫若的观点充分表现在他发表于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演奏出雄壮的交响乐"一文中，范文澜则是在同年6月11日国务院科学计划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的上述看法。至于刘徽木和彭迪先的观点，均是在同年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于北京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谈出的。郭沫若把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争鸣比作用不同乐器演奏的交响乐，虽然音色各异，旋律却是一样的。他认为：

> 百家争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的交响乐要围绕这个主题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乐曲来，不论千万支乐器如何独奏或合奏，总得按照旋律演奏。

在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20日版上的另一篇文章中，郭沫若还清楚表明将要进行的百家争鸣不同于中国古代那种思想家们为使得自己所代表学派占有一统天下而进行的混战，也不能被视为西方人为摆脱信仰上的疑惑和表达

对知识的渴望而进行的欧洲文艺复兴之类的运动。他认为：

>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百家争鸣既不同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的百家兴旺，也不同于文艺复兴中的学派丛生。说得具体点，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是各种学术领域内的社会主义竞争，或者某一特定学术研究领域内的社会主义竞争。我们并非为学习而学习，为研究而搞研究，我们清楚明了的责任是要建成社会主义。

刘敌木发表的观点恰好与郭沫若形成尖锐对立，他说：

> 把这比作交响乐队是相当不恰当的，一个交响乐团安排不同的乐器同时演奏，在听众来说总是和谐一致的。但在学术争论中，难免会产生互相矛盾的观点。郭院长似乎是想施加一些消极的限制，本人对此很难苟同

彭迪先也发表了与刘敌木类似的看法。

然而，这种争论因同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得到了部分解决。该社论向"争鸣者"保证，即使其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也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该社论却小心冀冀地避而不答是否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用社论的原话即是"…该由争鸣者本人决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论点的基础，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明辨是非"。

尽管一方面存在着这些疑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局限，百花齐放的方针毫无疑问给知识界带来了重要变化，人们不再认为知识只能属于某个国家或某种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们继而宣称，即使从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有东西可学。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事业发展很快，并表示了从中学习的意愿。除了科学，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也被视为值得学习。郭沫若发表在《人民中国》1956年第17期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万岁”一文中有这样的词句：“最近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取得了新的进展，我们应该乐于向它们学习。我们应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古典作品和当代作品，研究他们的唯心主义理论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甚至还公开地批评那种机械地模仿苏联而不问苏联的模式和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作法。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中是这样说的：“然而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法机械地模仿苏联的一切。”这样看来，新的方针完全打开了知识的大门，大大拓展了各种创造性研究工作的范围。于是掀起了一阵热情翻译外国书籍的高潮，也不问书籍的出版国别，只要值得借鉴就进行翻译。各出版社也相继宣布自己的翻译著作出版计划，所涉及的学科是应有尽有。1957年实际出版的译著中有：门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美国当代学者巴斯教授的《胚胎学》、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东尼·梅勒的《语言史比较方法》、美国数学家斯特鲁克的《简明数学史》、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

集》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据郭沫若在1957年7月5日于人大常委会的讲话透露，当年国家计划用于进口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书刊的外汇达180万英镑，而前一年的整个外国书刊进口只花了60万英镑。对进口外国书刊的拨款增加如此之快，说明中国已经放弃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持偏见，至少在知识获取方面是如此。

令人瞩目的第二大变化是开始焕发出一种重新评价文化传统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夺取政权后，执行了一种凡是认为属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遗产均一律加以取缔的政策。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的大部分文化传统都含有封建主义遗迹或资本主义味道，因此不能赦免。仅在1951年元月至12月，上海一个城市就将237吨书籍化为纸浆，而1953年5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内，汕头市焚烧了30万册图书。陆定一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与自己的文化作对，却强烈批评了那种贬低民族遗产的倾向，还提醒人民说，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认真地研究和批判地吸收。”这种政策上的转变立刻唤起了一阵翻译和注释古典著作的热情，北京为此还在1956年6月新成立一家出版社，专门重版古籍中的珍版本。仅1956年就有180种中国经典著作问世，其中包括历代名人学士的佳作，特别是清初著名学者的名著，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孙中山的著述。工艺、美术、音乐方面的重视情况也是如此。1957年5月14日，中国画院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作为中国画画家们的活动中心，鼓励各种风格的画派进行创作，组织对他们创作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商讨。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也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全中国的首家此类学术机构，推行宗旨也与中国画院相似。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演的不少传统京剧剧目，现在又重新搬上了舞台，如曾经受到极大欢迎的《谢瑶环》和《二郎探母》即是如此。

第三个特点是承认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并且明确向科学家们保证，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任何一门理论都不可被叫做“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新方针也就明确地赋予了科学研究一种恰当的地位。科学家们在确知自己的工作今后不会被扣上帽子之后，开始由衷地献身于“科学的神秘世界。”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们不仅消除了科学家们心理上所遭受的持续重负，而且还努力消除科学家们寻求知识道路上的物质障碍。1955年年底，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曾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1956年元月，中共中央专门在北京举行特别代表大会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与会者有1279名，全是省级以下党委、各有关部门、教育机构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周恩来总理于元月14日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他敦促说，为了更好地将全国知识分子的才能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应该尽快消除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隔阂，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树立起新的信心，并且认真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即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参考资料和研究设备，增配助手和提高工资等）。毛泽东在向大会致闭幕词时也号召党员们，“联合党外知识分子，以便迅速赶上国际先进的科学水平。”这些工作已经明确了改善中国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必要性，现在的百花齐放政策又进一步将这种必要性变为切实的行动。于是，科学家

们获得了迫切需要的书籍、参考资料和其它工作设备，进口外文资料的资金也有了大幅度的追加。科学家们还受到鼓励，要他们同外国的科学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仅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就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60个学术代表团，同期派遣了16个代表团前往10个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科学家们除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外，还开始获得了以金钱形式颁发的奖励。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首次设立了一套奖励办法，次年元月即对34项自然科研成果颁发了奖金。除了鼓励科学家们更积极地投身到科研活动中外，还制定了一个为期12年的科学发展综合规划，时间跨度是1956至1967年，包括的主要项目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新型电子技术研究、喷气式动力装置研究、生产自动化流程研究、精密仪器研究、石油及稀有金属储量勘探、矿藏资源开发、金属冶炼、燃料及重型机器的研究与开发、整治黄河与长江的技术问题探讨、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使用问题研究，严重疾病研究，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1956年的财政预算拨付给科研的经费陡然增长，比前一年增加了2.3倍，同时建立了农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两大机构，另外还建立了不少的研究所。到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数目已增加到68个，而1955年底只有47个。与此同时，还大量出版了各种科学著作。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是全国最大的专门出版科学著作的企业，该社曾宣布1957年出版两倍于头年的科学著作，其中包括不少的国外译著，仅中国科学家的著作就将增加到3倍。百花齐放的方针宣布之后，还新创了许多科技刊物，也向侨居国外的中国科学家们发出了邀

请，要他们回来服务于祖国。接到邀请后从美国返回的科学家中包括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音)博士，核物理学家张文玉(音)博士、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音)博士。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包括文学艺术领域的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阵为时虽短，但却是自由活泼的浪潮。有的共产党人曾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这种作法受到了陆定一的明确责问。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喜欢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研究垄断起来，他们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这是极端危险的。"对党员的这种尖锐批评具有自责的意味，同时也暗示要能容忍他人的不同看法。因此，他们说的话不一定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解释，知识分子也就敢于指出他们说话中可能具有的错误，这样看来，党员干部过去享有的在一切方面自己说了算的权力无疑受到了削弱，还不得不为过去说过的错话遮掩。而过去就如"达摩克立斯宝剑"一样使知识分子胆颤心惊的干部指示，自然就不那么风行了。知识分子于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以较为自由地谈吐而不会被人指责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疑虑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大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新创期刊突然问世，有些原有杂志也焕然一新。不少的著名学者借助这些园地针对各自领域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表达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在文学艺术领域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文学艺术上的唯心主义、美学问题，以及中国历史的周期性等。这些争鸣活动有学术机构组织的，也有政治团体筹办的。知识界掀起热潮的另一证明即是大专院校招收新生数目的大增和公共图书馆的层出不穷。

第 二 节

国际形势及其影响

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是否是推行百花齐放方针的唯一目的？这种较为放宽的政策是否纯出于国内的需要？从这项方针宣布的时间看，人们不能不满腹狐疑。仅在两个月之前，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震惊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也不禁使人想到中国的新方针是否与此有关。费正清等人曾就此评论说，决定转而执行百花齐放方针的重要因素可能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的过分专横行为。而且，周扬也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后半句是出自受了非斯大林化的启发，这一点十分重要。另外，有些学者还发现百花齐放与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艺"解冻"颇有相似之处。确切说来，苏联的文学艺术解冻或自由化始于1954年5月，即伊利亚·奥伦伯格的中篇小说《奥杰别尔》的第一部分由文学杂志《旗帜》首次刊载，后在1956年4月号连载第二部分。该小说后于1961年由曼尼亚·哈拉里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改名为《解冻》，所谓

"解冻"一词即由此而来。美国学者福克马所著《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影响》一书对此多有详述，并将苏联的"解冻"和中国的"百花"之间的异同做了细致比较。另一位学者普利比拉也在其《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经济》一书中说，"从表面的情况看，百花齐放相当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解冻文学。"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说明斯大林不死，中国就不会实行政策放松，但考虑到周扬的说法，大体可以认为百家争鸣是后来决定加上去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观察中国对斯大林遭到攻击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第一步是1956年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不加评论地刊载了《真理报》同年3月28日的社论译文，题目是"个人崇拜为何与马列精神格格不入？"这篇社论集中攻击了斯大林其人。紧接着于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看得出这是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长时间酝酿的成果，且发表在米高扬前来北京签署经济援助协定的头一天。这篇政治局的申明对斯大林进行了审慎的评价，一方面指出了他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贡献。斯大林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文章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在自己的后半生中日益大搞个人崇拜，因而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准则。他将肃反问题无限扩大化；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夕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他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生活；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了某些错误的政策，对南斯拉夫的作法尤其错误。在斯大林的所有这些缺点中，个人崇拜问题是文章集中议论的中心。文章

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坚持反对抬高个人、漠视群众的作法，认真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一贯依靠群众的聪明才智。

紧接着4月5日的声明，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长篇谈话，专门论及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为当时和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这篇谈话的题目叫做“论十大关系”，是同年4月25日对政治局扩大会议讲的。毛在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理出了十个大的问题，并解释为十大矛盾关系。他们是：1.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5.中央与地方的关系；6.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8.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9.正确与错误的关系；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篇讲话的内容当时既没公布，也没以任何形式披露，直到两年后的1958年5月才在刘少奇的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首次提及。被当时的与会者记录下来的毛泽东讲话全文，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披露出来，收集在一本毛主席指示中，既没标明发表日期，也没有安上原文题目。但仍被美籍华人学者杰罗姆·郑首次译成英文，附在他的《毛》一书中于一九六九年在美出版。那本主席指示的小册子只是说该指示发表于1956年4月，4月25日这个具体日期则是在《文艺红旗》1976年5月号中的“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一文中透露的。而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毛最初讲话20年之后的1976年12月26日，以纪念毛泽东83周年诞辰，后被收入毛选五

卷。毛的讲话和政治局的声明一样，对斯大林其人作了评价，既指出了他的错误也承认了他的功绩。毛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还认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据他说，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其根源都在斯大林。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让我们推进革命，担心内战会打起来，会冒中华民族毁于一旦的危险。继而真的打起来了，他又对我们抱观望疑虑态度。最后我们打胜了，他竟怀疑我们赢得的是铁托式的胜利。在1949年到50年期间，我们的确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通读毛泽东的讲话全文，令人感到他的用心是脚踏实地的，他要提醒人民别再重复苏联所犯过的错误。这些错误是：1.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2.用义务交售等办法以低价从农民索取太多，对农民榨取过多；3.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捆住地方的手脚，不给任何独立行动的权利；4.在国家的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不良关系。

就正如文化革命中披露出来的那样，毛在两年后曾就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他于1958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地方干部会议上说，1956年批判斯大林，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担心。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消除压力，解放思想，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把人打死。也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与错误界线作了划分，认为要尊重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据

他说，有两种个人崇拜，一是正确的，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正确一面的崇拜。我们要尊重这种崇拜，永远尊重这种崇拜……还有一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也就是不加分析、盲目地遵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搞个人崇拜，而在于崇拜的个人是否代表真理，如果你代表的是真理，就应该尊崇你。要是不代表真理，集体领导也没什么好的。

正当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正在为重新评价斯大林倍感惊异的时候，内部却爆发了两场大的骚乱。波兰工业中心波兹南的工人们于1956年6月28日首先发难，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和允许更大的行动自由，并表示了对苏联的敌视。虽然镇压了骚乱，采取了善后措施，但民众仍然不服，一边要求撤掉亲苏的国防部长拉科索夫斯基元帅，一边要求为哥穆尔卡恢复统一工人党党籍。哥穆尔卡原为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48年9月因被指控为犯有铁托主义罪遭到解职，1949年11月又被赶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从1951年到56年4月一直身陷囹圄。最后在1956年10月21日，拉科索夫斯基元帅终于被迫离开波兰党的政治局，哥穆尔卡也取代沃查勃重任党的第一书记。与此同时，以裴多菲俱乐部为首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也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同年7月，斯大林主义分子拉科西被迫下台，他的执政党书记职务由杰罗取而代之。随后的政局发展迅速，匈牙利前总理纳吉又被恢复党籍。纳吉是在1953年7月拉科西辞职后接任总理的，可只干到1955年3月4日，匈牙利党中央就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纳吉具有右倾主义、动摇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态

度，还批判他对富农发善心，不积极发展集体农庄事业，以及否认党的领导作用。由于纳吉拒绝承认错误，终于被赶出中央委员会。除了纳吉之外，匈牙利前外交部长拉兹洛·拉吉克的遗体也被重新安葬。拉吉克曾被指控长期和铁托过从甚密并接受后者的指挥，后来在受审中他承认了这些罪责，于是在1949年10月被判处死刑。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到当年10月23日，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走上布达佩斯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拥护纳吉的口号，要求苏联撤走军队、举行自由选举，当晚就把总理黑格都斯赶下了台而让纳吉取而代之。到了10月1日，纳吉政府公开宣布匈牙利不再参加华沙条约国组织。

中国是如何看待东欧的这些事态发展的？总的说来，中国承认波兰和匈牙利人民的不满情有可原，认为两国政府应该为此受责。苏联曾发表过一个“关于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及进一步加强友谊与合作的宣言”，1956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就苏联的这个宣言发表声明说，波兰和匈牙利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和物质条件是完全合理的，《人民日报》同年11月10日刊登一篇长文，历数了匈牙利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是反对苏联强加的拉科西这样的领导人的，他倾向于受人欢迎的卡达尔等人。他对拉科西政府的独断专横尤其不满，曾说过这样的话：你禁止人民罢工、请愿，禁止人家发表不同意见。遇到什么事都只能靠镇压解决，到头来只会变成拉科西。毛泽东还反对东欧领导人盲目模仿苏联的经验。

如果说中国领导人批评了波兰和匈牙利政府不善于处理

人民的斗争目的和生活抱负问题，那么，他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和误解"。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暗示，是苏联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平等的原则，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成员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办法。中国的声明中有这样的话：

> 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忽视了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的原则，这种错误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大国沙文主义。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会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共同事业。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内容为基础，写成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是中国对东欧的事态发展发表的首次官方声明。这篇长文指责了斯大林的老子党态度和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文章说，总之，在与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帮助了他国人民的斗争，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但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他又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待人精神……。中国在此所企求的是保持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恰当平衡，一方面避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面避免个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未来关系中，只要大国避免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小国避免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无疑将会得到加强和改善，这两方面都是同等重要的。

后来在中苏关系公开决裂以后，人们才发现中国曾对波兰和匈牙利当时的情况做了明确区别。中国支持苏联干涉匈牙利的事态发展，但并不同意苏联介入波兰事件。根据中国的看法，波兰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继续拥护华沙条约和与苏联的友谊。匈牙利的情况与此相反，既有反革命分子插手，又有纳吉政府背弃华沙条约。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1963年9月6日联合发表的《我们与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透露，苏共领导调集军队，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同志就范，这就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另据伦敦电台"世界广播内容综述"节目1956年11月29日报道，哥穆尔卡承认他上台得以阻止苏联对他国家的干涉，而这一切都多亏了中国。他还强调说，历史事件已经证明中国是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朋友。"

那么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是否也担心自己国家也会发生这种动荡呢？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根据可资证明，不过，他们倒是担心过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有可能利用东欧发生的事件。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中国会有那么一些人乐于听到匈牙利发生的骚乱。这些人会对匈牙利事件感到高兴，他们盼望中国也能发生类似事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反对人民政府。毛的这番话是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讲的，讲话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0年后收入《毛选第五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一方面不希望看到苏联的力量削弱，另一方面又坚持批评苏联的某些行为。中国主张各国独立自主，但不能同意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或社会主义集团统一的瓦解。然而

无论如何，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事件还是对中国持续进行的有关百花齐放方针的争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有些人以此说明，对人民的理想和感情压制过多会导致民众的抗议，因而更加热情支持这项放开的新方针。另一方面，责备这项方针的人则指出，既然有可能导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类的麻烦，那就应该尽早关上刚打开的自由闸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并不为这种批评所动，他强调说："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骚乱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至多是一小撮人到处闹事，要求所谓的大民主。大民主并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中有的同志对此感到害怕，我看没什么可怕的。"

第三节

党的八大与两类矛盾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仍然决意要推行百花齐放的自由方针，这有1956年9月通过的中共八大决议为证，也可以从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看出。在八大决议中，百花齐放的方针被再次强调为党为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发展的指导路线。其次，共产党还恳求全体人民的支持和合作，而不论其所属党派。共产党已确立了与其它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的。因而，所有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以及全体共产党员都被要求与他们的非党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三，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比以前更加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在1945年的党章中曾使用过的"毛泽东思想"一词被取消了。据1970年伦敦普雷格公司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演进》一书所载，1945年的中共党章宣称："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中共八大党章规定了更大的党内自由，也为集体领导制引入了更大的弹性。这部党章的第六自然段第三条允许党员在不同意党的任何决议的情况下，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或向党的领导机关陈述自己的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各自的权限，地方上的问题得以由地方党组织加以解决。党章第二十六条还规定，如果上一级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不适合有关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下级党组织可以说明自己面临的困难。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散发的《彭德怀的罪恶历史》的传单透露，中共八大党章之所以要取消“毛泽东思想”之类的说法，是因为党中央内部的反对派别施加了压力。该派别以彭德怀为首，传单说他在文革中承认：“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上是我建议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我一提出建议，刘少奇就表示同意，他说我们最好还是把这几个字删去，并说他反对搞个人崇拜。”

然而，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们清楚地明白，仅仅有较为自由的方针还不足以防止匈牙利或波兰之类的事件发生，还必须采取其它措施来治理近年来党政机构内部出现的舞弊现象。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承认，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和道德沦丧的倾向已有相当发展。因此，党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舞弊现象。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向人民解释共产主义世界最近的事态发展。所以，由毛泽东本人出面作了一次较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表述，以驱散笼罩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上空的阴云。这就是他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全会上的讲话，讲话全文直到1957年9月18日才正式公布，但在此之前已有

他的片言只字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他的这篇讲话成为后来于同年3月5日至2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也是3月6日至13日举行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讨论重点。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也就此专门举行会议进行学习讨论。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全文后来经由自己修改，在6月18日由新华社加以报道，次日由《人民日报》给予转载，标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最初透露出这篇讲话的内容的，却是4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据这篇社论说，毛认为虽然中国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原文如此——译注），而且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基础深厚的团结，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就消失了。与此相反，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为这对矛盾的发展是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篇社论特别谈到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并就此责备了党政机关。社论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思想观点，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尽管《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的观点都出现在了后来新华社公布的毛泽东的讲话全文中，但全文中有些东西却是这篇社论所没有的。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本书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详加讨论。这里只略提几点。首先是全文中强调了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还举出例子说，如果不实行团结、批评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其次是全文对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确立了一些限制，即提出了辨别“香花”或“毒草”的六条标准。这方面的正确言行应该是：

> 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他们；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不是有损于它们；3.有利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削弱或破坏这种专政；4.有利于加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削弱或破坏这种集中制；5.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国际社会主义的团结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再次，全文认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其危害性大于教条主义。

有关矛盾的概念并不新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一切事物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中的对立运动所做的典型分析，在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和列宁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概念。恩格斯说过，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他在这里所指的运动，并非机械运动那样的简单运动形式，而是要深刻

得多的复杂形式。他还说，如果简单的机械性位移已经包含着矛盾，事物的高级运动形式就更是如此，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尤其是这样。而列宁也把矛盾的法则称为辩证法的核心，他说过这样的话，可以恰当地说，辩证法就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矛盾的研究。

毛泽东也并非到了1957年2月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的，早在20年前的1937年，他本人就系统性地表述了矛盾的概念，这就是他所著的有名的《矛盾论》。而他1957年2月27日讲话不但完全符合他早年阐述的基本原理，而且可以说是将这种基本原理运用于新形势作出的细致分析。只是，这一分析过程中，他有了自己的创新，这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最初是由列宁提出来的，但他本人以及在苏联的继任人们都从没有承认过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产生对抗性矛盾。当有人问尼基塔·赫鲁晓夫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一新理论时，他完全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1957年5月28日接受美国电视记者采访时说的，采访全文刊于5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上。另据霍华德·克兰克肖所著《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新冷战》一书披露，在1960年6月7日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曾表示俄国不能同意百花齐放的方针。关于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产生对抗性矛盾的看法，毛泽东曾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发表过评论，他大概是说，苏联强调统一，也就不谈矛盾，尤其不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在1957年3月12日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

又发表了一次思想政治宣言，但这次的讲话全文直到1965年4月才公布，收于《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出版。据说当时参加这次会议有380名党员干部，和100多名在各条战线声望卓著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再次确认党要忠实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批评了有些同志认为这一方针会导致全国性骚乱的看法。他甚至为过去的花卉稀少感到遗憾，并请人们畅所欲言。他还告诫说，切不可用粗暴的、强迫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以及宣布党中央决定该年就要在党内进行一场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批评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的三种错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尽管毛泽东只是到了1957年3月12日才宣布要在全党进行整风，人们早就感到有必要整顿党的工作中逐步出现的缺点错误了。还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上，毛在开幕词中就特别指出党的工作有三个缺点：

> 我们许多同志的立场观点和工作作风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这种立场观点、这种工作作风使我们脱离群众……必须依靠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来加以认真纠正。

刘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也提醒人们重视这些缺点，并号召大家加以整顿。但据《中国青年》1957年2月号登载的“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透露，中共领导人们那时候

还没打算立即就进行一场全国的整风运动。那篇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话：

> 中央最近决定从1958年起开始在全党整顿工作作风，而在今年内，各地党政机关应该着手学习党的八大文件，特别是学习下面六份文件：1.改造我们的学习；2.整顿党的工作作风、3.反对党八股；4.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5.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6.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另据《人民日报》1957年2月17日所载“发扬党的整风学习的经验”一文也可以得知，在毛泽东正式宣布党要进行整风之前，全国有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已经开展了地区性的小规模整风运动。这篇文章的作者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在报告该省整风运动的进展时提出了三点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整风：1.新入党的同志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2.需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3.有必要纠正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

在决定要对全党的工作作风进行整顿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究竟是做的什么打算？据新华社1957年4月30日报道，中国领导人们公开宣布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便能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然而，随之而来的反击右派事态的发展，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否真是整风运动的目的。《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分

别发表于1957年6月22日和7月1日，头一篇的标题是《不平常的春天》，第二篇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前者中，《人民日报》作了如下评论：

> 根据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风暴而不是温室中得到提高的原则（毛主席曾经反复重申过这条原则），党决定目前不进行反击，让群众能够认识其真面目，以便从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

7月1日的社论就讲得更具体了，该社论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及其它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期间都竭力避免对"错误言论"进行反批评，目的在于让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自由争鸣"，让毒草充分生长蔓延，以便让群众吃惊地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些东西，才会采取行动加以清除。从这篇社论看，人们或许会争辩说政府简直是在为粗心大意的反对者们设置"圈套"，而且还可以说，中共有意推迟发表毛泽东2月27日和3月12日的两篇讲话，目的也在不让人们知晓新自由的局限，以便让他们盲目地越过雷池，钻进早已设好的"圈套"。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圈套"问题上，各国学者已发表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如汉学家G、F、胡德逊教授在1957年9月9日的《新型领导人》杂志上发表了"百花齐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译本及注释"一文，他在自己作的注释中评论说："让共产党领导们有意地鼓励右派分子充分暴露，以便能够获得对他们采取行动的借口。"另据新闻记者亚诺

什·拉德万尼发表在《中国季刊》1970年秋季号上的"匈牙利革命与百花齐放运动"一文透露，他曾于1959年5月随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毛泽东在会谈中说，自苏共20大以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视国内的右翼活动情况，而要将他们从藏身之地引出来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充分进行百花齐放运动。然而，埃德加·斯诺却在他的《在河流的那一边，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持不同看法。他是这样评论的："可以肯定，领导人们搞"齐放"的真实意图在于引诱'有用的'知识分子们发牢骚，继而给予安慰，最后把更多的这种人接纳到党内。"

我认为，经过细致分析，所谓"圈套"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我们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拥有自己的藏在暗处的敌人，也很难看出有什么特殊原因能促使共产党领导人们敢于在这关键时刻想着法子把敌人给引出来。因为某些反政府的倾向当时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了，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就提到，在1956年中中国曾发生多起罢工和示威游行。即便我们承认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清除自己的敌人，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匆匆忙忙地铤而走险，置政府于更易遭到反对的境地。与此相比更有可能的是，共产党中国领导人们在1956年和1957年初正热心于让反对派发发牢骚，再给予安抚，以便最后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有目的地引诱反对派跳出来大现原形。至于说到《人民日报》那两篇社论的含义，则可以解释成整风运动刚开始那几天党政部门就遭到了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批评指责，这完全出乎领导人们的意料之外，也倍感震惊，于是才决定暂时不进行反击，

以便让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后才慢慢来收拾他们。

至于毛泽东那两篇重要讲话的推迟发表，也是不难解释的，根据观察发现，这种现象在中国并非什么异常情况，毛泽东1956年5月2日那次宣布实行百花齐放方针的讲话也是后来才公布的。在这个方面更为相关的问题倒是，不让人民知道新自由的限度是否是由领导人们有意策划的？有的学者猜测，后来发表的划分正确批评与错误批评的六条标准在毛的最初讲话中是没有提到的，持这种看法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他1960年所编《百花》一书）和丹尼斯·杜林（见他发表在1961年8月号《中国季刊》上的“百花运动的复兴”一文）。鉴于毛的讲话和权威性原稿无从得手，无法将讲话原稿与后来的发表文本相对照，也就只好依据其它的资料来探索实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初民（音）曾于1957年2月27日亲身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在同年4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写道，

> 毛主席指出毒草的生长并不比香花少，只能靠农民每年去除；要毒草不长出来是办不到的，但长出来了可以给锄掉。他还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应该受到批判，不批判是不行的。反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受到批判，要不我们就会犯错误。

从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对什么是正确的批评、什么是错误的批评是划分了界线的。他当时或许没能象后来

那样使用好几句话来阐明六条标准，但是却清楚地道明了什么样的批评是受党的领导人们欢迎的。还有其它的证据可以说明，知识分子们事先曾得到过指教，在提出批评意见时如何才能避免错误。《人民日报》1957年4月曾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们下述忠告：

> 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政治错误；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免受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

1957年5月25日，“齐放”和“争鸣”活动正处高潮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亲自发出警告说，“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行都必然是错误的”。因而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中国领导人们并没有借助于让对手对新自由的限度感到迷惑不解，而有意为他们设置圈套。

如果说“圈套”理论并不能成立，那么中共的整党决定是否能出于对改革的迫切需要？如果人们还稍微记得党作出要整顿工作作风决定的背景，那就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全国到处都在滋生着不安因素，党正在日益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例如毛泽东自已就曾说，

> 1956年，在个别地方产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些物

> 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在谈到农业合作社问题时，毛泽东也在同一次讲话中指出：

> 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之所以要搞整风运动，完全是迫于要消除党和人民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摩擦根源的需要。然而，党的领导人们既不会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敢公开承认他们实行的这套制度有些毛病。所以，他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以便把造成国家所有弊病的罪责推卸在它身上。如果说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为解释这些弊病提供了理论武器，那么党政机关的腐化现象就正好充当这样一只

替罪羊。因而党的领导人们希望通过揭批下级党政官员的弊端行径来掩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也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现在还很难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修改早期决定而把全面整风运动推迟到一九五八年，但极有可能的是国内存在着的日益骚动不安迫使他们希望尽早开展一场较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否属于全党一致的决定？或许并非如此。1957年元月7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作者们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四位党员，又是高级干部。他们在批评百花齐放的方针时强调，该方针导致"毒草"太多，在文艺战线尤甚，因而强烈主张就此收场。或者至少要加以限制。这是第一个说明并非全体党员都同意新方针的迹象。但仅在十一天后，毛泽东本人亲自站出来为百花齐放方针辩护。他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除，一年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除了毛泽东的批评，《人民日报》本身以及某些要人和读者也针对上述四名军队干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当时发表的这方面文章计有：1957年3月1日郑燦（音）的文章，同年3月18日文化部长茅盾的文

章；同年4月4日读者来信综述；同年4月11日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采访录。而最为重要的是该报4月10日专门发表社论驳斥这四位军队干部的批评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话：

> 党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实际上并不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片面地搜集和夸大了某些反面例子。以便用它们来证明这项方针的性质是危险的，以便用来向党建议应当尽快改弦易张。

党内在新方针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另一个迹象是公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科学院1957年7月召开了一次“反右会议”，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在会上指责同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说他曾经讲过，由于刘少奇和彭真推行反对这项新方针的路线，全国鸣放得并不令人满意。麦克法夸尔在其《文化革命之根源》一书中也赞同这种刘、彭反对新方针的看法，并说他发现了中国领导人在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问题上分为了两派。他认为一派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另一派就是刘少奇和彭真等人，按他的说法，前者主张进行公开的整风，后者要求将整风运动局限在党内。他还坚持认为，是刘少奇最后迫使毛泽东迅速结束了这段自由开放时期。米勒·戈德曼却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在1974年秋季号《中国季刊》上发文说，领导集团的确分为了两派，但不是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而是在大跃进之后。我本人倾向于同意戈德曼的看法。如果说《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的社论确实证

明有些党员坚信百花齐放方针会为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那么，却根本找不到证据来说明党的最高领导层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无论刘少奇还是彭真都从没发表过对新方针的异议。刘本人在向党的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甚至说，“在解决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问题时，党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应该鼓励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至于彭真，非但没有对新方针发表异议，反而为“鸣放”得不够感到有些遗憾。他在1957年4月22日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百花还没有齐放，百家还没有齐鸣。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大胆一些”。

第 四 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动员

中共中央是在1957年4月27日正式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的。该指示说，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改正党的工作作风中的三个缺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两篇讲话：一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二是1957年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据说这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在于"本着团结的愿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的指示要求人们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给予保证说，有错误的人将会免于纪律处分。所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非党人士如果愿意参加这场整风运动，也是党所欢迎的，但参加后不受限制，可自行决定何时退出。

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并非头一次尝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四次整风。第一次是最为重要的，开

展于1942年；第二次是1947至48年；第三次是1950年；第四次是1951至54年。第一次整风的时候，中共党员们被要求积极行动起来克服三种缺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党组织内部的宗派主义，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形式主义。根据波伊德·开普顿所编的《毛的中国：党的整顿条件》所载，上述缺点主要表现在党的高、中层组织和高、中级干部中。1947至48年的整风则着眼于党在乡村中的基层组织，主要目的是消除思想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贯彻党对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方针。1950年的整风是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为主要敌人，整风的范围比前两次都广，原因是不仅要纯洁共产党员，而且要教育国家机关内部的党外人士。时间最长的要数1951至1954年的整风运动，大概是由于与"三反"和"五反"运动交织在一起，不过基本目标仍然是很明确的：纯洁党的基层组织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

尽管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们自1942年以来就把整风作为定期净化党务机器的工具，他们却从没想过有必要寻求党外人士的帮助来解决党内事务。阿瑟·科恩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就曾说过"毛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以便有助于党的整风，这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还是史无前例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1957年邀请党外人士站出来挑剔共产党员们犯下的错误呢？或许可以作这样两种解释。其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经过7年的执政，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建设新中国，需要的不是党外人士的离心倾向，而是同心同德；而要让他们与党同心同德，就必须重视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

其二是全国各地日益增长的不安因素已使领导人们确信，非常有必要用鼓励人们向党发牢骚的办法来重新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以便扼制匈牙利或波兰之类事件的爆发。不过，稍加细致分析就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解释之间有联系，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解释。如果说力争非党人士与党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科学先进的国家所必需，那么也必定为国家的和平安定所必需，因为正是党外人士中的不信任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离心倾向促成了人民中的不满情绪，也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不稳定。

中共借助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也就使1957年的整风运动增加了新的特点。整风不再只是党内事务，而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这种新的特点对于党来说，既意味着新的责任，也意味着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有责任做到要么接受党外人士的意见并采取相应措施，要么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来反驳对方的意见。党如果履行这种责任欠当，那就有可能使自己受到玷污，也有可能使国家产生动荡。如果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进行整风的指示还没有规定党外人士必须参加这场运动，那么后来发出的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就把所有领导人们全部纳入了整风的范围。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10日发出的这项指示要求党内党外干部和担负领导职责的知识分子必须参加体力劳动，以便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人为障碍”。干部们在参加这种劳动的时候，要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党的领导。对于党外人士来说，这意味着接受集中的学习和教育，而学习与教育是历次整风的运动共同特点。

这次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1957年5月1日开始的，《人民日报》正是在这一天发表了党中央关于进行整风的指示。整个整风活动基本上是以争论和讨论的形式进行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特地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些无党派的著名人士参加。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不同层次的讨论会，与会人员也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

就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名人对共产党进行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批评的时候，年轻一代中间却闹起了一阵反对党的鼓噪。具有五四运动革命传统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领导过几次学生运动的北京大学，这一次又一马当先，充分利用起"鸣放"的机会来。该校的学生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抱负和沮丧心情，还道出了整个中国大学生们的生活目标和痛苦心情。成百张攻击党的好几项方针政策的大字报和讽刺党员干部的漫画贴满了饭堂、宿舍、餐厅和教室的墙壁，还举行了好几百次公开集会来批评党的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学生们感到不安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党的干部对党团员和一般学生的区别对待，党员干部的傲慢态度和特权享受、重视"红"而忽视才、盲目吹捧苏联和反对学习西方、事无巨细都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及在胡风事件问题上做得过火。正是这些方面酿成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情绪。

不过，整风运动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和6月的第一周即达到了高潮，这时的明显特点是有人威胁要结果共产党人的

性命。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在该校党委5月30日组织的讨论会上说，共产党员们要不改变他们的某些政策，特别是对非党人士的态度，后者就有可能图谋他们的性命（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尽管人们立即对他这番言论表示抗议，他仍然毫不动摇，继续在该校6月5日召开的会议上重复这种威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委、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也在6月6日透露，他曾收到一封匿名信，指责他5月25日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因为他曾在那次会议上坚持说，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之间不存在什么鸿沟，双方要建立密切的关系，需要共同朝前努力，只责怪共产党员是不公平的。卢郁文也不赞同那些人的作法，他们只喜欢批评中国共产党，却压根不准别人批评自己。他甚至宣称，这封匿名信中充满了咒骂和威胁词句。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务委员李仲昆（音）透露说他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就因为他曾批评某些人不该肆意攻击共产党，匿名信作者对他发出了威胁。

第二天是6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条消息，说是卢郁文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吓信，除了对他进行咒骂之外，还威胁说"就此悬崖勒马，为时未晚。"6月8日，该报在社论中就这一恐吓信发表了评论，就是这篇社论标志着百花齐放方针的急转直下，也标志着反击右派运动的开始。据这篇社论说，卢收到的这封匿名信是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出的警告，它说明虽然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政治思想战线的情况尤其如此。

第 五 节

反右动因与反右任务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扭转百花齐放方针？好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他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杰明·施瓦茨在他发表于《中国季刊》1965年春季号上的"现代化与毛主义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认为，之所以要结束这场自由开放的运动，"是因为显现出了对领导的无限的政治权力的威胁"。爱德华·弗莱德曼则在《中国季刊》1966年春季号上发文认为，百花齐放方针的终结是由于"党内强烈而持续的反对所致"，以及"对党的敌视性批评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对经济产生的逐步恶化的影响"所致。D·W福克马也在其《中国的文艺理论与苏联的影响》一书中说，这项方针的转向是受了两个因素的作用，"存在着要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的危险"和"苏联树立的从严管教作家的榜样。"

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敌视性示威游行和尖酸刻薄的批评难道真的构成了对中国领导政治权力的威胁？要回答这个问

题，应该注意两件事：一是发生骚乱的高潮时间是什么时候；二是决定终止百花齐放运动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直到1957年5月19日，“鸣放”活动还仅限于少数几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就是这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才站出来参加整风运动，此后的整个运动才获得了强劲的动力，并在5月底6月初逐步推向了高潮，即对共产党人进行恐吓和威胁。毫无疑问，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这段期间使用了各种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党，甚至丑化党的干部，而且逐步获得了全国其它地方的院校的响应。然而至今没有任何记载可资说明，在1957年6月12日汉阳发生相当规模的暴力事件之前，学生们或其它行业人员从事了任何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据新华社1957年6月20日报道，除了汉阳事件，还有人向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家扔炸弹。新华社的报道虽然没有点明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却进一步提供消息说，该院一千多名学生于6月17日下午集会抗议这种不法活动。

其二，人们有理由相信，反击右派的决定并不是在6月的头一周内作出的，而是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而那时候，北京以外的地方还未曾发生学生骚乱，全国各地也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可以够得上对党的权力形成了威胁。5月18日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整风运动的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天即作出决定要在6月3日召开人大会议。可到了5月25日，人大常委会又突然将会期推迟到6月20日。也就是在5月25日，毛泽东对批评者们发出警告说，他们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对一群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的讲话。根据上述两条证

据，人们可以认为终止百花齐放运动的决策大概是在5月19日至5月25日之间作出的。人们甚至还可以设想，促成这项决策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北京大学发生的情况。然而我们却很难认为，北京大学发生的情况已经构成了对中国领导人无限的政治活动权力的威胁。

至于爱德华·弗莱德曼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党内存在着反对百花齐放方针的人，但这些人依靠自己的持续努力就强大得足够说服占统治地位的领导集团改变主意，这令人实在难以相信。没有外在因素可供借助来加强自己的论点，他们是无法说服最高领导人的。经济在开始恶化的前景倒是有可能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外在因素，但敌视性的批评和示威游行究竟对经济产生了多大的恶劣影响，仍然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完全置身于"鸣放"运动之外的。只有工人阶级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国民经济才会受到干扰破坏。即便党内的极端分子可能说服毛泽东及其决定开展百花齐放运动的同事们，也不会是用国民经济可能遭到破坏作理由，而是用党的形象可能遭到损害作借口。

最后一种解释似乎与实情较为接近。如果说短暂的"鸣放"阶段所发生的一切不会对中国领导无限的权力构成威胁，那末至少也可能暗示出运动将向激烈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害怕。中国领导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些批评自由泛滥、不可收拾，那将不仅会提高它们的可信

度，而且会“败坏”人民的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的挑战。

如果说国内压力是终止百花齐放运动的决策的根源，那末，反思共产主义世界的经验又进一步影响了这种决策。1957年，中国已经日益卷入到世界共产主义集团事务中，而该集团当时越来越担心的是修正主义思潮。中国和苏联都逐步认识到了，从长远看，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将使国际共产主义深受其害。赫鲁晓夫于1957年5月宣布在他的国家结束“解冻”文学，因而，毛泽东终止百花齐放运动的决策也有可能是出于这种信念。

附

百花齐放运动中涌现出的新创期刊和面目一新的旧刊

一、科学技术类

序号	刊名	周期	地点	创刊时间	备注
1.	浙江农业通讯	月刊	杭州	1957年1月	
2.	浙江农学院学报	半年刊	杭州	1956年7月	
3.	城市建设	月刊	北京	1956年7月	
4.	机床与工具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5.	机械制造工艺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	机械制造文摘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中科院办
7.	机械工厂设计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8.	机车车辆工业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9.	讲卫生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卫生部办
10.	建筑技术	半月刊	北京	1956年10月	冶金部办
11.	建筑工人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12.	建筑材料技术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13.	植病知识	季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中科院办
14.	重型机械	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15.	中学数学	季刊	广州	1957年3月	
16.	中国畜牧学杂志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2月	中科院办

17. 中国兽医学杂志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2月	中科院办
18. 中国造船	季 刊	上海	1957年初	
19. 中国养蜂	月 刊	北京	1957年初	
20. 中南矿业学	半月刊	长沙	1956年7月	
21. 中南土建学报	不定期	长沙	1956年11月	
22. 纺织译丛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23. 焊接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24. 学术论坛	季 刊	厦门	1957年2月	厦大办
25. 化学工业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26. 华南农业科学	季 刊	广州	1957年3月	华南农院办
27. 华南师范学院学报	不定期	广州	1956年10月	
28. 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	季 刊	上海	1956年6月	
29. 华东水利学院学报	不定期	上海	1956年12月	
30. 遗传学季刊	不定期	北京	1956年8月	中科院办
31. 染织通报	季 刊	上海	1957年元月	
32. 燃料研究译报	双月刊	北京	1956年12月	中科院办
33. 热带作物科学译报	月 刊	广州	1956年7月	
34. 人民长江	月 刊	汉口	1956年10月	长江研究文献
35. 钢铁	双月刊	北京	1657年元月	
36. 钢铁译报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37. 科学纪录（中文版）	月 刊	北京	1957年3月	
38. 科学纪录（外文版）	月 刊	北京	1957年3月	俄、法、英、德文
39. 科学进展	半月刊	厦门	1957年5月	厦大办
40. 科学新闻	半月刊	北京	1956年10月	中科院办
41. 广东中医	双月刊	广州	1950年9月	省中医研究会办
42. 力学学报	季 刊	北京	1957年3月	中科院办

43. 临床检验杂志 季 刊 北京 1957年3月
44. 林业译报 季 刊 北京 1957年2月
45. 林业科学 季 刊 北京 1956年7月
46. 木炭 月 刊 洛阳 1957年元月
47. 南京农学院学报 不定期 南京 1956年9月
48. 农牧畜科学知识 半月刊 呼和浩特 1957年元月
49. 农村科学 半月刊 杭州 1957年元月
50. 农业机械译报 双月刊 北京
51. 农业经济译丛 季 刊 上海 1956年10月
52. 北京地质学院学报 不 详 北京 1956年12月
53. 山东工学院学报 不定期 济南 1956年11月
54. 上海畜牧畜医通讯 季 刊 上海 1956年11月
55.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 季 刊 上海 1956年6月
56. 生理科学的进展 季 刊 上海 1957年8月 中科院
57. 食品工业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食品工业部办
58. 水利学报 季 刊 北京 1956年12月
59.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0. 水运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1. 地质评论 季 刊 上海 1957年3月
62. 地球物理堪探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3. 电气工业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4. 电气工业技术参考资料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5. 电讯科学 月 刊 北京 1956年7月
66. 电影技术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67. 东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通报—自然科学 不定期 长春 1956年6月
68. 冶金设计 月 刊 北京 1957年1月 冶金部办
69. 有色金属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70. 原子能	双月刊	北京	1956年11月	中科院办

二、其　它

1. 争鸣	月　刊	北京	1956年10月	民盟办
2. 祁连歌声	双月刊	兰州	1957年元月	
3. 江淮文学	月　刊	安徽	1956年7月	
4. 数学研究汇刊	不定期	南京	1956年12月	南大办
5. 侨务报	月　刊	北京	1956年10月	侨委办
6. 青海湖	月　刊	西宁	1957年元月	
7. 曲艺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2月	
8. 处女地	月　刊	沈阳	1957年元月	
9. 群众歌声	月　刊	天津	1957年初	
10. 群众演唱	不定期	北京	1957年初	
11. 春雨	双月刊	呼和浩特	1957年元月	
12. 中学教育	月　刊	广州	1956年10月	
13. 中国摄影	季　刊	北京	1957年5月	
14. 中国电影	月　刊	北京	1956年10月	
15. 法学	双月刊	上海	1957年元月	
16. 福建教育	半月刊	福州	1956年12月	
17. 海燕	月　刊	青岛	1957年元月	
18. 号角	月　刊	广州	1956年10月	
19. 黑龙江画报	月　刊	哈尔滨	1957年元月	
20. 戏剧杂志	季　刊	北京	1957年2月	
21. 戏剧研究	季　刊	上海	1957年3月	剧协办
22. 西方语文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23. 小学教育	月　刊	广州	1956年10月	
24. 新港	月　刊	天津	1956年7月	
25. 新苗	月　刊	长沙	1956年7月	

26. 新闻与出版	半月刊	北京	1956年10月人大新闻系办
27. 星星	月 刊	上海	1957年元月诗歌刊物
28. 学术月刊	月 刊	上海	1957年元月
29. 红岩	月 刊	重庆	1956年6月原称西南文艺
30. 火花	月 刊	太原	1956年10月原称山西文艺
31. 人文	双月刊	西安	1957年4月
32. 贵州文艺	半月刊	贵阳	1956年下半年
33. 公路	月 刊	北京	1657年元月
34. 漓江	月 刊	桂林	1957年元月
35. 苗岭歌声	双月刊	贵阳	1957年2月
36. 美术研究	季 刊	上海	1957年元月
37. 芒种	月 刊	沈阳	1957年元月
38. 蒙古语文	月 刊	呼和浩特	1957年初
39. 萌芽	半月刊	上海	1956年7月
40. 蜜蜂	月 刊	保定	1956年元月原称河北文艺
41. 版画	双月刊	上海	1956年10月
42. 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不详	北京	1956年9月
43. 北方	月 刊	哈尔滨	1956年10月原称黑龙江文艺
44. 奔流	月 刊	郑州	1957年元月原称河南文艺
45. 边疆文艺	月 刊	昆明	1956年后期
46. 拼音	月 刊	北京	1958年8月
47. 山花	月 刊	贵阳	1957年1月
48. 商业工作	四月刊	北京	1956年10月商业部办
49. 史学月刊	月 刊	郑州	1957年元月原称新史学通讯
50. 诗刊	月 刊	北京	1957年元月
51. 电影放映	月 刊	北京	1957年月元原称电影放映资料
52. 电影新歌选	不定期	北京	1956年9月
53. 天山	月 刊	乌鲁木齐	1956年10月

54. 财政	月 刊	北京	1956年10月
55. 财经研究	季 刊	上海	1956年9月
56. 草地	月 刊	成都	1656年6月原称四川文艺
57. 东海	月 刊	杭州	1956年10月
58. 文学研究	季 刊	北京	1957年8月
59. 延河月刊	月 刊	西安	1956年后期
60. 音乐创作	双月刊	北京	1957年1月
61. 雨花	月 刊	南京	1957年1月
62. 园林好	月 刊	成都	1957年元月
63. 园地	月 刊	福州	1956年7月

第二章

右派分子及其观点

第 一 节

左派与右派的区别

"右派"与"左派"这两个词汇在全世界成为通用的政治术语，这一点应归根于法国革命。在关于皇室否决权问题的大辩论过程中，法国国民代表大会在1789年至1791年期间分裂为三个有明显标志的派别。第一个派别代表了要求皇室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的意愿；第二个派别代表了要求皇室中止否决权的人们；而第三个派别则代表了坚决要求完全废除皇室否决权的人们。这三个派别的分歧甚至可以在国民代表大会的座位安排上看到区别。要求国王具有绝对否决权的那一派别的人们，从大会主席的座位上看去，正好坐在立法席位的右边，而那些坚决要求完全废除国王否决权的那一派别的人们，坐在立法席位的左侧。而代表那些仅仅要求国王中止使用否决权的意愿的人们以及其他人都坐在大会中间。从那时起，几乎在全世界，"右派"这个词就一直与保守派有了相等之处，"左派"这个词被认为是激进派的称谓。

尽管右派与左派的分裂表明了社会中的一次根本决裂，

表明了思想、态度、原则和政策上的完全冲突；尽管这两个术语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但是右派和左派两个词语的界定却很难说是十分明确的。让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些界定吧，塔尔蒙在他所著的《专制民主的渊源》一书中认为，“左派宣扬的是人性的尽善尽美。右派则宣布人是虚弱的、肮脏的”。朗西曼在他的著作《社会科学与政治理论》中指出，对左派来说，人天生的美德都是绝对平等地赋予的；而对右派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卡尔在他的名为《二十年危机——1919至1939》的著作中却认为，知识分子，那些明白事理之人，常常会倾向于左派，正如那些官僚，那些实际的人们，会自然地倾向于右派。朗西曼在那部《社会科学与政治理论》著作中还说：“但是，就其社会学的观点而言，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却又截然不同——就其根本而言，这种区别只不过是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的长年不断的争论而已”。

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来说，不论是检查这些界定的利弊也好，还是重新努力对这两个词语给以新的界定也好，统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了解共产主义者是如何界定右派与左派的会收益更多。

虽然世界左派运动的大部分都已经使自己与共产主义一致，但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甚至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两个术语的解释，也缺乏精确的界定。不过，要理解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两个术语的解释并不是十分困难。如果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给这两个术语下界定是不必要的，那么他们也时而在党内讨论右派与左派的区别。

共产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在相互较量，即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列宁写下了大体下面的话：

> 事实上，只存在着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到这一点，谁要是没有从过去一切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学习到这一点，他就绝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理解社会主义，而只是一个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者。

这是列宁于1919年3月23日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八届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讲到的。列宁在许多其他文章中都曾讨论过右派与左派的分歧。这些文章著述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与小资产阶级的心态》等。斯大林也曾写文章论及右派与左派。文章有《苏联共产党的右倾危险》，《苏联共产党的右倾倾向》等等。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是右派势力，无产阶级是左倾势力。共产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左派、或者革命势力，而大力指责右派，或者说资本主义势力。但是，"右派"这个术语的含意包括了共产主义者中的一部分，即那些在社会民主和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两种条件下存在着两种右倾倾向。斯大林的话大致如下：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倾

向影响了部分共产主义者派别，使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向着社会民主党的方向发展。……在苏维埃发展的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倾向……标志了对部分共产主义者派别的影响，使他们偏离了党的总路线，向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向发展。

斯大林审查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右派分子不同于党的总路线的所有主要问题。他在1929年4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认为布哈林的路线是右倾路线。斯大林说，事实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布哈林的这条路线基本上是右倾路线。简言之，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这两条路线存在着三方面的分歧，即理论上的分歧、第三国际的政策方面的分歧和国内政策上的分歧。布哈林和他那个集团被认为是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容调和的利益冲突；布哈林则认为，资本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转变成社会主义者。至于有关第三国际的问题要点的分歧，斯大林讲了如下含意的话：

布哈林相信，若采取对右倾倾向的斗争，采取对第三国际中同情并倾向于右倾主义的斗争，若对德国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及其传统的清洗；若把布兰德勒斯（音译）和

塔雷默斯（音译）驱逐出共产党，我们就是在“瓦解”第三国际，在“毁灭”第三国际。

在国内政策方面，分歧主要表现在联合中农的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和重建农业等问题上。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据说布哈林集团拥护以各种形式与中农阶层的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党的路线则要求建立的联盟能够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促进消灭阶级。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布哈林的右倾倾向被指责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便是妄图废除国家作为市场调节者的作用，于是想开辟自由贸易的时代。对于第三个重建农业问题，布哈林的分歧在于反对党的决策中把加快发展工业作为重建农业的关键步骤，据说布哈林一直坚持要把关键放在发展个体农业的耕作上。

第　二　节

五七年前的老右派

毛泽东几乎完全接受了列宁对于世界上存在着右派势力与左派势力的观点，也接受了列宁关于这两种势力之间的分界线的意见。如果列宁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右派"势力，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左派"势力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把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视为右派势力，把"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视为左派势力。毛泽东于1937年11月12日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把中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也就是1.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右翼集团，2.由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间集团；和3.由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贫农、中、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所组成的左翼集团。毛泽东的分析与列宁的分析的确不同，其不同之点在于毛泽东的分析把着重点放在各阶层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态度上，而不是放在任何其他抽象的事物上。毛泽东把那些坚定的反共分子放在右翼集团内，把中间分子和那些并没有公开反共的人摆在中间集团里，把愿为共产党献身和对

共产党友好的人们放在左翼集团内。不过，这仅是形式上的区别，而不是内容上的区别。如果列宁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视为右派势力的话，那么毛泽东是把敌视共产主义的人们看作右翼集团的。但是，这点细微的区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当作共产主义的试金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那么，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谁是"右派分子"呢？显而易见，中国社会里那些属于右翼集团的人都是右派分子。但是，"右派分子"这个术语的含意还包括了一部分中间集团内的人和一部分左翼集团里的人。在这两个集团中，又有些什么人组成了这"一部分"人呢？那些背叛了共产主义者的友谊的人或那些甚至是共产党人，但却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向资产阶级或右倾思想靠拢的人都属于这"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都作了详细的讨论。那么，精确地讲，什么才是右的偏向呢？毛泽东在1948年3月20日发表的党内通报——《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这样写道：

> 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情况熟视无睹等。

根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的意见，上文谈到的右的偏向在共产党的生活中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就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要深入到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中出现的"右倾"偏向是大可不必。但是，把对党的历史上主要右倾分子的指控叙述出来，大有必要。

按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党内右倾分子中最突出的代表。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陈独秀被指责为向国民党妥胁的投降主义者和革命运动的取消派。《决议》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的最后阶段，党内的右倾思想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后来发展成为投降主义。《决议》上这样写道：

> ……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

毛泽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所做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早在1939年10月4日的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写到，"过去陈独秀右倾

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1927年的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和其他投降主义者据说都转变成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了，并且逐渐变为取消主义者。陈独秀和其他投降主义者被指责是"站在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而犯了"严重错误"。

根据毛泽东主义的学说，党内第二次右倾倾向时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据称党内的一些著名人士，过去以王明为他们的代表，曾犯下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现在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牺牲者。这在后来被叫做党内第二次王明路线。那么，对王明和他的右倾集团的指责到底有些什么呢？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5日写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这样写道：

> ……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

归纳起来，对于党内右倾分子的主要指责可以罗列如下：

1.过高地估计了反动势力的力量，低估了革命势力的力量。

2.强调联合资产阶级，避免同他们的斗争。

3.取消无产阶级对于其他民主势力的领导权。

4.在统一战线内，否认党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自己的主动性。

5.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第 三 节

五七年中的新右派

中国1957年中"右派"的主要特征又有些什么呢？根据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颂扬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反对社会主义文化。
2. 反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比如外交政策、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五大政治运动等。
3. 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建设的能力。
4. 反对共产党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部门中的领导，要求把党在某些基层组织内的领导，对高等教育学府、新闻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撤出去。

那么，中国的右派分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周恩来总

理在1957年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内容，这些右派分子企图“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报纸上讲，右派分子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为了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与以上的解释相互呼应。社论中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以上的定论也许会使那些相信此定论的人们以为，这些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指引的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只能在党外才能找到。但实际上，党内外都发现有右派分子。《人民日报》1957年7月28日发表的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中承认，反右派斗争揭示了党内还存在着不少的右派分子。那么，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在其特征上有什么区别呢？《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的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里这样写道，就其特征而言，由于党内外的右派分子都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所以，党内的右派分子与党外的右派分子没有什么区别。

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有，他们不同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仍然享受“人民”的地位，反革命分子被剥夺了作“人民”的权利。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在人民的行列之中，但是，他们却站在了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于与社会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利益背道

而驰的事。右派分子之所以没有被列到人民之外，是因为他们总的来说，不同于反革命分子，没有发现他们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任何破坏性活动。

右派分子的社会成分都是些什么人呢？右派分子都同出于一个阶级吗，还是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呢？有人说，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些剥削阶级又指哪些阶级呢？根据刘少奇在1958年5月党的第八届全国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包括有地主、买办等；另一个剥削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刘少奇讲的劳动阶级是指农民、没有土地的劳工和广大工人。如果刘少奇对剥削阶级和劳工阶级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说右派分子大多出自剥削阶级则是正确的。的确，只有很少的右派分子属于所谓的劳动阶级。在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当中，也许没有谁能宣称自己是出身于工人或农民家庭。

我们姑且承认大多数右派分子都从他们各自出身的阶级背景那里继承了剥削阶级的特性，那么仍旧值得调查一下这些右派分子是否仍在继续进行剥削。结果发现，右派分子的大多数都给安置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比如大专院校、政府机构、报社、出版社、文艺团体，以及政法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和医学领域。正象报纸上讲的，右派分子主要在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特别活跃。知识分子并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其自身也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因此，他们没有阶级观念，缺少阶级利益，毫不卷入阶级抗争之中。只有在进行阶

级抗争中，才可能产生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可以很保险地得出结论，总地来讲，知识分子与剥削毫不相关。如果说那些上层的知识分子，诸如丁玲、冯友兰、冯雪峰、费孝通、钱端升、艾青、陈企霞、曾昭抡、林汉达等人的本性是剥削阶级的，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并不是知识分子，但却忠心耿耿长时间为共产党服务的著名人士来说情况也是相同的。在这些忠心耿耿长时间地为党工作的著名人士中，可以列出下面几位：王汉（音译），监察部副部长，八届中央检查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潘复生（音译）河南省党委第一书记，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沙文汉，浙江省省长；孙作宾（音译）青海省省长。

第四节

反对政府的右派观点

对右派分子的指控能够得到证实吗？我们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事先明确右派分子追随什么，或者说他们反对什么。因为右派分子并没有组织起来的团体，所以，他们的要求并不一致。因此，要列出所有右派分子都同意的若干观点是不可能的。右派分子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在提出的这些观点中，中国领导把有些观点定为右派性质的观点，组织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下面所列就是他们的重要观点：

1.党取代了政府机构

主要右派分子，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1957年5月8日在党的整风运动组织的第一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共产党几乎取代了政府，结果，政府管理机构被剥夺了决策权。他提出建议说，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应该有明确的分界。党和政府各自的权力和义务都应当明确分开，确定下来，不能让一方干涉另一方的事。他说，每一国政府机构都

应当有权对行政事务作出自己的决定。另一位知名右派是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林汉达接下去进一步在同年5月21日就同一整风运动举行的第二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说到，教育部的存在完全是徒有虚名，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由教育部发出的指示，下边组织根本不当回事儿。有时候，甚至连国务院的指示也要遭到冷眼相待。只有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指示，下级组织才会遵守和照办。

2.党外人士没有权力

章伯钧说，一个人的职务、权力和责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他认为，党外人士如果被安置在什么职务上，他就应当有相应的权力，应当对他所分管的事情负责。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由党外人士分管的工作却要党的组织来负责。这些是章伯钧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既然责任在党的组织那里，那么党的组织也就等于要求拥有与责任相连的权力。按照章伯钧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党外人士即使在自己分管的事情中，也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的根本原因。另一位主要右派分子，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在5月8日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他是通过了一系列的斗争才获得了与他的职务相应的权力。

3.民主党派的成员不能够参加决策

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说，尽管也允许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决策的活动，但是，他们的参加只是名义上的，却没有作用。最使民主党派成员们感到不快的是，他们缺乏用于正

确理解某项政策的消息。罗隆基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以上说法。他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会上，他们对正讨论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没有人事先通知他们将要讨论什么题目，而且，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审查研究所发给的文件资料。不仅仅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不能够参加国家重要文件的制定，也不被邀请参加重要的国家会议。章伯钧在第二次座谈会上讲，共产党应当与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通力合作，一道讨论国家的重要政策和重要问题。为了促进其政治工作，他建议成立一个政治设计院作为专门部门进行这项工作。章伯钧在同年早些时候，即1957年3月18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曾在一个讲话中说道，扩大并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要求继续增强全国政协的权利和责任。全国政协的权利可以在进行政治协商、提出建议和实施监督上得到加强。并且，全国政协的权力还可以逐步地转变为中国人民民主制所要求的预备体制中一条民主的纽带。

4.民主党派正走向灭亡

罗隆基在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在民主党派吸收新成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给民主党派附加了许多限制。他例举了自己所属中国民主同盟。他说允许中国民主同盟仅仅在知识分子当中吸收新的成员，而且还限制在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中吸收。罗隆基进一步讲到，这些中老年知识分子总是要考虑他们如果加入了民主党派是否会妨碍他们加

入共产党。只要有妨碍的话，这些人就不再会加入民主党派了。如果没有妨碍，他们在加入某个民主党派之后，仍旧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当中，吸收进步分子入党。一旦这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然地就会失去对民主党派的兴趣。罗隆基认为，这种在吸收新成员中的对自由的限制，将在不很久的将来把民主党派引向灭亡。

5．共产党员有特权

一位知名右派分子黄药眠说，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一个党外人士——不管他工作多么努力——却要在他的职位上干上许多年。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常常被认为这事做得不错，而如果是一个党外人士的话，即使做得正确的事也要认为是错误的。徐兴基（音译）是国务院的一位顾问。他在1957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有些高级干部把自己看作是特权人物。北京医院对于七级和七级以上的干部，都给予特别的照顾。徐兴基进一步抱怨道，有些高级干部的亲属朋友也享受免费医疗。《光明日报》于1957年5月23日刊载了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杨朝春（音译）的讲话，他说，尽管干部们努力要使自己与群众完全相同，但是，他们仍然要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接受有特权的教育。

6．只是形式上的民主

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宣传部部长张百生（音译）说，自

从解放以来，一直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存在的民主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已。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共产党没有想到有必要遵守它。从外边看来，有民主选举，有统一战线政策，还有党外人士居于领导岗位。但实际上，共产党实行独裁，中央政治局的人才具有绝对的权力。选举人民代表并不是民主，其实仅是一种任命。虽然有些党外人士占据了领导岗位，他们却没有权力。张百生说，至于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些，当然是都写入了宪法，但是，公民们从未能够享受到自由，他们只能是驯服的臣民。宪法中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讲的话要起作用，可是实际上，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泥人偶像，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全国人大仅仅是做做样子，举举手，通过某个提案罢了。全国政协虽说是代表了统一战线，但却花去了大半精力用于做研究学习组织的工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很象是修饰民主外表的两朵纸花。张百生讲，各种重要问题都由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六人决定。这六人分别指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国家副主席朱德、副总理陈云，以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张百生说的话刊载在《沈阳日报》1957年6月11日这一天上。

7．法律机构不健全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著名人士黄绍竑抱怨道，在肃反运动当中，有许多清白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中国尚缺乏明确写出的法律法规。黄绍竑指出道，政府至今没有公布和实施民事或刑事法典法规以便公共机构能够

遵循；政府也没有公布或实施一套法律法规来指引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制定管理对公务员进行惩罚、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和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务进行限制的规定和条文，是与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紧密相关的。对于这些规定和条文，必须要尽快地颁布实施。由于没有制定明确的条文，由于没有明白的法律制度，这就使得党外人士即使身在其位，也没有必须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中国另一个民主党——致公党的主席陈其尤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要求尽早颁布民法条例和刑法条例，并要求按照法律手续进行工商活动。陈其尤还抱怨道，在整个肃反那个时期，许多民主党派的成员在他们各自的党派毫不了解，并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就被逮捕了。对于司法问题，许多报纸还刊载了不少的报道，比如，《光明日报》在1957年1月22日刊载的《谈谈有关加强法制的几个认识问题》和《桂林日报》1957年5月30日发表的题为《党外律师畅谈对司法部门的意见》等报道文章，都反映了对司法工作的意见。

8. 苏联不很友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在反右运动已经发动起来的时间内（龙云据说是在1957年6月中旬，全国人大一届四次常委会会议上发了言，讲了对苏联的看法），竟仍然从三个方面例举了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很友好的表现。这三个方面分别是：

1. 苏联对朝鲜战争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而一切消耗都不得不由中国方面予以承担。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帮助解放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苏联人当时从东北的工厂里卸下并运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机械。

3. 苏联给中国这样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还要求收取利息，这是很不友好的。

龙云还回忆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给其同盟国许多援助，战争结束后就勾销了其中的一些贷款。

9. 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

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专家在1957年第五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几位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给予中国的参考作用提出了质疑。对当时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能起的作用也提出质疑。他们共同持有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建立起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用的公式。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写于一百年前，只能预言国家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也只能提出其发展的粗略轮廓。因此，陈振汉等经济学家认为，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看作值得遵循和照办是很不正确的。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许多有用的观点和分析的方法，比如抽样理论，正常曲线，时间序列理论等等，都能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有效地借鉴为自己所用。其次，这几位经济学家认为，自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进行经济重建的工作中，几乎一直是在黑暗中

摸索。国家推行的财政经济政策要么是盲目地从苏联的经验那里借过来，要么就完全是搞试验错误法，不根据任何客观经济法则办事。再次，这些经济学家感觉到，由于行政管理人员对经济研究工作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所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发展的道路被阻塞了。

10．民族资产阶级不需要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

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工商业者深入进行思想改造，必须积极工作。章乃器在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一篇社论时说，《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社论只强调了"要私人工商业人士都隶属于国家代理人的领导之下的必要"，这是很片面的，因为只是单方面地服从于国家的领导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企业承头人就不再有权力和责任去完成公务了。章乃器特别反对社论中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深入进行思想改造这一点。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者在49年后已进行了多次思想改造，如果再一次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话，就只会增加他们的自卑感，这是对谁也毫无益处的。章乃器后来在1957年5月3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有关改造工商业的座谈会上又说，他认为官僚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不再可能在中国复活，而官僚主义却可能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上和行动上造成影响。其次，资本主义是好坏掺半的混合物，而官僚主义则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之物。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学到生产操作技术等东西，还可以运用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

进一步指出，由于已经可以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对于领取定息就不再有理由认为是剥削了。把领取定息叫做“非劳动收入”更为适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掌权后，工商业者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发展生产的号召，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公私合营企业，从那里领取定息——原作者注。）章乃器的讲话在1957年6月1日的《大公报》上有简短的报道。章乃器发现刊载的讲话与他实际上讲的内容差距甚远，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校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工商改造工作的一个问题》，发表在1957年6月9日的《大公报》上。章乃器的观点后来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受到了批判。

11．教育机构里的党委会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著名领导人陈铭枢坚持一定要废除教育机构里的党委会。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讲，应当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讨论与他们自己的工作有关的重要问题。他想让学校里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有关教育的大事上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对党委会制度持批评意见的另一位人士是罗隆基。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讲道，这种制度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精神不相协调。这意味着由共产党来垄断控制教育。党委制度激起了到会许多其他人的愤怒，不少人都紧接着罗隆基提出许多对这种制度的批评意见。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党委成员在专业上不能胜任管理学校的工作；（二）党委成员趾高气扬、武断专横、用政治观念去对待教师职工；（三）党委制度在学术事务当中滋生了教

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结果降低了学术水平；（四）党委会进行的各种各样活动促使共产党与非党员教师学生疏远了。

12. 不适合科学发展的空气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临时领导小组发表了一个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5名著名科学家签名发表，这五人中有曾昭抡、钱伟长、童弟周，华罗庚。他们五人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这个备忘录的题目是《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发表在1957年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虽然这个备忘录是由5个人签的名，但只有曾昭抡和钱伟长后来成为批判的对象，按照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说法，其他三人只不过是受骗上当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华罗庚也受到了猛烈地批斗。华罗庚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数学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培训。曾昭抡是著名科学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过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钱伟长是一位导弹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这五人签名的备忘录着重讨论了科学家们面临的问题。著名科学家由于过度负担起行政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几乎不再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第二点，由于缺乏必需的科研实验员，缺乏科学仪器，缺乏普通设备、实验用化学药品等等，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效率受到了很大影响。第三点，严格的保密制度已经成为阻挠科研进步的主要障碍。科学家们常常因为保密制度的原因而不能接触到参考资料。第四点，科学研究还由于在一些情况下缺少资金，还在另一些情况下资金使用不够而受到影响。这个备忘录恳求消除这

些不足之处，尽全力开发科学才能。

在社会科学方面，备忘录主张改革传统的社会科学，而不是废除有些学科。备忘录强烈反对取消一些学科，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等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在苏联的课程安排上看不到这些科目。备忘录要求科学研究应从苏联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在财政学和经济学问题上，备忘录批评那种政府部门发布政策，然后叫专家们去讲述、去解释的做法。为了增强进行对真理的追求，备忘录认为，有必要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有必要鼓励这些社科工作者对政府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备忘录还批评了党对科研工作的干扰，批评了在科学院内对待党员和非党员的不同差异。这几位科学家建议对一个人的专长，要给予相同的重视。而党则一直强调在学生升学和选拔学生出国深造的时候，要特别重视政治标准。

13．官僚主义操纵了文艺创作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秦兆阳在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题为《现实主义，宽阔的道路》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写到，作家们总是被限于为了国家的革命目标而确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要他们在这个范围内去写作。秦兆阳想要打破这种框框，因为这种框框干扰了作家的创作自由，还因为这种框框意味着客观现实主义要服从于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他不同意苏联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作家大会上做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

义”的定义。那次大会做的定义要求作家能够真实地表现现实，但在同时，又必须把这种表现与社会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按照秦兆阳的观点，并不是每一种真实的现实表现都能够为思想灌输服务。具有影响的年轻作家刘绍棠在1957年第5期的《文艺学习》上发表了题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文。他在文中大体这样写道：

> 为了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我们必须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不应当借着“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名义，粉饰生活，改变生活的真面目，这样的现实生活必须要有时代的特色，要有时间的标记；我们不能够把1947年的现实生活等同于1957年的现实生活。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在1956年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他特别强调了文学艺术的一些特征，照他的看法，这些特征都与美学和感情相联系的。他抱怨说，党完全忽视了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他讲，有些人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就如他们要求宣传和教育一样。他们看不到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是具有更加深远的作用的。著名诗人艾青于1956年和1957年分别发表了一些诗作。其中有《黄鸟》，有《养花人的梦》。这些诗作后来受到批判。艾青对这种官僚主义地控制和批判这些在百花运动中刚发表在各种刊物报纸上的寓言诗，表示了他的愤慨。但是，对官僚主义给予最强烈抨击的还是两位青年党员，一位是刘宾雁，

一位是王蒙。刘宾雁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目为《本报内部消息》的短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坚信党的理想的年轻记者。这位记者为了使报纸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中普遍的状况，同党内出现的各种腐朽现象和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者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王蒙在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某个区党委内一位满怀抱负、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与党的官僚主义行为之间的冲突。

14. 错误的人事政策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钱家初（音译）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在为各国家机关选送和提拔干部方面，共产党只强调政治观点和政治面貌，忽视了一个人的智慧和他的工作能力，陈铭枢也在那一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说，政治观点和政治面貌在选送和提拔干部时不应当成为唯一的标准；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一个人的个人品质、生活作风以及分派给他的任务的完成情况。《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说，许多年来，不少党员的能力都与他们拥有的职责不相符合，结果是他们的工作干得很差。但是，他并不为此指责那些党员，而是批评党把方形木桩打入圆孔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林希翎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过严厉地批判。她于1957年5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辩论会上说道，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品质和能力，而是看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不是共青团员。

15．盲目模仿苏联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程中，模仿苏联的体制受到了激烈的指责。有好几位教授批评了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教育体系，结果降低了教育水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朱玉贤（音译）在1957年5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中说：

> 在过去几年里，其基本特点一直是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到目前为止，中国大专院校仍在使用唯一的苏联教育学的教科书。我们自己却一直没有编撰和出版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学方面的教科书。……

冶金工业部计划司的工程师任绍希（音译）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讲，中国采用的鉴定、测量标准尺度主要是源于苏联。“我们不明白这些标准是在什么实际情况下适用于苏联，也不明白它们又是在什么条件下盲目地应用于我国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姜龙基（音译）也在1957年5月15日的一家报纸上撰文说，教条主义在学习苏联的经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苏联的一切都被理想化了。欧洲或美国的一切都被撇到了一边。苏联的经验受到尊崇，中国的传统却被撇到了一边。苏联专家受到崇拜，中国自己的专家却遭到冷遇。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辩论会上讲，尽管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中苏友谊是坚不

可摧的，但是，盲目模仿苏联却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她举例说到了军衔制，这整个编制都是模仿苏军的结果。她说，这种制度一建立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官兵关系。根据林希翎的意见，共产主义应当以民族自己的特征为基础，必须要有民族自尊心。

第五节

拥护政府的右派观点

在审查对右派分子的指控和批判是否确有事实之前，人们也应当考虑到，在右派分子发表的许多观点中，有不少的观点是拥护党的政策、方案和措施的。林希翎讲，她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缺少信仰，而且她还认为，社会主义是“最美好、最崇高的社会形式”。但是，她把当时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看作既不是真社会主义，又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她在北京大学于1957年5月23日举行的辩论会上说到：“我相信公有制比私有制更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民主的，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却不民主”。她举例说南斯拉夫就是实施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林希翎又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她的看法，中国还没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所以，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规律并不相符合。在中国，人们正在封建体制上面建立社会主义。在谈到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时，她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对抗的基础，因为中国已经把公有制作为国家的基

础，可是，领导人又总是有一些局限性。党已经认识到了，正在努力克服这些局限性。

另一位右派分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王昆仑在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说，民主党派的成员可以就现在的制度提出许许多多的看法，指出许许多多的缺点，但是，他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奋斗。他承认说，他所在党的党员中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相信，这些人也是坚定不移地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许，他们会坚持独立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的。王昆仑还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构成一个反对的势力，因为如果政府失败的话，他们也负有责任。

章伯钧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高级形式，这种民主是由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后发展而来的。这种形式的民主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所以，要汲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国人民能够一步一步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引下，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条件，考虑到中国文化生活的传统，考虑到新的生产力的关系，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的比较完善的民主。这是章伯钧在1957年3月18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讲的内容。

罗隆基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就共产党的领导说道，中国的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他们还希望党能够进一步在具体的帮助和领导中加强自身。但是，他

又说，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之间应该划一条线。接受党的领导并不能等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对党员个人的批评，不论正确还是不正确，并不是要反对党，更不能说是反革命。他要求各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的真正助手，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并向党提出坦率的批评意见。

储安平在第二次座谈会上说，就国家的主要政策而言，一切党外人士都要真心诚意地服从共产党。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党的理想视为伟大的理想，而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没有主见，也并不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不尊重，没有责任感。然而，他又认为："一个党领导一个国家并不等同于一个党拥有一个国家"。虽然人民拥护共产党，但他们绝不会忘记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在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章伯钧说，虽然说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自由的，组织上是独立的，政治上还相互平等，但是它们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这样并不矛盾，因为只有从阶级对立和经济剥削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才能够实现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想。章伯钧说，自从解放以来，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相互合作和日常接触中，相处得很和谐。他承认说，最初，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者之间，其阶级观点、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等都存在一段距离。可是，随着他们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一道逐渐发展，随着他们相互间的接触逐步加深，两方都增进了相互了解，并在思想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相互监督的问题上，章伯钧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生活模式，其目的是在各层人民中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取得相

互信任，使双方各有职能和权力，进行相互监督是很有必要的。他希望各民主党派别把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是对自己的监督，各民主党派也不应该认为共产党进行的每一个运动都是在实行监督。

章伯钧继续讲到，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已经在有些人中引起了担扰。他们担心，这些政策会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会让唯心主义复活。他相信，与此恰恰相反，这些政策正是为了扩大民主的范围，为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的努力来克服。如果党内知识分子认为党外知识分子后进落后，如果党外知识分子把党内知识分子看作是业余爱好者，那么双方就只能看见自己的优点。如此这样，裂痕就很难弥补。党外知识分子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们还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理解革命老干部在如何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历过摔打，革命斗争又是在如何艰辛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如果革命老干部在讲话中比较坦率，在行为上不是那么市俗气，那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漫长的革命生活的锻炼。另一方面，被安置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岗位上的革命干部，也应当好好地研究他们的新任务。

在谈到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刘绍棠在1957年第5期的《文艺学习》上发表的题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文章中说，应该坚持文学艺术的阶级性。他在文中讲到，否认政治标准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否认文艺是武器，否认文艺是工具，而仅仅把文艺看作

是花瓶。但是，他又接着写道：

> 文学艺术并不是通过机械地为某一政策服务来为政治服务，也不是通过创作出来的作品与宪法要求一致为政治服务，也不是这些作品与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相符就行；文学艺术主要是通过作品本身的阶级性，通过对人民品质的美学教育作用，来为政治服务……

第六节

对右派观点的评价

人们在了解这些右派分子的观点之后，可以很保险地说，总的来看，右派分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求的根本之点是要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是他们要求自由与民主又并不对社会主义的信条构成挑战。如果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那么就不能够说右派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并没有齐声高呼要求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没有要求对私有财产的权利。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辩论会上说：

> 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公有制比私有制前进了一步。所以，有些人建议在二十年的时期里，那些最初投资的私人工商企业所有者应该得到定息，这个建议必须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一种延续形式。

她说，社会体制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她所持的观点是，虽然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很好的，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却并非如此。基本原因在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三个“恶魔”，这又是因为中国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方面还不健全。这某些政治方面中包括有中国的人事制度、等级制度，还包括扩大了的保密制度，特别是那些官僚机构等。大多数右派分子实际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只是批评共产党偏离了要建立一个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的批评是，共产党未实践自己宣称过的理想。如果共产党宣称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那么共产党的干部却把自己变成了高居于上的新的特权阶级。北京大学学生钱居平（音译）写了一篇题为《论阶级的发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 在旧的阶级消灭之后，一个新的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阶级在特性上不同于旧的阶级，但无论如何，总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生产资料而言，主要的党、政、军人士掌握着权力，代表了人民中很小的一个百分数，共同享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把这种情况装饰起来，叫做“由人民共同所有”。这些官吏们相互支持，有意识地组成了新的社会集团……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几位右派分子都坚持认为共产党有领导全国的权利。他们甚至于认为共产党对全国的领

导对人民有利。这些右派分子反对的是是绝对领导，反对的是党的专政性质和党员中过度地滥用特权。两名知名右派分子张百生（音译）和黄振旅（音译）在1957年6月10日沈阳师范学院举行的教职工会议上做了联合发言。他们俩讲话的中心论题是“废除党的绝对领导”。黄振旅在补充他俩的发言时说：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共产党实施绝对领导权和把党员安置在重要的职位上工作，都是很合逻辑的。今天，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历史要求废除党的绝对领导权，废除党的特权。

黄振旅又补充道：“废除党的绝对领导制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成为先锋队……”说到党员滥用特权时，他们主张，只有把这些党员开除出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够入党。只有这样，党的组织才能够保持其纯洁性，才能够用正确的政策领导这个国家。这些右派分子真正要想做的事，是要明确共产党的权力限制。按照他们的观点，党不应该侵占个人的自由。这一要求并非仅指创造性的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且也指个人生活本身。这些右派分子指责党组织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加以过多的控制管理。储安平在谈到此事时说：

> 为了保证党的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为了加强已经取得的政权，共产党想一直处于强大的地位，并

> 掌握政府的主要职位，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单位，不论它是大是小，也不论它是一个部门还是一个分部门，必须要一个党员来当负责人，或者不管做什么事，不论此事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党员们的点头就不能去做，在整个全国的范围内来看，这难道不是太过余了吗？

右派分子还强烈呼吁反对那些是党员而又在专业上没有坚实基础的人来领导搞专业的人们。他们批评共产党允许，甚至鼓励，那些并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党员得以提升，或者担任领导，而不顾牺牲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大辩论会上说，"文艺领域内的最大的问题，是那些一窍不通的文艺领域内的人和那些上面派来的人（那些与党有密切联系的文艺领域内的人）担任领导，指挥别人"。右派分子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只要有专长的人没有偏离党指引的主要目标，就应该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些有职业专长的人大概要求的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专长里，包括文艺在内，要有相对的自治地位。

如果说右派分子并不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废除共产党的领导的话，那么，他们也肯定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完完全全搬到中国来。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音译）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指导思想，必定要引起教条主义。这是因为一切教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并具有当时的意义。他在1957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这样说，如果

把一个相对静止的教条当作指导思想，教条主义的弊病就不可避免。陈振汉等右派经济学家们的宣言中也说，由于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是僵死的词句，我们就会习惯于对与经典著作中阐述的立场有一定差别的思想派别，冠以修正主义的帽子……右派分子指责盲目模仿苏联，也是建立在相同的逻辑之上。他们反对接受那些对中国没有益处的从苏联那儿来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反苏情绪，只要所学的东西有利于中国，他们也并不歧视要从外国学习任何东西。其次，右派分子并不准备用什么来取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他们赞成把当代中国社会的丑恶现象揭示出来，然后把它们消除掉。按照他们的观点，掩饰现实，对社会有害无益。再次，尽管右派分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他们却要求有权利指出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有权利批评党员个人的缺点。

附录：

主要右派著述、言论及参考书

一、主要右派著述

艾青：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四版

章乃器：

a、《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第二版

b、《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载于《大公报》1957年6月9日第三版

c、《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载于《工商界》1957年第6期第1至8页

章伯钧：

a、《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b、《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

12日第一版

陈振汉等六人：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原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第123至133页。

陈　达：

《晚婚、节育，新中国人口问题》，原载《新建设》1957年第6期增刊第1至5页

陈　涌：

a、《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9期第33至37页

b、《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第1至20页

陈潜凡（音译）：

《从同志谈到红色专家》，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14页

钱家初（音译）：

《从"定息"的实质说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6日第七版

秦兆阳〔笔名"何琪"（音译）〕：

a、《现实主义，宽阔的道路》，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第1至13页

b.《关于"写真实"》，原载《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1至8页

储安平：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第2版

钟惦棐：

《电影的锣鼓》，原载《文汇报》1956年第23号第8至4页

费孝通：

a、《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原载《文汇报》1957年2月20日第2版

b、《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第7版

c、《"早春"前后》，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第2版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传的继承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第8版

萧　乾：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第7版

徐懋庸：

《论和风细雨》，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第8版

黄琪祥：

《民主党派工作上的两个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3日第1版

黄药眠：

《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咕噜》，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9期第1页

刘宾雁：

a、《在桥梁工地上》，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第1至18页

b、《本报内部消息》，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第6至22页；及第14期第48至60页。

刘绍棠：

a、《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原载《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第9至11页

b、《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原载《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第7至10页

刘绍棠、丛维熙：

《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原载《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第17至18页

罗隆基：

a、《我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56年6月28日

b、《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原载《人民日报》1957

年8月23日第16版

毕鸣岐：

《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两面性抓住不放？》，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第8版

沈志远：

《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0日第4版

丁 玲：

a、《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年
b、《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
c、《在医院中》，1941年
d、《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第4版

曾昭抡、华罗庚等五人：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第1至3版

曾彦修：

《谈主观辨证法与客观辨证法必须一致》，原载《学习》1957年第10期第15至17页，第11期第25至27页

王若望（笔名若望）：

《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原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6期第13至

14页

吴祖光：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原载《戏剧报》1957年第11期第4至7页

二、主要右派言论

章伯钧：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的根本原因。

储安平：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1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费孝通：

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现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冒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冲开了为妙。

罗隆基：

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的工作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也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是不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

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芦"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芦，必肯鞠躬尽瘁。

党委治校这一提法，是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各民主党派连政权都参加了，也可以参加学校管理。应该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挥作用。

……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陈新桂：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点，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没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领导地位，便利了三大主义的发展。

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的时候，依靠党员作核心，这样一种方式就很值得研究。

我国这几年对旧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要看成分，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

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生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

黄绍竑：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公式，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章乃器：

1956年初发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这样，很自然地，在工商业家的心目中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难道它还会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难道还会重施"五毒"？

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笼统，就是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不愿深入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他们在那以后继续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

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

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

的收入的尾巴——定息。

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来的。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阶级本能的改变……。

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绝不会盖在骨子里去。

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挥，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

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

为要说得动人一些，以"脱胎换骨"为比喻，也是可以的。但在我们的社会里，特别在阶级已经消灭的今天，问题的性质就根本不同。"脱胎换骨"的比喻已经不符合"轻松愉快"、"和风细雨"的精神了。必须正确认识，我们目前正处在人们的阶级特性逐步消灭，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在今天还片面强调阶级特性，……显然是错误的。脱离实际地过分强调阶级矛盾，也是不适宜的。〕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何以现代化的企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以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

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材。象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很难公然存在的。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徐懋庸：

中国的资产阶级，非但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争取变成工人阶级了。

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和过去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相同之处，即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但是，两者又有异：现在的定息，不过是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赎买"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

根本否定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

彭子冈：

鄙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

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徐铸成：

过去，……坦白地说，我是长期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

郑白涛：

我们的国家里是没有新闻检查的。但即使没有新闻检查，主管部门的教条主义，认为这不能发，那也不能发，结果压死了很多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客观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为社会所关心为人民所注意的。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所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赵 琪：

目前我国存在着三种性质的报纸，即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和团体所有制的报纸。目前机关报办得不算好，

这和领导机关所有制有关，领导机关所有制报纸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完全两样：一、新闻多。二、服务周到。三、新闻人物活动多。四、什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今后党应该怎样领导它的报纸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党委宣传机关对报纸编辑业务干涉过多。

邹 震：

我觉得新闻工作者要高声地"鸣"，新闻工作者要大胆地"放"。因为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因此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

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樊如俭：

现在新闻思想很混乱，而产生这种混乱，是由于报纸的性质和功能这个问题还未解决的缘故。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的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定义束缚了我们报纸的性质。这个定义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情势了。因为一、1901年是革命前，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我国现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了。二、过去在解放区的时候，都是工农兵，现在读者包括知识分子，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和兴趣。除了指导性和鼓动性的题材外，还要有些别的。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的教条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产生矛盾。'

朱启贤：

学校党委制有缺点，那就是"无知"加"外行"，但又有绝对决定权。他们不懂业务，又不信任别人，不把事情办坏那才是怪事哩。

林希翔：

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有怀疑。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

严仲强：

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条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迸发出来，"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俨然，一本正经，但是掩盖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

葛佩琦：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三、重要参考书

陈传（音译）编辑：

《"鸣放"选萃》共两卷，（香港，1958年）

易丛光（音译）编辑，

《党天下与党国家》两卷本，（香港，1958年）

北京学联：

《看！这是什么言论？》（北京，1957年）

鲍依和费正清编辑

《共产党中国1955年至1959年：政策文件及其分析》（美国、麻省、剑桥，1962年）

陈，西奥多·H·E：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香港，1960年）

弗尔，埃德加：

《蛇与乌龟》（伦敦，1958年）

福克马，D·W：

《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的影响，1956至1960年》（海牙，1965年）

约翰逊，查默斯：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的政策》（香港，1959年）

利夫顿，罗伯特·杰伊：

《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纽约，1960年）

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

a、《百花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

b、《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决定一切》（美国、麻省、剑桥，1966年）

c、《文化革命的根源：人民中的矛盾，1956—1957年》（伦敦，1974年）

穆复生：

《百花之凋零：毛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3年）

所罗门，里查德：

《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美国，贝克利，1971年）

凡·斯莱克，利曼·皮：

《敌人，朋友：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统一战线》（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67年）」

杨以凡：
《胡风事件》（香港，1956年）

戈尔德曼，默尔：
《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反叛者》（美国，麻省、剑桥，1967年）

周清文：
《十年风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实记事》（纽约，1960年）

乔弗，艾利斯：
《党与军队：1949—1964年》（美国、麻省、剑桥，1965年）

赵学（音）编辑：
《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北京，1957年）]

第三章

反右运动第一阶段

第一节

动员群众进行反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动员群众。该社论标志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一短暂时期的终结，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反右运动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1957年6月8日，这一阶段主要针对城市中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第二阶段的起始日期是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第三阶段则始于同年晚些时候，重点在于清理共产党和国家机关里的右派分子。

中国领导人又是如何解释他们发动反右运动的呢？在运动开始的最初几天里，《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表明北京发动这场运动的理由，动员群众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社论中，愤怒声讨一小批右派分子，说他们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进行挑战，还公然叫嚷要共产党“下台”。于是，向右派分子发动反击成为理所当然。但是，该

社论又补充说道，号召人们反右并非意味着整风运动的结束。中国共产党愿意继续进行整风运动，愿意倾听一切善意的批评。也就是说，党的整风运动并没有因为反右运动的发动而正式结束。但实际上，打那以后，谁也不敢再向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即6月9日，又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为题的社论。文中承认说，自从整风运动以来，人们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意见和建议都是正确的，必须倾听，必须研究，需要接受。社论又宣称，但也有许多错误的言论，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的言论相继出笼。凡是正确的意见，都应该旨在"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本篇社论的宗旨，是要人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不仅仅享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权利，而希望人民也应该向那些既无事实根据又居心不良的意见、观点提出反批评。社论说，有些批评者对那些进行反批评的人们搞威胁恫吓，企图阻挠人们提出反批评。该社论还以有人写了一封给卢郁文的恫吓性质的匿名信为例子。（卢郁文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社论中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前不久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个叫做笪移今的人要进行反批评时，竟受到了无理阻挠。按照同一社论的观点，那些不赞成进行反批评的人们，把提倡反批评这种努力看成是共产党不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的表示。该社论指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提倡反批评并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政策和党的整风运动的终结。

党的喉舌从号召人们进行反右之日起，一面证明反右运动的合理性；一面大加渲染，表明人民群众对那些所谓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疾恶如仇。就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同时，又报道了某个钢厂的工人的活动。这个钢厂的工人对那些针对共产党的恶意批评，表示极度愤慨。该报在同一天，还刊载了读者来信，对向卢郁文发出恫吓的匿名信表示气愤。6月9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169名读者的同样内容的抗议信。6月10日，《人民日报》宣称，主要工业城市，象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都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会议。在最初的那几天里，除了《人民日报》以外，党的整个宣传机构都充斥了各地的工人、农民举行声讨大会的报道。这些抗议信件和有关声讨会议的报道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人民大众自发地起来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如果说，中国领导人竭力想表明已经有一种强烈的、明确无误的公众舆论拥护开展反右运动，那么，他们同时又全力以赴地动员广大群众进行这场运动。《人民日报》在1957年6月11日发表了题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该社论要求人民分清界限，向右派分子发起斗争。社论还在文中向全国人民暗示如何分清界限。按照社论的观点，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与否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唯一标准。社论声称，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

护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只是一小批右派分子。但是，社论还认为，人民中还存在着第三批人，他们“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有些怀疑、动摇和保留”。按照该社论的观点，这第三批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并会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活动。这一批人的某些暂时的怀疑、动摇和保留“同右派分子的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在同一天，工人阶级的喉舌《工人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社论，号召工人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全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社会主义舆论的运动，粉碎各种各样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意见。共青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从6月11日到14日，连续发表社论，动员全国的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向右派分子予以回击。

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的这一系列社论和报道，都向人民提供了明确的信号——他们应该干什么。他们意识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清扫各自的环境卫生，换句话说，就是要他们立即动手，把长期以来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都迅速地对这一号召作出了反应。这些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成员，由于害怕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争先恐后地表明他们不赞成自己党内成员所发表的错误言论，不赞成他们写的错误文章。这些人匆匆忙忙地召集各种会议，批判那些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反面意见的人们，以表明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忠诚不渝的精神。在这些批判会上，受到攻击的靶子毫无例外地都是民主党各自党内的

主要领导人。在这些批判会上，人们发言攻击的程度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位67岁的老教授顾执中，于7月5日，在他所属的九三学社的同事们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进行审查时，企图自杀。据报道，他用头猛击石柱，受了重伤。

埃德加·斯诺在他那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也曾经遭到冲击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气息。可以指责我的个人习惯、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却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一些。现在，我相信这些经历对我不无好处。我当时需要那样，迫切需要！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人们攻击的目标，比较过去显得低贱了许多。我现在可以更多地评价其他人了，更能帮助他们。

这些批判会的直接目的，是强制右派分子承认他们的罪行，以此使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自惭形秽、自我贬抑。这一目的几乎完全达到了，因为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迫于批判的强大压力，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在6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叶笃义和陈新桂两人分别就他们过去发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陈新桂的发言则被认为是很不满意

的。于是乎，陈新桂在6月19日民盟中央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重新作了自我交待。6月13日，章伯钧作了简短发言，承认说，他"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6月15日，李康年——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在中国民建会与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声明撤销了他过去提出的延长定息的意见。《人民日报》6月16日报道说，在6月15日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龙云试图用对向他指出错误的人们表示感谢的言辞，让这些人安静下去。龙云说，他钦佩的是章伯钧等人在整风运动中所起带头作用的精神，而并不包括他们发言的内容。他补充说，他原以为章伯钧的发言是有根据的，在最近仔细读了一遍宪法之后，才发现章伯钧的发言找不到一点根据。6月21日，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召开的会议上，储安平说，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错误言论，犯了严重错误；他还承认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他发誓，要做出最大努力，根除错误思想，认真检查在《光明日报》社的各种工作，划清与章伯钧、罗隆基的界限。但是，只有几个勇敢的家伙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6月1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章乃器在他写的一份书面陈述中，否认他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他力辩道，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为了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6月15日，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又说：

> 人民看待某些具体事物的方法也许有不同，这些不同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所允

许的。这并不是什么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6月15日，黄绍竑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也受到攻击。他说，他在5月16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没有什么错误。他当时在座谈会上讲，人们写出的工作报告常常是强调了成绩、而掩盖了缺点。他在重新细读了当时的发言后认为，在文字上，他仔细再检查了一遍之后，发现原文中有语病，可能会引起误会。

各民主党派一面争先恐后地急于表明他们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共产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一面不满足地对待在首都组织召开的、针对自己党内中坚分子的各种批判会和揭发会。他们认为，必须向全国各地的偏远地区他们下属各分支机构和组织发出信号，以便让这些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组织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检查工作、揭露自己党派中的隐藏的右派分子的任务中去。6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指示它所属的全国各级组织，号召他们向右派言论进行坚决斗争。6月1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执委会通过了一项指示，题名为《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作斗争》。这项指示是向各地各级组织发出的。6月18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体民盟成员开展反右斗争、并在民盟内部发动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6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向它们所属各地方机构也发出了指示。该指示题为《全体工商人士团结起来，立刻行动起来，向章乃器反社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

然而，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急不可耐，不再等待它们在首都的首脑机关的详细指示。它们自己也能看清楚这风向来自何方。它们都明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一短暂时期已经完结，现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开始“捉妖”。它们也很明白的是，正是它们这些民主党派的一些领袖人物，由于发表了不利共产党、不利政府的许多言论，惹火烧身，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愤怒，才使自己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与此同时，这些地方组织也意识到要自身生存下去的方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把所谓的右派分子同他们自己分离开来，只有通过一再重申他们忠于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生存下去。单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例吧，到1957年6月17日止，民盟就有6个省、9个市的委员会通过了决议，指控民盟内的主要右派分子，并敦促民盟中央立即端正态度，与那些右派分子的所谓反动观点划清界限。他们还号召各自所辖区域的所有民盟成员，发动一场反对右派分子的无情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决心禁止新闻报刊的自由。这种新闻报刊自由为过去发表所谓错误观点提供了主要场所。中国领导人想让那些在“百花园”中生长起来的“毒草”不再有传播给广大群众的媒介存在。他们担心人民群众极易受到这些右派分子的“恶劣影响”。为此，他们发动了向北京的《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的进攻，因为这两种报纸都是在民主党派的主办下出版发行的。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这里，《人民日报》转载了在1957年

前后以文学评论出名的姚文元的文章，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责《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还发表了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还指出，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这两家报纸，只不过它们存在的错误特别明显而已。在同一篇文章里，该文也说到非共产党的报纸不应该变成党的机关报的复制品；但它坚持认为，共产党党报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非共产党报纸遵循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一篇文章解释道：

> “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就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即6月15日，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检查了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还检查了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发表“党天下”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这次会议延续了两天，新华社报道说，会议得出定论，应该对《光明日报》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承担责任的是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报社总编辑储安平。尽管章伯钧和储安平各自在会上承认了罪

过，但是，章乃器孤单一人站出来，试图为储安平辩护。他说，“我以为，储安平的观点不能够被说成是在政治上偏离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是要为国家尽一份义务。”6月16日，两家上海的著名报纸，《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社论。《新闻日报》的社论是《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办报倾向作斗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题为《办报要有立场》。这两个社论都分别指责了民主党派所办的报纸。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名为《不要再上右派的当了》的社论。该社论称得上是《光明日报》部分编辑办报人员所作的自我批评。紧接着，该报又分别在6月22日和6月24日发表了两篇社论。6月22日的社论题为《在反右派斗争中改造自己》；6月24日的社论名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通过这一系列社论，联合办报的民主党派十分明确不晦地宣誓，表明对共产党的忠心，表明他们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另一家遭到攻击的《文汇报》，也同样地在6月16日发表了题为《欢迎督促和帮助》的社论，接受对该报的一切批评指责。

6月18日，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公诸于世。发表该文的新华社称，本文根据文字记录，经过作者本人过目，做过一些补充的。勿庸置疑，这一篇发表的文章与作者的讲话原文有一些不尽相同。在反右运动的初期发表这一篇经过修改的讲话文稿，其主要动机似乎在于为反右运动的继续提供指导方针，为运动将沿着正确的轨道向人民群众提供行动纲领，告诉他们如何区别“香花”和“毒草”。当然，也许还

有另外两点稍微次要的考虑：其一，由于一直缺乏2月27日讲话的官方文本，人们对其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猜测，甚至在全国引起了纷纷争论。于是，让人民了解他们可以批评党和政府的限制，为了使那些猜测和争论平息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其二，由于有关2月27日讲话的报道在美国的《纽约时报》5月19日和29日的专栏里专门作了评论（这两次报道仅限于中国公众的一些传闻而已），由于这一家美国报纸驻华沙的记者西德尼·格鲁森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本发回了美国，《纽约时报》于1957年6月13日发表了出来，中国认为有必要全文发表，以取代美国发表的文章摘选。

毛泽东讲话的官方文本发出之后，为反右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紧接着，全国上下各个行业，开始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人们根据毛泽东讲话发表文本中的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明确知道了如何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可是，通常说来，人民对于“捉妖”任务可能并没有很高的热情。所以，中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劝说人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党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劝说人民全力以赴地加入反右斗争的行列。《人民日报》在6月28

日，刊载了三篇不同的人写的文章，动员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开展反右运动。6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号召全体共青团员要永远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于此同时，党的报纸，通过巧妙的报道方式，努力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即至少在一些大城市，人民群众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举行了痛击右派的活动。6月20日，《人民日报》在全文发表了毛泽东那篇讲话全文之后的第二天，发表了题为《首都人民读了毛主席的报告，反右派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的报道。新华社也于6月21日报道了北京高教系统的师生向右派分子的"反动观点"发起了反击。新华社在同一本通讯本中还报道说，在6月2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都28所高校的学联主席们一致表明了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愿望，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右派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同月23日和25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章，报道了上海和云南也掀起了同样规模的运动浪潮。

如果说有关反右派浪潮的报道是由政府一手掀起的话，那么，有关反对这场运动的民众骚乱暴动的消息则在反右运动的初期一直被控制住没有报道。1957年6月12、13日，湖北省汉阳县就曾发生这样的骚乱事件。直到8月5日，新华社才公布了这条消息，并报道说，在汉阳召开了一次会议，声讨一小批反革命分子，指责他们"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了一千名左右学生举行罢课、参加其他暴力活动。新华社的报道指责这些示威者捣毁了县党委的办公大楼和县政府所在地，毒打共产党官员，还张贴了许许多多大标语。这些大标语有"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毛

主席要下台了”，“打倒县委会”，“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等等。6、7两个月里，全国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报纸直到7月底才开始报道——新华社从7月30日到8月4日，报道了几起这样的事件——7月底，反右运动才比较稳定了下来。

为了镇压类似的骚乱事变，按照毛泽东主席发布的命令，于1957年6月25日建立了一支新型警察部队，即“人民警察”。这一天同新华社报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相差一天。有关建立人民警察的新条例，在公安部副部长宣读了一份报告之后，由人大常委会第76次会议通过实施。这支新型的警察部队的主要任务在于：镇压反革命；防备、阻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所有这一切，都着眼于保卫人民民主制度、着眼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这个新近颁布的条例虽然主要是为了更有成效地对付反革命分子，可是也有着其他附属的动因，中国领导人通过颁布并实施这种新的严厉措施，也给右派分子构成了间接的威胁，那就是说，如果他们不立即交待自己的“罪行”，那么，就将象对待反革命分子一样严惩他们了。这一动机可以从新条例的字里行间找到证明。在人民警察栏的第6款中有这样的内容：对于破坏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定的公民，尽管他们没有犯罪，也可制止，或给予行政处分。这一款可以作为惩罚右派分子的理由，因为他们的言行虽然算不上犯罪，但可以理解为危害公共秩序，所以应该受到惩罚。

第二节

指控章罗反党集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7年6月26日召开，周恩来在同一天向大会作出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较详尽地罗列了右派分子的罪行。对右派分子的主要指控是说，“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其用意在于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许多右派分子的观点都被指责为“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报告中还说，右派分子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除去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企图建立某些其他国家权力机构，企图建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报告指责右派分子诬蔑人民民主专政，竟把人民民主专政视为一切缺点错误的根源。根据这份报告，右派分子“向往于所谓‘绝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领导的民主”；他们主张用“绝对民主”来取代“集中领导的民主”，“企图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周恩来还说，右派分子主张多党政治，提出共产党的组织从政府机关和学校里撤走，

要求共产党停止在知识分子中招收新党员。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手中把国家的政权篡夺了去。

《政府工作报告》还列出了右派分子的其他罪过。第一，右派分子怀疑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以此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核心发起进攻。第二，右派分子试图竭力贬低苏联真心诚意援助中国的重大意义，反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做是为了破坏中苏友谊，有损于国际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第三，右派分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们要求完全改变政府政策中有关对食品和其他主要消费商品实行计划购销的基本政策。最后，右派分子宣称，过去的私人企业业主已经不再是剥削者，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态度，他们要求从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撤走政府代表，于是被指责为反对社会主义。

1957年7月11日，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于7月12日刊载了这篇讲话。陆定一指出，共产党领导与右派分子有四点"基本分歧"。按照陆定一的观点，这四点分歧分别表现在他们对待社会主义、对待国家的领导权、对待民主，以及对待与苏联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要不要联合苏联？第一点，共产党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要反对社会主义，想要取消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点，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右派分子却坚持认为，中国

不应该仅仅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应该由所有各个阶级来管理。陆定一在讲话中说：

> 右派说：工人阶级领导就是"沟"和"墙"的来源。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应当领导国家。如果领导国家，那就是"党天下"。因此，就应当反对"党天下"、实行"轮流执政"，实行"两党制"，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

第三点，共产党领导要坚持无产阶级民主，右派分子则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们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们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产阶级民主制还要民主"。第四点，共产党领导认为，中苏两国的友谊应该在世界和平和人类利益的基础上得到加强，而右派分子则"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民众，要挑起中苏之间的不和"。

与此同时，在报刊、广播、群众集会上，对右派分子个人进行的攻击也逐步升级。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中，虽然有许多人被挂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牌，但是，其中仅有很少一些人被指责为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成为公开攻击的主要目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召开不过几天，《人民日报》就于1957年7月1日发表了题目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社论宣称已经揭露出"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右派阴谋"集团。社论说，在一段时间里，右派分

子在“章罗联盟”的指导下，一直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联盟”竭力搜集一切敌视共产党和政府的言论，蓄以备用。社论说，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是社会上各种右派言论的总导演。7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民盟中央常委委员闵刚侯写的叫做《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后的第3天，详细地披露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地下阴谋。文章详细地公布了章伯钧于6月6日在北京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的6名右派教授，他们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6人，以及叶笃义、史良、金若年、闵刚侯等其他人。文章说，章伯钧和这些到会的教授们在紧急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并一致认为，成功地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 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条大船一定会被掀翻。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到处散布各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此煽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目的企图是在这条大船上钻几个孔，使大船倾覆得更快。

虽然章伯钧在1957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文章，承认确实召集过这样一次阴谋会议，但是，过分相信这份自我批评中的说法未免不够明智，因为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很有可能是按他人的命令写

出的。另一方面，要用明确无误的事实来证明那些说法的可靠性，很不可能。当然，章伯钧曾经同几个知名人士讨论过全国形势一事并非不可能，但是，他竟能够在对他自己并不十分忠心的人们面前，提出一个推翻现政权的计划一事，似乎非常不可能。譬如象史良，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又是司法部长，据说召集的这个会议她也在场。这一点是完完全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章罗联盟"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章罗联盟的透视"一文。借助他的说法便是：

> ……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似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
> 章罗联盟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
> 在外交政策上，章罗联盟是反苏的，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章伯钧、罗隆基一贯地反对党领导文教机关、

认为共产党不懂科学，所以不能领导科学。章伯钧和罗隆基都不承认苏联有文化和科学，主张科学要学英美。

1958年1月19日，在民盟中央召开的批判“章罗联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史良作了题为《章罗联盟批判》的报告，详尽地列出了这个联盟犯下的“罪行”——《人民日报》于1月20日刊载新华社19日讯，标题为《民盟经过七个月战斗举行最后总攻，反击章罗联盟获得根本胜利》——。以下八点是所列罪行：

（一）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二）反对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文教机关；

（三）反对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

（四）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共产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

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共情绪，企图倒算翻案；

（五）在知识分子中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

（六）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七）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八）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蒙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招兵买马，搜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中建立和扩大反动的组织基础。

据认为，章罗联盟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不仅十分明确，这个联盟还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这一联盟的战略战术是以“对共产党不满的”那些知识分子作为基本群众，号召那些“未

经改造的，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暂时不习惯，甚至有严重抵触的知识分子”。他们尽力夸大共产党的缺点，鼓动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他们劝说知识分子通过赶走工农出身的干部，夺取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领导权。他们散播“绝对民主”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毒素”，鼓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引起对共产党的不满。事实上，他们想在时机成熟时，在中国造成一次“匈牙利事变”。

据认为，章罗联盟为了实施他们的计划和方案，想方设法地夺取民盟中央的领导权力，因为民盟是中国所谓民主党派中最大的组织。为了达到其目的，他们拚命赶走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排斥其他在位的左翼进步人士；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向右转，赞同其右翼观点。章罗联盟还试图大量扩收民盟成员，想要使民盟成员的数量达到一二百万。他们吸收新成员，“特别是吸收一批对共产党不满的右派反动分子。”在大批吸收民盟新成员的同时，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控制民盟中央权力上，被认为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据《光明日报》1957年8月19日报道，他们在3个直辖市，即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全国22个省份中的17个省中的民盟机构里，安插了自己的代言人。而且，在北京的民盟总部也由章罗的手下人实际控制着。这些人可以向全国各地的省和地方的民盟组织发布命令。为了证实这些说法，《光明日报》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截止1957年8月中旬，从民盟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中“发现”了多达500名右派分子。在这500名右派分子中，5名副主席占了2名，38名中央常委中有12名，在总共142名中央委员中，有35名，在41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13

名。胡愈之指责“章罗联盟”为了宣传他们的观点，首先控制了两家主要是知识分子阅读的报纸，《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而且，还创办了一些民主党派的新的机关刊物。

附：

“章罗联盟”骨干分子名单

（根据《光明日报》1957年8月19日未署名报道列出）

地名	成	员
1．北京市：	1曾昭轮	2费孝通
	3潘光旦	4吴景超
	5黄药眠	6钱端升
	7叶笃义	8范朴斋
	9张志和	10浦熙修（女）
	11陈新桂	
2．上海市：	12沈志远	13陈仁炳
	14彭文应	15孙大雨
	16赵文璧	17孙斯鸣
	18陆　治	19许　杰
	20徐铸成	21万鸿开
	22赵　望	23韩　鸣
	24周永德	25程应镠
	26谢仿林	27朱立波
	28曲友诚	29吴　茵（女）
	30莫　绮	

3.天津市：　31王大川　32杨思慎
4.安徽省：　33查车五　34王晋斋
　　　　　　35吴伯敏　36马铁尘
5.浙江省：　37姜震中　38宋云彬
6.福建省：　39何公敢
7.黑龙江省：40关贵武　41许振英
8.河南省：　42王毅斋
9.湖南省：　43杜迈之　44康　德
　　　　　　45陈新民　46屈子健
　　　　　　47刘文炳
10.湖北省：　48马哲民　49戴今生
　　　　　　50项粹安　51张云冕
　　　　　　52陆鸣秋　53朱裕璧
11.甘肃省：　54杨子恒　55李化方
12.江西省：　56许德瑗　57漆裕元
　　　　　　58向法宜　59王秋心
13.吉林省：　60余瑞璜　61杨　清
　　　　　　62丁克全
14.广西　：　63林焕平　64万仲文
　　　　　　65卢显能　66黄中文
15.广东省：　67钟　平　68林孔湘
　　　　　　69应云霖　70童每截
　　　　　　71侯　黄
16.贵州省：　72吴雪俦
17.辽宁省：　73陈彦之　74程厚之
18.山西省：　75王文光　76田羽翔
19.陕西省：　77韩兆鹗　78李子健

20．四川省： 79潘大逵 80赵一明
81李　康 82舒　军
83韩文畦 84张松涛
85罗西玲 86杨志农
87张默生 88张崇古
89吴仲钧

注：

上表中的1——7号，10号，12——15号，18号，20号，38号，42号，48号，77号，79号人名的介绍，请参看第四章附录。

另外，

第11号，陈新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第16号，赵文璧：实业家
第19号，许　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第29号，吴　茵：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
第43号，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
第46号，屈子健：民盟衡阳市主席
第47号，刘文炳：民盟常德市主席
第52号，陆鸣秋：民盟湖北省副主席
第53号，朱裕璧：艺术家，湖北艺术学校校长
第54号，杨子恒：全国人大委员，民盟委员
第67号，钟　平：民盟广东省委秘书长
第75号，王文光：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席
第80号，赵一明：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第81号，李　康：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主任
第82号，舒　军：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任

第 三 节

批判主要右派的观点

在第一步批判的首先是所谓“章罗集团”，逐步地，在人民当中，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当中，又发现了不少右派。这些在知识分子群众中的右派分子，有许多是他们各自专业的著名人物，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十分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受到他们同行业的同事们的指责，而且，对他们的指责又是以他们自己的专业观点和专业行为为基础的。不过，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批判指责，并不局限于他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所做所为，不局限于这一时期的言行；这种批判和指责一直贯穿了他们整个生涯。在文学领域，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丁玲女士，她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丁玲犯错误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1927年，但是，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时期，却没有一部作品曾受到批判。然而，虽然没有什么文件证明，人们还是批判她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反党活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

大量的批判丁玲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北京1958年出版的周扬写的《文学界的重要争论》（泽意）一书，和《人民日报》1957年8月7日发表的题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文章报道。这些批判文章中，对丁玲的主要批判内容如下：

（1）她的早期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作于1927年。小说表现了她的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暴露了不真诚、背叛和欺骗的恶习。周扬写道：

> 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她说谎话、欺骗他人，玩弄男性的感情，她把自己的喜悦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竟然在生活中随波逐流。……非常明显，丁玲对莎菲女士寄予了极大同情，而不是指责她。

（2）她于1933年在南京叛变了国民党，后来又继续同她的丈夫一道生活。她的丈夫也曾出卖了共产党，并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3）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虽然共产党挽救了她，一直把她安排在重要的地位上工作，信任她，让她负责重大事情，可是，她却自恃是作家，有能力，十分傲慢，不把共产党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对党吹毛求疵。

（4）1941年，她写了《在医院中》这篇小说。她在小说中发泄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仇恨。周扬写道，革命根据地的劳动人民被描写得又愚昧又缺乏感情，延安被写成

了一个阴森可怖的地方，就连所有的革命干部，不论其位置高低，都被描述为毫无希望之辈。

（5）她在1942年国际妇女节时写下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的第4版上——暴露了她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仇恨。

（6）在同一年里，丁玲担任共产党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在该报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上分两次载完，一次是42年3月13日期，第二次在同年3月23日期上，两次都在第四版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认为是充斥了捏造虚构之词，目的在于玷辱在延安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据说，丁玲一定在当时同王实味的看法一致，如果不是的话，她就不会让它发表出来。

（7）她1949年写出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在1951年获得了第二届斯大林文学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她却把农民描绘得十分落后、动摇不定，把村子里的党的工作者描写成坏人。（非常有趣的是，这部小说在出版发行时，还曾赢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赞赏，没有听到不同的批评意见。后来却解释说，当时，另外一个右派分子，冯雪峰，控制了中国的文艺杂志期刊，所以，任何不同观点都不可能得到发表。请参阅《文艺报》1957年第21号田间的文章《揭穿丁玲的伪假》）。

（8）她在青年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她说，只要一个人写出一本书来，那么，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把他打倒。周扬写道，提倡“一本书主义”的人，把写作看成是满足他们个人野心的手段，他们以为推出一本成功的书之后，

就可以开始向社会讨价还价，高居于群众之上。

（9）她在道义上支持1954年揭发出来的“胡风反党集团”。

（10）她利用共产党对她的信任，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小集团，企图操纵文艺界的最高层。

思想批判

在对丁玲的批判中，似乎有一半是思想上的批判，一半是政治上的批判。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符合丁玲一人。对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对科学界的右派的批判，都包括思想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批判。从一些出版的书刊及发表的报纸文章中，比如周扬的书，邵荃麟于1957年9月发表的《文艺上两条路线的大斗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及《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的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可以看出，对文学、艺术界的右派分子在思想上的主要批判有如下几点：

（1）他们否认文学艺术的阶级特征，否定党对文学、艺术所起的领导作用，否认让作家和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2）他们反对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总方针。

（3）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文艺与革命政治任务分离开来。

（4）他们宣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

（5）他们认为，文艺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应该

修订、或者废弃。

（6）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文艺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声称这些成就都不真实。

（7）他们模仿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诽谤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

（8）他们推崇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

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右派们所进行的思想上的批判是，他们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真理，竭力想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目的是为建立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铺平道路，为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铺平道路。社会学家受到批判，因为他们企图复苏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已经废弃了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对阶级问题漠不关心，无视历史学和哲学的阶级特性。他们企图复兴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郭沫若在1957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以《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为题，讲到了上述内容。他还讲道，经济学家竟着力于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捏造理论根据。

郭沫若在1957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上，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为题作了发言。《人民日报》于7月6日发表了该文。郭沫若在讲话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右派分子的三种观点应该批判，一、他们反对科学应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二、他们反对按计划发展科学，也反对在重要的学科里发展科学；三、他们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

政治上的批判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不仅针对他们思想上的不合拍，而且更针对他们的反党活动。几乎在每一个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行业中，都发现有一个右派集团。这个右派集团的目的被认为是要从该行业的共产党领导手中，夺取领导权。对这些集团的批判常常包括如下两点：一、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服从共产党的监督，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方针；二、违背共产党的方针，用各种方式去拉拢群众，以便扩大其反党集团的政治影响。

在文学界发现的反党集团是赫赫有名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是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三人都是共产党的老党员，而且在中国的文艺界担任过很高的领导工作。据认为，这个反党集团由来已久，这个集团的主要核心早在延安时代已经形成。周扬写道：

>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以及其他人的反党活动并非最近才发展起来的。早在15年前，他们就有过反党活动……当时，丁玲、陈企霞和她们的朋友在延安时就抱成一团，从背后向革命放冷箭。它们联合象王实味、萧军这样的坏分子，在她们负责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包括《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一类的反动文章。

对这一反党集团，还有下面三点，对他们进行了政治上

的批判：

（1）他们为了证明在1955年对他们进行的正式审查中，他们是无罪的，与非共产党报纸《文汇报》中的右派分子密谋，想让这家报纸公开支持他们的观点，以此使党的威信受到影响。

（2）他们企图在文学艺术范围内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企图另外办一个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报《文艺报》相竞争的新杂志。

（3）在计划筹备将于1957年10月举行的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大会时，他们阴谋要在文艺界搞公开分裂。

在艺术领域内，批判的主要目标是"江丰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由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个共产党的老党员江丰为首领，组织的成员有江丰、汪山（译音），以及其他人。对这个集团的批判说：

> 这些人一直对共产党不满，他们是坚决反对进行改造的资产阶级艺术家，是艺术领域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中，有的是长期反对民族传统艺术、追求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创作方式；有的是一直受到江丰艺术影响的年青艺术工作者，还有的是党内的变节分子。

这个"反党集团"也象"丁陈反党集团"一样，被认为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对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批判包括以下几点：

(1)他们同“丁陈反党集团”相互勾结，积极支持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江丰诽谤道，全国文联在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宗派之争”，并诬蔑领导那次斗争的人“不是好人”。

(2)他们控制了全国艺协机关月刊《美术》的出版发行，使《美术》月刊具有资产阶级方向。

(3)他们计划要成立一个分离的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分庭抗礼。

(4)他们企图组织什么“艺术家联合会”，什么“校友会”，以便进一步与全国艺协的领导争高低。

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批判的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潘光旦、李景汉等，历史学家雷海通（译音）、向达（译言）等，哲学家冯友兰，经济学家陈振汉，政治法律学家钱端升。不过，批判的主要对象集中在费孝通和钱端升两人。在政治上，对费孝通进行的主要批判是他曾是“章罗反党集团”的主要干将，并在这个集团中充当“吹鼓手”。在过去的两年中，据说他以进行社会调查为借口，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游说，进行反动宣传。报纸批判他在57年6月6日的秘密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学生应当加快在中国进行“匈牙利”事变，他还说，教师们应当加入学生，扩大其影响。钱端升也被认为是“章罗集团”的成员之一。报纸批判他在北京法律界内领导了一个小集团，这个集团就是“钱端升反党集团”。埃德加·斯诺在他的书中对钱端升进行了如下的记述：

> 人们批判他与美国"间谍教授"约翰·K·费正清建立了秘密联系。费正清过去曾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人们还批判他企图在另一位美国官员邀请他时，逃离中国。

据报道，这个反党集团主要包括了三名成员，他们是钱端升，以及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罗邦任（音译），以及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铁崖。

> 他们一道设计进行"不同院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建"，并设计组建一所"大型政法学校"，企图接管政治与法律机构的领导权，进而控制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谋是在"章罗联盟"的指导下推行实施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批判的主要目标是曾昭抡和钱伟长。他们两人与另外三名著名科学家一道，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后来受到大量批判。但是，对这些人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批判，也没有在这个自然科学领域内挖出什么阴谋集团。

在新闻领域，受到严重批判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非共产党人储安平。《光明日报》于1957年7月15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本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储安平的主要"罪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为了实现"章罗反党集团"的政治阴谋，储安平让大量带有煽动性质的报道，和大量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刊载，又并不准备批判。

（2）他公然把"章罗反党集团"的政策与办报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今天的报纸应该向《文汇报》学习，向解放前的国民党的报纸学习，不承认报刊可以指导和促进工作，诋毁自1949年以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切社论。他说，这些社论要么是"谄媚的颂歌，要么是教条主义的官样文章"。他坚持认为，社论应该是"带有批评的观点"，应该产生"监督性的"效果，否则，社论还是别写为好。

（3）他有关新闻报道的政策就是"只暴露错误，不承认所取得的成绩"。据说，他曾经公开宣布说，"我们的任务是暴露问题，至于问题的答案，则是共产党的事。"他坚持认为，只要新闻是真实无误的，不论什么新闻都应当发表。他喜欢报道"独家新闻"，喜欢载"内部消息"。他让编辑和记者都别担心惹麻烦。

（4）他说，一方面是新闻报刊，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和政府，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基本矛盾，因为经常有些新闻消息报刊都很想刊载出来，而党和政府却要压制。

（5）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上，他坚决主张应当使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而且主张不加区别的直接使

用。他还想对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政党的各种活动给予更多的报道。

（6）他竭力在人民群众中挑起对共产党的不满，把共产党说成一团漆黑。

第 四 节

确定右派的政治性质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对那些主要目标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批判，都很难给予确定，因为书面证据常常不充分。比如，在文学领域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就是一例。在没有任何书面材料，没有任何记录文件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确定这一“集团”在文学艺术界内企图建立独立王国的呢？再比如费孝通，报纸批判他在1956年到1957年早期曾在全国考察时进行反动讲演。费孝通的讲话在当时的报纸上没有刊登过一次，人们又如何能接受对他的指控、对他的批判呢？有时候，对某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指控是以一次私下谈话为依据，或者以一次毫无记载的私人之间的会晤为理由，这就使得要确定对他们的指控更加困难。下面是几个例子：

（1）……罗隆基对逮捕和关押反革命分子胡风极为不满，去年，他在成都视察工作时，他的忠实追随者范朴斋曾请他吃饭。罗隆基在饭桌上竟说，

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是受到冤枉的。他这种说法还得到了其信徒范朴斋和潘大逵的赞同。

（2）黄琪祥一贯诬蔑苏联，他宣称："苏联缺乏民主自由，那里的气氛很沉闷"。他对他的秘书讲："苏联的物价很高，那里的人民生活不好"。他还对其儿子说道："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几十年了，可是，却没有取得什么杰出的成就。你现在正是二十几岁，等你到五十、六十岁时，你会发现生活还是不很富裕。"

（3）……黄琪祥与反革命分子杨的关系并不是象他自己讲的那种"纯粹的私人朋友关系"。黄琪祥自称，在杨的事情公开之后，他与杨就不再有联系了。但是李却透露说在那以后，黄琪祥仍旧与杨保持着联系。

从以上的例子中不难看出，由于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和指控是源于各种不同的出处，这无疑对确定右派分子的指控带来了难题。对一个人的批判甚至不仅仅看他最近所写的文章，最近所讲的话或最近的行为，而且要追溯到他在遥远的过去，在他的青年时代，都有些什么言行。并且，这些过去很久的言行也并非他在公开场所的言行。下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例，为了进一步地批判一个人现在的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就挖掘这个人很久以前私人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来，

> 1935年，费孝通由他的新婚妻子，大学4年级学生，王的陪同，到广西省去进行社会调查。在广西省内经过目的地时，费孝通不禁掉进了为逮捕老虎设下的陷阱。王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了出来。不幸的是，她自己一不留神，被这个陷阱吞没了。王为了费孝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费孝通又怎样对待她呢？在王死后不过一个星期，他又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不过，人们还是可以考察那些以有记录的证据为依据的批判，检查是否可信。但是，即使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指责和批判都有事实根据，要去搜寻这些指责是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的。只要仔细察看一下对几个主要知识分子的指控和批判，人们就能知道这些指控和批判有多么坚实的基础，也能明白这些指控和批判是按照什么模式提出来的。

丁玲

报刊舆论通常把丁玲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进行批判。为了证实这种批判的正确，人们还常常提到丁玲两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这两部作品分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在医院中》。据认为，丁玲对这两个人物不是轻视鄙夷，而是寄予了强烈的同情，这实际上是"抑制不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也就是说，在丁玲这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反映了作者自己的人格。周扬认为，丁玲写的女

主人公，从莎菲女士开始，都差不多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性格和经历。如果说莎菲女士代表了城市的罪恶气氛中，一个满怀激情的女孩的那种性欲躁动的话，那么，《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虽然被描写成一个安排在"解放区"的年轻护士，却对党的老干部的那种缺乏能力，毫无人性的行为痛恨入骨。即使仅仅同意说这些小说人物具有个人主义观点，具有反动观点，这定会落入一个危险的公式，即这部作品的作者就是作品里的人物。如果一个作家要能够描绘他那个社会里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我们怎能把他看作或认为是他的作品中的某一特定人物呢？对于一个作家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是决不能以他的小说为依据作出判断的，我们应该还要读读他写的非小说类作品，才能提出对该作家的意见。

再比如丁玲的另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吧。这篇文章在反右运动中曾受到批判。丁玲在这篇文章里披露了延安的妇女所遇到的困难和碰上的灰心丧气之事，她认为党的领导人应该对此负责。丁玲在文章中承认说，延安妇女的地位比较其他地方来要高一些，她又批评党的领导人没有实践他们过去许下的诺言，使男女真正平等。对于党奋斗之目标，她没有讲一句反对的话，对于共产党本身，她也全然没有怎么批评。她仅仅是为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内的妇女们的命运提出了为难的问题，只是指出了一些党的领导人与共产党所宣称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事。丁玲受批判，还因为她宣传"一本书主义"，特别是在年轻作者中宣传。在1953年6月她在文联会议上讲话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曾提出了"写一部好书"应当是一切作家的目标这个观点。她的这种观点在她写

出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一书中也能看到。她呼吁作家要努力提高文学作品的水平，恳求作家写出具有长久吸引力的书籍。把这种观点解释成丁玲本人出自于对个人荣誉的追求，或解释成她本人想要在写成一部名文杰作，奠定作家的荣誉基础之后，再到社会中去讨价还价。她也可能仅仅是单纯地，也是合法的，关心着提高文学水平。

丁玲对于文艺工作的特性，对于党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等等问题，都在她的文章中，在她的讲话里详细生动地表明了她的观点。下面就是她的观点。

（1）科学理论（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助于作家了解生活，有利于作家清楚地确定主题……但是，作家必须经过自身的生活实践才能真正抓住主题，也必须依靠自己，才能观察到丰富的感情活动和意识活动。

（2）文学的基本职责在于教育人民，在于向人民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文学又不是普通的宣传，不是教科书……虽然现在也有人如此想。

（3）我并不反对我们目前的创作工作应该组织起来进行，但是……作家不象小孩，不能离开母亲，作家必须能够独立自主。

显而易见，丁玲并非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她也不否认作家的职责在于提出革命思想。丁玲所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作家的创作自由所进行的不断抨击，她所反对的是党的领导们日益提出的把文学改变成宣传的倾向。如果说丁玲公开谴责了党的领导人对于文学创作过程横加干预的话，那么，她的动机也并非不执行党的路线，她的动机在于要使文学的水准不至于在党的革命目标的圣坛上给牺牲掉了。如果说丁玲推崇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那么，她并不是一个反对党的集体主义号召的十字军战士。党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的编辑在1953年该杂志刊载丁玲很受欢迎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这样评述她的："她丝毫也没有偏离过党的路线。"

费孝通

对费孝通的主要批判是说他妄想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学。这是郭沫若在1957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这一篇文章里公开指责的。这一批判主要是根据费孝通于1957年2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恳求把社会学恢复起来，在大学里开设社会学课。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诸如"党与非党人士的工作与合作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行使职权问题"，"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就业与技术人才的安置问题"，"人事管理制度问题"等等。费孝通建

议说，可以在分析和统计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调查"。以便为以上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他这一篇文章的"异端邪说"之处，就在于他反对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问题的分析方法，热衷于使用一些西方的社会学方法解决问题。费孝通还要求由各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社会规化，而不是由不称职的党的领导进行这种规化。

费孝通的另一篇受到大量批判的文章叫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说，知识分子正在经历早春天气那种不稳定、多变化的时期，因为他们担忧自己直言不讳的言语引起的反响，仍旧对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感到犹豫不决，不能全力投入这个运动中去。他迫切希望知识分子抛弃这种态度，他还批评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兴趣如此淡薄，批评他们盲目地把党的干部所宣讲和实施的东西当作完全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他同意认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他要求应该在学术领域，在文化和科学工作中，提高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他要求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以便让知识分子在毫无约束和担忧的气氛中追求自己的事业。后来，这篇文章被解释为一篇煽动性文章，是要号召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只字未提反对社会主义。他对共产党也没有做什么反面批评，他只不过指责了知识分子当中的消极被动态度，指责了他们的胆怯情绪，其目的还是为了能使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取得应有的胜利。如果说费孝通认为党的干部不是

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是持有这种看法的。他们也曾坦率地承认说，有许多党员违背了党的原则，他们认为纠正党内的缺点错误是完全必要的，他们还希望人民能够指出党员的错误。

人们会十分有趣地注意到，费孝通受到的批判，与其他许多人受到批判的情况一致的是，即使他自己曾有过错误观点，虽然已经作过自我反省，也仍然将被用来充实当今对他的批判。比如费孝通在1956年第11期的《人民中国》杂志上，曾发表文章，指出了自己早期著作中所阐述的“错误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 在旧中国的农村，我在各处都看到了地主把农民榨干的情况，他们要求收取高额地租，向农民放高利贷……我反对这种土地所有制，但是，我当时能提出的唯一建议便是要地主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我不愿意看到任何形式的斗争，不愿意看到这些会引起流血事件发生的斗争，所以，我反对由农民发动的或由农民加入的任何形式的土地革命……我当时看到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可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却简直不可能实现。只要地主手中仍然掌有政治大权，期待着他们自动放弃特权只能是幻想。

可是，费孝通曾经写出的三部主要著述，即，（a）1939年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农民生活》，（b）1945年芝加哥出版的《世俗之中国》，（c）1943年芝加哥出版的《中国的乡

绅》，统统都被引用来当作他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的依据。人们同样会有趣地注意到，费孝通受到批判还因为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与西方学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在这些学者中，有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他的妻子，有费孝通过去的导师、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人类学专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斯基教授。

冯友兰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遗传的继承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冯友兰惋惜地讲到了中国哲学史课程没有留下多少教授给学生的内容了，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北京的领导们把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许多内容都确定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冯友兰着重提到了宋朝和明朝的两家很具影响的哲学流派，即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他说，这两个学派的命题完全被上面领导给否定了。他坚持认为，传统中国哲学的某些概念和主张是既具永恒性又具普遍性的。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应当受到忽视，而应当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篇文章最先遭受到有名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的批判，接着又遭受到其他人的批判，作者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胡绳在1957年3月29日和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文章。其他的批判者还有关锋，关锋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1月号的《哲学研究》杂志上，题目是《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这些文章批判冯友兰对阶级问题漠不关心，批判他无视历史学和哲学的阶级性，还批判他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

乔装打扮下复辟传统中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即使人们同意冯友兰在强调传统中国哲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上犯了错误，那么，在党要求人民把思想暴露出来的时候，冯友兰暴露出自己的“错误观点”又有什么错误呢？即使同意冯友兰的观点是推崇唯心主义，难道这种观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倡导者所不允许的吗？

第　五　节

主要右派纷纷检讨

只需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批判，我们就能够十分明白，不论是在确定批判的方法、范围上，还是就其批判的思想内容而言，对于党内党外人士是没有加以区别的。但是，人们十分有趣地注意到，尽管所有党外的主要右派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已经被披露了出来，可是，没有任何知名的党内人士在全国人大结束以前被定为右派。全国人大于7月15日结束。大会结束之后，许多老党员才先后受到批判。这些老党员中，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江丰、陈涌、曾彦修、吴祖光，等等、等等。如果以为党的领导们对于这些人的言行中的“异端邪说”在人大会议结束时才意识到的话，那真是过于天真了。如果他们仔细观察“百花园”中“毒草”的生长过程的话，他们一定不会考虑到什么党派关系才采取行动。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推迟对党内的不忠实其教义者进行批判的呢？原因可能在于党的领导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有意回避党内不同等级的分离，因为这一次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已经被批判

的主要右派分子那里推出自我检讨、自我贬抑的东西。这些主要右派分子又集中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民主党派的代表团里。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最后三天，也就是7月12、13、15日（14日大会轮休），这些党外右派分子纷纷进行了自我检讨，其中，12日有两人作了自我检讨，13和15日分别是5人和13人作了自我检讨。这些进行自我检讨的党外主要右派分子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琪祥、陈铭枢、费孝通等人。这些自我检讨十分可能不是自愿作出的；检讨者一定是受到了猛烈的声讨，受到了人大会议内外小组给予的压力要他们重述其“罪行”，这样他们才被迫在公众面前自我贬低。要推出这些自我检讨的幕后领导者的动机，很可能是要砸破自我检讨者的追随者们心目中的偶像，造成一种用公众的情绪来反对这些自我贬低者的气候，并促使其他右派分子也进行模仿。

要报告这些自我检讨的全部内容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益的是注意观察这些自我检讨的模式。这些自我检讨并不仅仅局限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的言行，而且延伸到一个人的一生的事业。有几个人的自我检讨还从家庭背景和阶级根源开始。这样做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对他们的批判也追溯到个人的身世。其次，自我检讨的人还不仅仅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还要指出其他右派分子犯下的错误，并且要声讨这些错误。由于批判右派分子常常指责他们组成集团，所以，自我检讨的人很有必要交待一些批评检讨这些集团的事，在交待当中，他们还须一致表示十分憎恨自己过去的行为。第

三，自我检讨者们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表达了对人民的感激之情，因为党和人民指出了他们的错误，还给他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这些自我检讨并非能够满足有些进行批判的人，他们认为自我检讨的人不够诚实。可以引《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的话来证实这一点。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发表的，题目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这篇社论中说：

> ……有些人的检讨表示有悔改的决心，虽然检讨的诚恳程度各不相同，有些人的检讨，究竟是企图用避重就轻的欺骗手法蒙混过关；……还有些人的检讨，显而易见是还没有交待悔改的诚意的。

附

在全国人大作自我检讨人员名单

姓名	党派	检讨日期	自我检讨题目	资料来源
叶笃义	中国民主同盟	7.12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已的错误	《人民日报》(下同)7月15日
韩兆鹗	民盟	7.12	愧恨交集	7.16
毕鸣岐	民主建国会	7.13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7.16
费孝通	民盟	7.13	向人民伏罪	7.14
黄琪翔	民工民主党	7.13	请求人民的宽恕	7.14
储安平	九三学社	7.13	向人民投降	7.15

1	2	3	4	5
龙　云	民　革	7.13	思想检查	7.14
章伯钧	农工党 民　盟	7.15	向人民低头认罪	7.16
罗隆基	民　盟	7.15	我的初步交待	7.16
章乃器	民主建国会	7.15	我的检讨	7.16
黄绍竑	民　革	7.15	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7.16
陈铭枢	民　革	7.15	自我检讨	7.16
谭惕吾(女)	民革	7.15	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7.17
张云川	农工民主党	7.15	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	7.16
潘大逵	民　盟	7.15	我承认错误	7.17
李伯球	农工民主党， 民　盟	7.15	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祥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	7.17

马哲民	民 盟	7.15	我要重新做人	7.18
黄药眠	民 盟	7.15	我的检讨	7.19
宋云彬	民 盟	7.15	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7.21
钱孙卿	民 建	7.15	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7.22

第四章

反右运动第二阶段

第一节

揭露批判党内右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党外主要右派分子的纷纷检讨之中宣告结束，但是，反右运动的帷幕并没有因之而拉上。因为对于这些党外主要右派分子的检讨都不感到满意，批判斗争继续发展着。这些右派分子所受到的新批判是说他们不够诚恳，有欺骗行为，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向共产党内发展。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该社论承认说，党内也存在着右派分子。社论解释说，有些人参加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为党的利益服务，这些动机不纯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就会叛党。社论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党员，这些党员仅只同意一部分党的方针；党准备把他们不同意的那部分方针付诸实践时，这些人也会叛党。报纸还指出，党内还存在第三类党员。这一类党员不能坚持自己的坚强革命意志，他们易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一类党员在革命斗争的长时期内的某个重要关头也会叛党。

在同一篇社论里，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做了这样的批判，

即他们"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至于党内右派分子的势力，社论宣称，就数学上而言，他们仅是很少数。社论接着又说，"在种种问题上表现有右倾思想、右倾情绪的人……在党内远不是极少数，"而且，"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许多党组织内还有相当市场。"该社论一面强烈地呼吁共产党员对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严厉批判，绝不能对他们表示出"温情主义"，把党内右派同党外右派一样对待，一面又承认党内还存在着有些人，他们觉得对党内的右派似乎可以宽容些，不必要象对党外右派一样地给予反击"。

《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这些话把许多事情给澄清了。首先，党内党外右派分子都是站在同一个根基上，因为他们都是在执行党的使命和抛开党的领导上向党发起进攻的，所以应当给予同样对待。其次，所谓的右派分子思想已经渗入到许许多多党的机构中去。第三，号召党员向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在一部分党员中并没有引起回响。

最后一点则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一点证实了在反右运动的顺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主要障碍。《人民日报》在7月28日社论发出整整一个半月之后，于9月11日又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又一次呼吁党员们在对待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克服"慈善心肠"，要对那些"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同事们，毫不手软。这种呼吁倒完全必要，因为大部分的党员并没有放弃过去的看法，他们仍旧把已经被声讨为右派分子的人视为老同

志。《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写道：

> 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

但是，表现出"温情主义"的还不仅仅是党员，也不仅仅是只适用于党的老同事们而已。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早在1957年7月8日，一切批判的锋芒都对准着党外人士时，《人民日报》就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发表了题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的专栏社论。社论说：

> 抱有这种倾向的人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包括党员在内，之所以在对右派的斗争中总是犹豫不前是由于人民对于右派分子都抱有崇敬之意呢，还是因为人民对于右派分子的罪行缺乏足够的信心？答案很可能是其中之一，也可能两种因素都存在。可是，人民仍旧不愿意自己站出来揭露所谓的右派分子，不论

是党内右派还是党外右派，他们都没有自动出来批判。如果不用威胁的手段的话，也需要做许多劝说工作才能使人民加入这场反右运动。党一再号召说反右运动是全体人民的大事，可是响应号召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一点可以从党的领导最后终于被迫付诸强制性措施一事中找到证据。1957年7月26日，国务院对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宣布，说这是他们的义务，要把参加反右运动和反右斗争看成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份内义务。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28日，《人民日报》通过发表的社论，号召全体党员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站在反右斗争的最前线。

第二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中央领导认为，仅仅依靠强制性措施不足以让广大的人民参加支持反右运动。要全面揭露右派分子的言行，有必要强制性措施和思想开导双管齐下。可是，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所实行的思想开导情况却不大成功，在知识分子身上没能起到可喜的成果。尽管他们过去认为，只要知识分子能够改造过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那么，他们就能带领广大群众向党宣称的奋斗目标前进。先前的失望促使中央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到了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身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础。它们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两股力量。用社会主义愿望教育工人和贫下中农，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斗争武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不能在这些阶级内开展，一领导人说。毫无例外，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旗帜不能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举起。不能把这些人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12月9日，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其工作报告中说，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个体小商贩中，只能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在他们中开展反右斗争。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这些阶级高高在上、不受波及，很可能另有一一个原因。党的领导人很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里制造“左派”和“右派”的分离。如果造成这种分离，势必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起到相反作用。

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布了指示，主要是要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报道，中央曾在同年7月召开了青岛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说他个人提倡在农村中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会议是由一些省市的党委书记参加的，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性质和情况，以及对反右斗争的性质和状况都作了全面的估计。他对运动的深入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可是，毛泽东的讲话却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的社论。社论详细地解释了进行这种大放大鸣大争或者说开展教育的必要性，详细地解释了运动将如何开展，还详细解释了要大鸣大放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指示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的这些社论都说，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反社会的坏分子反对农业合作社，反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他们乘机而起，恫吓农民，妄图夺回失去的土地；他们挑拨工农的不和，甚至欧打政府工作人员。因此，为了提高农村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农村中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必要的。8月10日的社论还

说，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并且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妨碍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农村中，党的干部也并不是没有右派分子的思想。他们中有人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问题上并不坚决，他们错误地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立场出发，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农村中，当时存在着骚乱的情况。许多地区的报告表明，在县、乡、村镇一级的农村干部中，有一些人与工人阶级不相一致，有的人严重违法犯纪，还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十分严重。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浙江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当年春天，有一小部分人在一些地区煽动骚乱；有些合作社解散了，在一些地方的粮食供应上出现了人为的紧张状况；在有些地区，生产水平下降，作物减产。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反击那些积极参加反社会主义各种活动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他们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为了激发爱国家、爱合作社的精神，是为了教导人们养成勤奋、简洁地管理合作社、处理家务的习惯。对于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说，要开展“公开的群众辩论”，特别是在下面四个中心题目上展开辩论，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指示还补充说，在秋收之前，辩论的主要问题要集中在统购统销上，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一年统购统销下达指标的顺

利完成。指示还提出要上级党委向农村地区和合作社派遣工作队，以便帮助这些地区和合作社的党组织进行这些辩论。

中国领导人提出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下述四项主要目的：

1．通过在农民中进行广泛的辩论，分清是非，使农民们能够加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在富裕中农当中，批驳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努力克服资本主义对广大农村的影响，

3．揭露并痛击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4．在广大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检查农业合作社的工作，检查党员、团员的工作，改善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所有这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的纯洁性，巩固农村合作社，保证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也为了提高农业生产。

虽然说在农村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分作用在于打击农村中的“敌人”，但比较起在城市里大举的反右运动来，并不具有同样的戏剧色彩。事实上，在农村中所进行的这一切努力的基调都要低得多。农村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中国领导人可能考虑到要控制好一场完全成功的清理运动会十分困难；他们或许也曾怀疑，如此进行一些打击是否会赢得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第二，既然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他们的批评言论由于乡村严重缺乏通讯工具而很少地传到了农村，因此，要在农村中推行广为宣传

的进行反击，倒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进行反右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刊中着重意识形态的《学习》杂志作了评论，大意是说：

> 有的同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反右斗争混为一谈，这完全是一个误解，这两种运动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由全国人民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敌我之间的较量，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在人民中进行自我教育。

十分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在反右运动发展初期是把右派分子归入人民的行列之中的，可是，党的这个机关刊物则在该运动的后期不再承认右派分子也在人民的行列里。中央领导人曾说，虽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人民的行列里，他们却站在社会主义的反对面，甚至做不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后来，右派分子就被叫做“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尽管党的宣传机器和党的领导人都没有给予解释，但是，似乎很有可能的是中国领导人看到人民群众在对待右派分子的态度上总是表现出宽大温和这一事实，便认为，只有把右派分子贴上敌人的标记，才可能让人民群众感到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是法律上，也是道义上的义务。

虽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是在农民中展开的，但是逐渐地，这一运动也介绍到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当中，1957年

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在连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根据该指示精神，开展这个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广大士兵和连队干部进一步弄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使他们在当前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和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能够站稳立场，提高觉悟，并且使他们了解农业合作社，粮食及其他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巩固工农联盟这几项根本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总政的指示还指出，开展这样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小组辩论”展开，教育的中心题目规定为五项，即，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遵守纪律和改善服役态度问题，第五、官兵关系问题。

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的工业企业中开展纠正工作作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次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阶级的作用和责任更加明确，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更加明确。在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也同在农民和士兵中一样，主要是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其中心题目是，第一、进行新旧社会比较，对两个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进行比较，以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阶级的责任问题，第二、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三、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第四、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第五、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在全国所有教育单位里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活动正在着手进行。新华社在1957年8月22日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大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专门建立的在意识形态上培养干部的大学——党委为了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近拟定了一个教学计划。新华社报道说，这一教学计划将在下一学年里付诸实施。这个教学计划把全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考虑在内，当然学生更不例外，决定要实施一个学年。这一学年内，每星期用一天的时间进行这个教育。这个教学计划准备开设各种讲课，其讲课题目包括：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之伟大意义，二、立场问题，三、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五、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六、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问题，七、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八、巩固民主集中制问题，九、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本位主义问题，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十一、巩固国际间社会主义的团结、巩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问题，十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地区民族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于1957年9月20日举行了该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的开学式。在开学式上，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讲了话，归纳了这个教育课程的目的所在。他说：

>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一门课程，要彻底粉碎右派的反动言行。

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发出了联合通知，要求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联合通知说，在1957年的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至1958学年的第一学期内，过去对这些学校的学生开设的思想教育课程，比如，青春期常识、政治课常识、社会科学常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课程，都须改为一个课程，即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通知要求要把反右斗争当作中心课题来讲。通知又补充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必须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精神开设和授课。通知还说，教育部与共青团中央一道正在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为这门思想教育课准备教学纲要、准备参考资料。但是，在他们把教学纲要和参考资料准备妥当之前，他们希望学校的领导选择具有广泛的教育性政策的问题开设课程，组织参加生产劳动和进行深入教育的问题，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对于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统购统销问题，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等等列入教授课目。通知还规定，新开设的这门课程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中，每周讲授一个小时，在初中其他年级的学生中，每周讲授两个小时。

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获得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发布了在各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内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详细安排计划。中央宣传部在其报告后面附上了新的教育课程安排计划。报告说，建立本门课的课程安排表的目的是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传统教学态度，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虽然报告中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一文应当成为该课程的授课核心，但是，该课程还应该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文章，还要包括党的一切重要文件。1957年12月17日，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指示，根据指示的精神，全国各高等院校要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该课程讲授的主要材料，是毛泽东的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同时要求学生学习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党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指示规定，这门课程，每周要行课 8 个小时；对于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课时还可以增加。

第 三 节

各行业右派相继明确

党的领导决心让反右运动成为全体人民的一件大事，于是，他们宣布，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把参加反右运动当作自己的义务。如此结果，反右运动就扩大到了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人民之中。除此之外，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就把反右运动当作该运动的中心题目对待，全国上下又投身于关于“正确”和“错误”的大辩论中，每一个成年人也必须进行自我批评，或者批评别人。到中国领导人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截止，全国对于主要右派分子的批判高潮已经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接下去，主要集中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军队，工会、地方政府、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中进行“清理工作”。与过去批判主要右派分子的形式相同，现在的批判主要限于这些部门内的个人和小团体；可是，与过去的批判又不相同的是，对政府机关等部门的人所进行的批判却没有证据。如果说，那些主要右派分子在反右运动发动起来以前所讲的话和写的文章都是公开的话，如果以这些讲话和写的文章作为

基础，在运动开始之后对这些主要右派分子进行的指责和批判，也还能加以核实。可对于政府机关等部门的人所进行的批判，由于这些人没有公开讲话，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可以备案，要加以核查就不可能了。但是，指责和批判本身值得很好地研究，因为这些指责和批判就反映了党的政策，反映了紧张气氛。

要叙述对上述所列部门内数以百计的右派分子进行的批判，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的。然而，检查这些批判的性质，了解受此批判的人是如何确定的、有无什么模式进行确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下面就先谈谈政府机关内的情况。对于政府机关内的右派分子所进行的批判，都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不服从上级下达的指示，第二、企图取消党的组织在政府机关内的职权，第三、曾质问政府部门内党员的工作能力，第四、对政府机关的职能进行过相反的批评，第五，反对党的政策和决定，第六、否认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夸大遭受的失败，第七、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十分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在政府机关里，与文艺领域内不同的是，没有发现任何右派集团，而且，也没有发现，政府机关里的右派分子与章罗集团有任何瓜葛。在政府所属的大多部内，受到批判的都是右派分子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但是、在监察部里，由该部副部长王汉（译音），第二司副司长彭达为首的一个团体受到了严厉批判。尽管如此，这个团体也没有受到与章伯钧和罗隆基有什么牵连的指控。在政府机关内，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不少是党龄很长的党员。王汉（译音）入党已经有二十五年，彭达也为党服务

二十年。

同在政府其他部门一样，在司法系统中批判的右派分子也包括有党龄很长的党员，有身居要职的干部。在最高司法系统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内，有4个身居要职的人——其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受到批判。这4人分别是贾潜——刑事审判庭庭长、共产党员；朱耀堂——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共产党员；林亨元——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民盟成员；以及鲁明健——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对他们4人的批判有下述5点：第一、鼓吹"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抗拒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有关审判工作决定，要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要党的干预，第二，诬蔑人民法院内党组成员不懂法律，第三，违背中央政府关于人民法院工作的指示，反对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作出的决定，第四、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减刑或免罪，主张对敌人进行教育改造。反对对敌人实行专政，第五、试图恢复国民党时期的司法传统，坚持资产阶级的司法观念。对于许多其他人，包括几个省的法院院长，都进行了类似的批判。在司法系统的这些受到批判的大多数右派分子，都被指控是在章罗集团的指使下进行活动的。

在人民解放军中，人们承认说，有小部分右派分子已经揭露出来，但最初却没有道出他们的姓名。《人民日报》1958年3月29日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报道了把军内的一位打成右派分子的高级干部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决定。这位右派分子便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沂，陈沂被授予过解放军少将军衔。报纸上讲，陈沂"犯下了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报纸却没有披露他到底犯

下了那些罪行。除去陈沂之外，人民解放军内再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被点名批判，不过，有资料说明，军内有其他军官也是右派分子。根据1963年台湾出版的一部叫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间的微妙关系》的书，解放军内还有两位右派分子，一个叫李涛（译音），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另一个是王成（译音），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中国领导人曾说：

> 在过去几年里，部队中的有些军官竟滋生了个人主义，出现了不顾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倾向。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诸如存在着和平环境、部队招收大量新兵，以及在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偏重强调部分军官的专业水平等原因造成的。

1957年7月30日，解放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目为《党的领导是我军取胜的决定因素》的社论。该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叫嚣在部队里取消党的领导，他们只是徒劳地暴露了自己阴谋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企图。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中，我们了解到，部队里的所谓右派分子，是指那些特别强调专业技术、特别强调军事观点的军官，他们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武器，而不是人；他们重视军事规则，重视规章制度；他们质问了在严格的军事事务中党的领导的干预情况；他们不重视党在部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工会领域内，所受批判的活跃分子为数不多，他们当中没有人身居显赫的地位。但是，一个叫做高原（译音）的工会活动分子，党龄达16年之久，是全国总工会的档案部主任。高原曾在工会干部培训学校里讲话说，工会的工作可以独立于党的领导。据说，在1956年全国总工会的年会上，他还说，工会干部所受的待遇应当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所受的待遇相同——这个要求被认为是“煽动反对党中央。”报纸还批判他的观点，说工人参加工会既不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了帮助经济建设，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因为宣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许有用，但却不是工会的精髓而受到进一步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党强加到工会身上的。”他在谈到国家与工会的关系时，被认为曾讲过：“国家有时也会犯错误；国家也可能会伤害工人的利益。”

在地方政府中，那些头面人物，比如省长、副省长，也受到了批判。共有4个省长和9个副省长受到指控、受到批判。

这些省长副省长之所以受到指控、受到批判，据说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省份内的党政机构里搞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与“章罗反党联盟”完全是另一回事。下面是指控和批判他们的要点：第一，攻击党的农村合作社政策、肃反政策和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政策；第二、反对党对政府行政工作的领导，第三、在党内建山头、拉宗派；第四、搞地区主义、危害国家利益；第五、在政府工作中消极被动，不负责任；第六、在文化领域内，默认右派分子的活动。

在宗教团体内，尽管也对中国佛教协会的一名成员和中

国圣公教的一位牧师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右派分子，但指责和批判的主要火力集中在天主教的身上。对天主教会内的右派分子主要指控是说，他们阴谋夺取该教会的领导权，以便把中国天主教变成一个执行梵蒂冈反动政策的工具。他们说，“罗马教皇是全世界的天主教之主，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人们批判他们煽动天主教民向共产党和政府发动进攻。他们还要求对反革命案件的案例进行修订，宣称“……这些案子所涉及的天主教会并没有政治性质，这些是一个信仰问题，是相信唯物主义，还是相信唯心主义的问题。”

在少数民族当中，受到主要攻击的是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的主要指控在于他们宣传“地方民族主义”，他们反对各民族在中国的大融合。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乌兰夫在1957年8月5日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发言中对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并于1967年4月19日被解除职务。后来，在1973年召开的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复职，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兼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说，“地区民族主义又开始重新抬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变成了最为危险的思想倾向”。这是赛福鼎于1957年12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共产党新疆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的内容。赛福鼎是维吾尔族人，后来升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1973年，又给他重新恢复了文革前的职务，取代了林彪的支持者龙书金，并在同年8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报纸批判乌鲁木

齐市市长，指控他反对向少数民族教授汉语，试图用拉丁字母取代他们的文字，批判他责难说的共产党组织内主要是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的话，他还责难土地集体化政策。不仅如此，他还因要求新疆独立而受到指控和批判。中国回族文化协会副主席马松汀（译音）也受到了批判。他诋毁自己所在的那个协会是一个把回族人同化成汉人的机构。

第 四 节

捍卫党的方针政策

党的发言人并不仅仅局限于完成揭露右派分子、批判右派分子的任务，他们总是以同样的热情，努力捍卫党的方针、政策、捍卫党的行动方案。这些方针政策曾在那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里受到攻击。

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主要批评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控制了全国的每一角落，而非党人民则在各处都受到歧视。党的一名重要发言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他的一篇题为《在干部政策问题上驳斥右派》的文章里承认，某些宗派主义之类的错误是有发生，但是，他又十分明确地否认了关于党的用人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一说法。所谓的右派分子曾批评说，共产党在用人政策上“注重德行，忽视才能。”对于这样的批评，安子文回答说，党把“德行和才能”两个方面都当作挑选干部的标准。这里提到的“德行”是指“政治品德”。这里提到的“才能”则是指“专业能力。”“看一个干部是否有‘德行’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看他是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一个干部的‘才能’则是指他的‘专业能

力’，那就是说，他的知识、经验、以及使他能够胜任某种工作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才能只有在它用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时才变得可贵。安子文又说：

> 我们绝不能撇开他的“德行”来孤立地看某人的“才能。”换句话说，我们绝不能撇开他的政治立场来孤立地看他的才干。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强，他对人民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并不是用于为人民服务的才能，而是用于反对人民的才能。

《人民日报》于1957年7月23日发表了题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这篇社论，进一步强调了重视政治背景的必要。社论中说，人不是机器。机器可以为操作机器的人服务，而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他自己思想的支配。只要人类世界存在着阶级，一个人的政治行为总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

有批评说，在挑选和提拔干部时，共产党员总要比非党员受到青睐。北京党的发言人在答复这种批评时，努力想证明，按照统计数字，这种情况并不真实。他宣称，根据1956年底对区以上级别干部的统计数字说明，党员所占比例还不足三分之一，而非党员的干部，包括共青团员在内，占了其余的部分，即使把共青团员担任干部职务的撇开，非党员干部也占了百分之四十五。但是，他又承认说，在政府机关更

高一层次的干部当中，党员比例占了绝大多数。比如，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里任职的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主任、副主任共有192名，其中有131名是党员。再比如，在国务院下属的各个部、委当中，共有272位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其中有226位是党员。在这两个等级的干部中，党员人数分别占了67.7%和83.1%。在谈到提拔干部的问题上，安子文例举了三大部门的情况，即工业部门，贸易财政部门和教育文化部门。这三大部门在1956年内提拔的干部当中，党员人数分别占了71%，61%和58%。如果把共青团员也加入在内，其百分比将分别上升至80%，81%和74%。为什么党员人数占了领导干部人数的绝大多数这一点，这位发言人作了如下说明。其大意如下：

>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所以，这一特点不能不在我们国家的机构内的成员组成中表现出来。我们认为，工人阶级领导我们国家是由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行使权力的。因此，共产党员人数占了各级国家机构中的领导干部人数中的绝大多数，是十分自然的。

不过，周恩来曾对非共产党员们给予一些安慰。他说，共产党的政治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都将被消灭，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将消失

掉。"

但是，共产党人另外还在用人上面制造差别。非共产党人并不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获得较高的职位，但是，他们指出，即使这一些人在其职位上也没有与职位等量的权力。周恩来本人注意到这些批评，并承认说，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的干部在对待非共产党员的作用和行使职权上，没有赢得别人应有的尊敬，有些甚至采取歧视的态度，把非共产党员干部排斥在一边。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责怪一些非共产党的干部，说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尽职尽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恩来认为，一方面，共产党人应该克服宗派主义，全心全意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另一方面，他告诫党外人士要注重自己的职责，努力提高思想水平。

对于接受教育的机会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7年7月5日举行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承认在过去对5种人给予了照顾。这5种人分别是，第一种，少数民族学生；第二种，海外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第三种，工农家庭和工农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第四种，复员退伍军人；第五种，革命烈士的后代。郭沫若是在一篇题目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讲话中这样说的。他争辩道，这5种人需要国家的特殊照顾，但他却仅仅解释了为什么照顾其中的三种人。对于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来说，郭沫若认为，他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前的整个时期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在解释对革命烈士的后代给予照顾的原因时，郭沫若认为，这些小孩的家庭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做出牺牲的。他还借助统计

数字加以证明的是，即使有优先照顾政策在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出身的子女，但是，他们在大专院校内的学生比例中还是占少数。这表明了他们的比例还值得增加。他宣布说，1956年9月，在大专院校内的工农出身的子女占学生总人数的34.29%，在研究人员当中，他们只占了17.45%，而在科学院内的专职研究人员内，则仅占了5.92%。他又补充道，在1952年至1956年期间，送到苏联去深造学习的学生中，有30.1%的人出身于工农家庭。

在谈到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水平差异的矛盾时，周恩来并不认为其差异特别大。如果说，工人们的工资要稍稍多一点的话，这是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要比农民的劳动生产力高出许多的原因。在谈到工作人员的工资分为高薪和低薪不等的问题时，周恩来一面指责工资的高低差别有的不合理，但他坚持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由国家根据工作种类的不同而制定工资收入的差别。如果取消了这些收入差别的话，那么，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对于改进职业技术和专业技术来，将会起到不好的作用。

对于有人指责共产党违犯政府法律，直接向人民发布命令这一点，《人民日报》在1957年7月10日发表的题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的社论里进行了答复。党的这家报纸说，向人民发布的命令或指示分为三类，其中有两类是政府负责的，有一类由党发布。社论同意说，凡要求人民绝对遵守的命令，都必须由政府司法机关发布。"党是群众的思想核心和政治核心，而不是一个有必要强行实施某种不利于群众的强制性命令的国家机器。"另外还有一类涉及到日常行

政管理事务的命令。社论同意，这一类命令也是政府关心的事。但是，第三类命令，即那些对政府工作的有关指导性方针和政策的命令，或那些与人民当中要完成的政治任务有关的命令，是一定要由党来负责的。周恩来在谈到这同一件事时曾说到，在向群众发布政治号召，向群众宣布有关政策的决定时，党不仅完全没有妨碍政府的工作，而且还给政府以很大的帮助。同时，他又承认，也存在着共产党的组织负责了全部工作，接管了行政工作的现象，于是，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中，这些组织绕过了行政部门，直接干涉了他们的工作，周恩来还表示说，这一类的事情一定要加以纠正。

有人批评说，共产党过多地干预了专业技术的工作，周恩来在回答这种批评时坚持认为，在《宪法》上写明的共产党应全面领导全国这一点应该理解为“主要就政治意义上”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每项工作都必须由党来“直接办理”。“确切地说，在许多专业领域内的工作应由专家们负责”。但是，他又补充道，专家们却不应当以为只有他们才称职各自领域内的领导工作。他强调了党在全国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权利。周恩来又继续讲道，

如果以为“外行”没有权力领导“内行”的说法是指只有专家们自己才称职领导本专业领域的工作，那么，这不仅仅忽视了政治要领导科学领域这一点，而且等于要求在科学研究领域，完全取消任何统一领导的可能性。

周恩来还对每个部门、每个机构里有必要存在党委会这一点作了解释。他说，党不仅应当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方案，还应当负责这些政策和方案得到准确的实施和执行。他强调了党委的这种监督作用，而且还强调说，为了更好更正确的进行这种监督，党委成员应当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职业水平。如果说周恩来的态度尚属于温和的话，那么，有些过于激烈的人竟宣称，党委完全能胜任专业技术工作。在谈到对于政法工作的领导能力时，冯若泉在1958年发表的题目为《驳斥贾潜的“司法独立”这一反党错误观点》的文章中讲道：

怎么能说“党委不懂法律呢？……党委会对整个局势了如指掌，了解整体的政治条件，了解敌我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人民的感情和要求。所以，他们若就整个相关的情况而言，是最称职来衡量一个案子的肯定和否定意见，也能够正确地指导各个部门的工作。

《人民日报》于1957年12月24日发表了若泉、何方的题为《不许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质》的文章，为党干预司法工作进行辩护。文章中写道：

党对国家的领导不但在宪法序言中一再讲到，而且宪法总纲第一条明文规定着。……法院是国家机器之一，党当然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领导。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事实证明，

> 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仅不是违法，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和纠正审判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某些违法现象，从而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有人批评说，中国公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很少。周恩来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民主生活的内容比较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生活内容来，要丰富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占国家很少一部分的剥削阶级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的工人群众却没有真正的言论的自由”。与之相反，他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宪法只允许给广大群众享受自由的权利，而仅占人口总数极少部分的反革命分子却被剥夺了这一自由。中国领导政权中的有些批评者认为，在中国的选举制度中的限制投票和间接选举要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实施的全民投票式的直接选举来，民主程度不够。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尽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所谓全民投票式的直接选举，可是，当权的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各种方法控制住一切，特别是利用他们的钱包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以便保持他们的统治。不过，他又补充说道，他并不是反对直接选举这一方式。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也在实行这一方式，只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实行而已，他甚至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当条件成熟之时，中国也会逐渐地在较高级别的地方实行直接选举。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当时在县以下级别的地方实行的按人数选派代表制，即周恩来称之为直接选举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挑选方式而已。周恩来讲了下边一段话：

在选举过程中，由共产党、其他政党和人民组织之间协商的结果拟出一个候选人的联合名单来，是很合适的，在候选人这个问题上，从候选人的人数与将要选举的人数相同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这是联合协商的结果。

为了证实他所讲的中国公民享受有十分广泛的民主，周恩来引用了宪法条例加以证明。其大意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永远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他又说，一切国家机关在各自的工作当中，必定会遵守这条"群众路线"。但他也承认，"政府领导部门在对待群众的批判、建议、呼吁和信函方面，做出的工作还很不令人满意"。整风运动的目的正是为了尽快促使这方面情况的好转。按照周恩来的观点，整风运动是"中国民主生活的一次生动展示"，是"任何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也不敢做的一件大事"。但是，周恩来又并不把民主本身看作是目的。"我们并不是为了民主而实行民主。我们需要有广泛的民主，因为我们想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还说，民主必须同高度集中相结合，不然的话，"民主就将只能把人民变成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不能够用集体的力量来保卫他们的利益。"

有人批评说，中国"没有法律可以遵守"。周恩来在答复这种批评时承认，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还没有达到应该健全的程度。但是，他坚持认为，自从1949年以来，已经制定

并实施了许多重要法律。在这些重要法律中，有“工会法”、“土地改革法”、“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劳动保险条例”、“民族自治区管理条例”、“农业生产合作社模范条例”和“肃反条例”等。他解释说，有些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所以推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条件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周恩来例举了下列情况加以说明：

> 要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结束之前制定“民法条例”和“刑法条例”都十分困难。在这些条件之下，国家发布一些暂行条例、暂行决定和暂行指示作为人民广泛遵守的条款参考，非常必要、十分合适。只有当这些暂行的条例、决定和指示被证实为行之有效，我们才能进一步在它们上面总结归纳，制定长期实用的法律。

在讲到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时，周恩来坚持认为，中国正忙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拥有“十分丰富的先进经验”。但是，周恩来又批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并警告人们机械地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都是不行的，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因为他国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周恩来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因而，避免了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虽然他一再强

调了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作用很大，但是，他并不反对学习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周恩来说道，“当然，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应当向其他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经验，对人民有用的经验。”

第五节

具体实施惩罚右派

在右派分子被揭露出来、受到批判之后，中国政府又是怎样处理他们的呢？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现在既没有逮捕右派分子的打算，也没有消灭他们的意图。社论还说，“那些真心愿意悔过自新的右派分子”将得到一个“改造更新的机会”。“总有这么一小批不愿意改悔的右派分子，他们决心要抱住自己的反动观点，度其残生。”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甚至毛泽东本人也同样持有这种看法。陆定一说，“……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有一小批人的改造工作十分难做。有些人是至死也不愿意进行改造的。”这是陆定一在1957年9月16、17两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扩大会议上进行的讲话中的内容。毛泽东在1958年6月创刊的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说，毫无疑问，总有一些人是绝不改过的。他们至死也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

那么，如何对待这些不愿意进行改造的右派分子呢？中国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并不指望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把大

部分右派分子真正改造为好人。但是，只要把他们与广大群众分隔开，我们的斗争就赢得了胜利。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想要把不愿意低头的右派分子与广大群众分隔开呢？十分明显，这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远离右派分子，使他们不受右派分子的“腐蚀影响”。然而，只要人们更加细心地观察的话，就会明白，中国政府对那些“走中间道路的人”更为担心。一位领导人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分别转入了右派或左派阵营，大多数人却处在中间状况。右派分子正是在同左派阵营争夺中间派。他又补充说道，应当密切注意团结中间分子阵营，摧毁右派分子阵营，注意帮助那些愿意悔过的右派分子重新做人。林敏（译音）在党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于1957年发表了题目为《左、中、右》的文章。这位政府的支持者写道：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削弱右派分子对走中间道路的人的影响，特别要对那些中间分子阵营里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教育，进行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给予如此的重视呢？这是因为，“中间分子”占了现存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而且，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创立形成以前，还不能不要他们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在经济文化领域，在培训新生力量方面，仍然需要他们的努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就如何处理两种不同的右派分子的方法是改造革新和审查隔离，那么，政府就必定会明确地进行工作解决如何改造革新和如何审查隔离。政府采取的具体做

法，使人们得以明白右派分子是如何受到惩罚的。1957年7月17日，国务院通过了对大专院校毕业生、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惩罚的具体措施。这些具体惩罚措施叫做"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这一规定中说，那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在思想和行动上有反社会主义表现的毕业生，将会受到严格的考查。考查的期限可以分别为一年、两年或三年，考查期间，分配他们做辅助性工作，不给任何名誉。他们不能正式列入评级评薪之中，只给以生活补助费以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规定还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毕业生，应该留校考查。

打那时起，对于高等院校的每一位毕业生进行政治可靠性的审查，将成为正式制度固定下来。1957年7月19日，国务院要求所有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进行工作分配之前，都要做政治审查，并对审查作出结论。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大学，对本届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人民日报》还表示希望其他大专院校以北大为榜样。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在于总结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所表现的一切。在反右运动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或她对同一件事的看法等等，都属于审查的范围。第一步，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用书面形式进行自我审查，第二步，这份书面的自我审查要在小组会上宣读讨论，第三步，这份书面自我审查同小组成员发表记录下的批评意见一道，送到学校专管部门。最后由学校的专管部门对这份书面的自我审查和小组讨论意见进行审查。在解释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审查的原因

时，北大副校长马适安说：

> 我们国家培养干部和使用干部的标准，都是要注意到德行和才能两个方面。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时，曾提出不要政治条件，以便他们混水摸鱼。但是，我们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丝毫也不能忽视干部的政治条件。我们决不能让一个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担任他所不应当担任的工作。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表明，对于四类人将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这四类人分别如下：

>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
>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
>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参加劳动或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
>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活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虽然在这个决定的正文里面读不到"右派分子"的词条，但是只要仔细品读一下就会明白，这个新近发布的决定可以用来惩罚右派分子。比如说，在"无理取闹"的人们当中，当然包括了右派分子，因为，按照中国政府的看法，右派分子所做的抱怨是丝毫没有道理的。再比如，第二类人中包括的那些"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右派分子一再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可是，对于右派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又总是划有明确的界限。事实上，右派分子给中国政府出了一大难题，因为，他们如果按照法律的条文，没有犯任何罪行，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够在通常法律负责的范围内加以审判。《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即8月4日，发表的社论，表示拥护拘留和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这篇社论其实间接地接受并承认了惩罚右派分子的问题。社论中说，有事实证明，通常采用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对那些不愿意改过的人是根本不起作用的。采用简单的惩戒方法也不会起作用。

另一个惩罚右派分子的方法就是闻名四处的"下放"，或者说是把干部送到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下放"这个词是共产党人使用的。"下放"这个主意最早出现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1927年决裂的时候，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把党的干部送到下边基层去，以便于他更紧密地同群众联系在一起。在1949年以后的时间里，"下放"的主意和做法于1957年早些时候，作为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一个程序又介绍进入党内，其目的是为了"完全改变那种在领导岗位的干部与广大群众相脱离的局面"。如果说在反右派

运动尚未发动开展之前，“下放”就已经开始实施的话，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下放”才真正达到了高潮。据《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的报道得知，自同年5月之后，已经有30万干部被送到下级单位，包括“生产岗位”，去参加劳动、接近群众。又据新华社1958年的报道，到1957年11月份，“下放”的人数增加到81万人。而到1958年2月止，人数迅速上升130万。即使“下放”的最初动机仍然起着作用，那么，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却作为一个工具，用来疏散绝大多数的不能信任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劳动收容完全是作为惩罚手段，用于对付那些“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的右派分子，对付那些没有悔过自新表现的右派分子，对付那些积习难改的右派分子的话，那么，“下放”则是用来既惩罚又纠正教育那些“错误”不怎么严重的右派，惩罚教育那些公开“承认”过错误并能够表示改过的右派分子。“下放”这种形式还可以用来对待那些党内外的“具有右派倾向”（但不是右派）的人。

即使党的领导并不公开明确表明这些右派分子的最终命运是什么，右派分子心中都十分清楚他们决不会继续呆在过去工作的国家机关、或者科学文化领域，不会再担任过去的职务。《人民日报》早在1957年8月4日就曾发表有关社论。社论中说，毫无疑问，这些右派分子不可能继续留在机关、组织和企业里。但是，令人生疑的是，十分需要的科学家和技术骨干是否果真被迫离开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岗位；即使要求他们离开了工作岗领，他们也是很快回去工作的。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钱伟长，是一个导弹专家。据报道说，他很

快就回到自己过去工作的位置上。有本名叫《中国阴云》的书中还写道："有些人，比如导弹专家钱伟长等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被抓了起来。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大磨难，仅仅是进行了简短的再教育，并作了例行公事似的正式的自我检讨。他们并不一定要到'山里去，田里去'——象所宣传的那样——进行集体劳动，以便了解要受的屈辱和低头忍受的滋味，以便重新改造自己成为无产阶级者。毛泽东可以向大多数知识分子发动攻击，但却不是物理学家。因为毛泽东需要他们。"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在河流那边》一书中，也证实了那些"有用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宽厚对待。斯诺先生写道：

> 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对于公开指责的知识分子，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这当中只有很少——即使有的话——高级科学家或学部委员，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中国领导人决定把大多数右派分子从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调离以示惩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很难说明这个剔除"不可信任"者的行动是何时开始的。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资料日期是1957年11月11日。在这一天，《光明日报》的主要人物被撤换。《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一直是中国的民主党派经办。这两家报纸为所谓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进攻，提供了舞台。《光明日报》社里的3 名主要

右派分子，即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一个是社长，一个是总编辑，另一个是中国最大的民主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但是，这并不是说，在11月11日之前，就没有右派分子被撤换下来。报纸上报道的惩罚右派分子的消息，都是涉及到上层人物和重要组织时的事，这当然是十分自然的。更令人感到有趣的在于了解正式公布的行使惩罚的时间与右派分子实际丧失地位的时间之间的差距。很有可能的是，至少那些身居要位的右派分子在共产党领导证明了他们是不再可靠的时候起，就严禁他们再行使其职权了。可是，这些右派分子不大可能在当时就被撤换了下来，因为要宣布进行惩罚的决定需要许多其他程序，诸如提出指控，给受指控者时间和机会予以答复等等。但是，最为拖延时间的因素在于，党的领导要明确地相信这些受指控的同事确有受指控的事。只有通过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机关组织召开的“反右斗争大会”，通过一而再的批判，然后才能由党的发言人宣布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指控得到证实。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使人们怀疑，右派分子是否真在1957年11月报纸上报道了第一则有关惩罚右派消息之前，就已经停止行使自己的权力。新华社报道说，1957年10月22日，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把在最高级的党政机关工作的党的高中层干部，转派到下面的大学、专业学校、和其他科教文化机关去工作，“以便加强文化教育战线上党的领导”。报道还说，第一批到下面文教战线去的人数达1000人。在这第一批人当中，已经确定了137名干部。在这137名干部中，有108人安置在大专院校，和专业学校去任职，大中专学校共93

个；另外25人安排到20个科研机构工作；另有4人在3家报社去供职。在这137名干部中，有5名是副部长，10名部长助理，其余122名都是司、局级的负责人。在同一篇报道里谈到了3位副部长，及他们的去向。他们是：一、刘秉钿，财政部副部长，原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被派回母校任副校长；二、陆平，铁道部副部长，被送到北京大学去担任副校长职务；三、娄君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陆平在1960年，当上北京大学校长，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北大。《光明日报》报道说，1958年6月25日，20名中国领导人，包括康生、陈伯达、周扬、胡绳在内，除去他们自己份内工作外，还在一些大学里承担了讲课的任务。新华社十分明确地讲明这次工作调动的目的和工作安排的性质，使人们不会将这次工作调动与"下放"混同起来。"下放"是强迫党政干部到基层去，到生产单位去参加体力劳动。有人说，这次大规模的工作调动不仅仅是加强党的领导，还在于填补许多位置的空缺。因为许多右派分子过去都在科教文化领域担任要职，现在却被开除出去或被停职审查。

自从宣布了把右派分子从《光明日报》社的主要工作职务上撤换下来之后，其他惩罚右派分子的消息也相继见报。在受到惩罚、停职审查和撤销职务或资格的右派分子中，重要的是那些国务院的部长，全国人大的代表、委员，法制委员会的委员，著名知识分子，以及省一级的负责人。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主席令，解除了3位部长的职务。这三位部长是：章乃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章伯

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工业部部长。接着，一些副部长也被免去了职务。副部长当中有林汉达，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王汉（音译），监察部副部长。1958年2月1日，有57名全国人大委员（包括前文提到的3位部长）被取销了人大委员资格。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相继通过条例，免去了右派分子代表人民的资格。1958年3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免除政协组织内21名成员的职务。1958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检察院的5名检察官，和省、市一级的52名检察官被免除了职务。在知识分子当中（这里以文艺界为例），1958年2月13日，当时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丁玲被解除了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另外还有人被解除了同样的职务，比如江丰、陈沂）。除此之外，另有7名右派，包括丁玲、艾青、白朗，也被全国文联解除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的职务。再以科学规划委员会为例。新华社1958年3月5日报道，这个委员会已经决定开除曾昭抡、钱伟长、钱端升、陈达、费孝通、李曾仁（音译）、袁汉清（音译）和周淮民（音译）——这些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著名学者。对于各个省级负责人的清理早在1957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1958年10月。在省级负责人中，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解除了职务。

这些惩罚还不仅包括解除职务的处分，也包括开除出党的处分。虽然民主党派没有开除一名领导成员，但是，它们把这些领导成员从他们过去担任的党的一切领导职位上解除

掉了。在被解除了党内职务的右派分子中，有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谢雪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许德珩，九三学社主任委员；以及罗隆基、龙云、章乃器、林汉达、黄琪祥——他们分别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或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1958年1月31日报道，在1958年1月的13日至26日之间，民主党派已经把右派分子都解除了职务。

1957年9月，在共产党八届中央全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共产党决定把右派分子驱逐出党。但是，如果有些右派分子所犯错误并不很严重，如果他们能够较好地进行改造，并且能令人满意的话，可以不必考虑开除出党，而且可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十分清楚，尽管总的说来，右派分子都面临着被开除出党的危险，但是，党的领导则决定对那些情节不严重的人采取宽厚态度。实际上，人们发现，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严厉指控和批判的重要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丁玲、冯雪峰和艾青等，都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那些曾身居要位的党内官员，也没有享受到被开除的滋味。在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4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甚至没有一个人失去候补委员的身份。这4名中央候补委员是：潘复生（音译），河南省党委第一书记；冯百铸（音译）、顾大淳（音译），两人都是广东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副省长；以及赵健民（音译），山东省省长。不过，潘复生（音译）被解除了河南省党委第一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后来，潘复生被任命为黑龙江军区

第一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任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清理工作主要展开在那些在党的机关里或各自的技术专业上都不占据重要地位的右派分子当中。被开除出党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的显赫人物，也就是省一级的负责人。其实，他们在当时，也没有掌握本省的实际权力。比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就被开除出党。其他被开除出党的省一级负责人有：孙作宾（译音），青海省省长；杨思一，浙江省副省长；孙殿才（译音），甘肃省副省长；孙作宾是在1958年3月8日被开除出党的；孙殿才于1958年2月11日被开除出党。另外，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3月29日的报道，人民解放军内具有少将军衔的右派分子陈沂，不仅被开除出党，还被解除了军籍。

对于以上进行的惩罚，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是，这是遵循毛泽东关于人事稳定的一贯政策，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清理，而应观察这些人的行动。另一方面，为什么既没有开除优秀知识分子、也没有开除党的实权干部出党？因为党的领导人并不能确信开除这些人，能得到普通党员群众的支持。这些普通党员群众仍旧不能相信那些受到指控和批判的人的错误证明。

附

一百名大右派名单

（一）党内大右派

1. 艾青

延安时期著名诗人；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张黎群（音译）

新闻记者；《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3. 陈企霞

文艺批评家；《文艺报》过去的副总编辑；《解放日报》文艺栏目的编辑之一。

4. 陈模

新闻工作者；《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38年入党；中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5.陈子尊（音译）

《中国少年报》文艺部主任。

6.陈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7.陈涌

文艺评论家，《文艺报》编辑部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

8.贾潜

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9.江丰

美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委员。

10.秦兆阳

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总编辑。

11.钟惦棐

电影评论家，《文艺报》艺术部主任兼编辑，《文汇报》电影专栏编辑。

12.冯雪峰

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

13.徐懋庸

文学评论家，原武汉大学副校长，有20多年党龄的党员。

14.蓝 钰

新闻工作者，人民出版社总编辑，1938年加入共产党。

15.李 康（音译）

新闻工作者，《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兼总编辑；1936年或1937年入党。

16.李世农

安徽省副省长。

17.李玉任（音译）

作家，中央文学院教师，1928年加入共产党。

18.林希翔（女）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19.刘基（女）（音译）

剧作家。

20.刘宾雁

作家，《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成员，1944年入党。

21.刘绍棠

作家。

22.罗烽

作家。

23.龙英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24.梅朵

新闻工作者，1938年入党。

25.欧百川

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

26.潘复生

河南省党委第一书记，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河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成员，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27.彭子冈（女）

新闻工作者，《旅行家》杂志主编——该杂志系地理杂志，由共青团中央支持，《文汇报》编辑部成员，1938年加入共产党。

28.沙文汉

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共产党浙江省委常委。

29.孙作宾（音译）

青海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共产党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30.戴煌

新闻工作者；北京新华社记者；1944年入党。

31.丁玲（女）

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入党。

32.曾彦修

作家；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38年入党。

33.王汉（音译）

监察部副部长；1932年入党；八届中央检查委员会候补委员。

34.王若望

作家；新闻工作者；《文艺月报》杂志总编辑，1937年入党。

35.吴祖光

剧作家；戏剧导演。

36.杨思一

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二） 党外大右派

37.张轸

河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38.章乃器

粮食部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39.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40.张云川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41.陈振汉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42.陈其尤

中国致公党主席。

43.陈仁炳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4.陈铭枢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45.陈明德（音译）

《新闻报》总编辑。

46.陈达

社会学家，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47.陈体强

文学评论家。

48.陈兴林（音译）

湖南省副省长，民革湖南省委常委。

49.钱家初（音译）

中国科学院科学委员会委员。

50.钱孙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51.钱端升

政治学家，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52.钱伟长

科学家，机械工程学界的著名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科学规划

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53.邹庆文（音译）

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教授，民盟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54.储安平

新闻工作者，《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55.费孝通

国际知名人类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56.冯友兰

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57.韩兆鹗

陕西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58.向达（音译）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59.肖乾

新闻工作者，短篇小说作家，《文艺报》总编辑，1939年至1946年期间任《大公报》驻伦敦记者，中国民主同盟委员。

60.谢雪红（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委员。

61.徐铸成

新闻工作者，《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主任，全国人大委员。

62.许德珩

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任委员。

63.黄琪祥

原军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64.黄绍竑

原军人，1927年至1931年期间任广西省省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65.黄药眠

文学评论家，北京教师培训学院中国文学教授，《文艺报》和《文学研究》编辑，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66.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讲师。

67.顾执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

68.兰茵（音译）

作家，先后担任《文艺生活》和《边疆文艺》编辑。

69.雷海道（音译）

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70.李景汉

社会学家，原辅仁大学社会系系主任。辅仁大学现已撤销。

71.李伯球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委员。

72.李曾仁（音译）

内科专家，原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73.林汉达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74.刘王立明（女）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中央常委会委员。

75.罗隆基

森林工业部部长，政治学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76.陆侃如

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委员。

77.陆治

新闻工作者，《新闻报》副总编辑。

78.龙云

原军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79.马哲明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80.穆木天（音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教授。

81.白朗（女）

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

82.潘光旦

社会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83.潘大逵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84.彭文应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85.毕鸣岐

商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委员。

86.浦熙修（女）

《文汇报》副总编辑，《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87.沈志远

经济学家，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成员，上海《学习月刊》编辑，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委员会主任委员。

88.孙大雨

复旦大学教授。

89.宋云彬

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政协浙江省副主席。

90.谭惕吾（女）

律师，中国政法学会主任，全国人大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91.谭天荣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92.唐因

作家，《文艺报》编辑部委员。

93.陶孟和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94.曾昭抡

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原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科学规划委员会成员，中华全国科学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委员。

95.王铁崖

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96.王造时

复旦大学教授。

97.王毅斋

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教务长，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98.吴景超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原教授。

99.叶笃义

全国人大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100.袁汉清（音译）

科学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第五章

反右运动的初步结论

第 一 节

反右运动的作用

评价反右运动似乎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因为右派分子之所以同党的路线发生冲突，根源在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它重视人民大众的参与性，甚至认为只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参加，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这方面与马克思和列宁的见解形成鲜明对照，他不仅信任农民群众，而且认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他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归功于农民阶级的参加，而把城市人民所发挥的作用视为第二位的。实际上，他蔑视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太信任城市无产阶级，在他看来，这两种人都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毛泽东与列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并不那么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他的信念具有二重性，既相信党，也相信群众。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尽管毛泽东

本人并没有精确地阐明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并没有将“无产阶级觉悟”归功于群众，而是归功于党，他却理所当然地相信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最终决断党及其领导人是否具有革命精神。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他那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种信念上的二重性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的一个明显特点：不时发生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高潮，紧接着又是党的组织施以严厉限制。1957年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以及随后对批评者展开的进攻，充分说明了这一明显特点。其它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毛泽东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向他所认为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倾向的党的组织展开了攻击。他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已认为党的组织毫无作用了。他鼓励人民“炮打司令部”时，所要求的仅仅是清除司令部中的走资派。而当红卫兵们表现出了完全不负责任的言行时，他马上对他们的活动施加限制，这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所希望的是将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这对矛盾就同其它的矛盾一样，是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的。

但是，毛泽东这种对民众的信任却不是那么有利于他那决心通过社会变革和经济现代化来达到民族的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这种历史使命要求他认真寻求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才、治国专家、文化名人和教育界精华的拥护和合作，而这些人毕竟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更有甚者，其中的大部分在政治上还算不上是“进步的”，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所占比例

很小。要得到各界名流的合作，就必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做出让步。而保留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保留他们的价值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有损于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所据有的正统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用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改造社会名流，是让他们和广大的农民群众融为一体，是弥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消除技术特长与革命觉悟之间的鸿沟。

毛泽东的这种旨在使迅速的现代化步伐服从于保持革命纯洁性需要的良方，被"自由鸣放"证明并不能奏效，因为鸣放中暴露出来的严峻现实证明，尽管党做出持续努力来进行思想灌输，知识分子仍然拒绝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来建立集体主义精神，也拒绝把自己变为革命运动的简单工具。这说明促使知识分子同心同德的方针遭到了失败，原来进行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这一点也为中国政府的拥护者们所承认。党员作家李范富（音）在1957年第20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略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文中写道："然而事实上，过去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对右派分子产生的影响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对党和人民更加敌视了。"使党的领导感到尤其痛心的是，不仅在资产阶级环境中长大、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为思想改造所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也浑身沾满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陆定一1957年9月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

从目前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甚至社会主义社会都可能产生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新的知识分子。例如，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刘宾雁、郭伟(音)等人就属于这种人。他们中有些青年时代就到了革命根据地，后来在那里长大，有些人则是解放后才长大成人的。他们全都在社会主义社会受的教育，但却变成了资产产阶级右派分子。

毛泽东本人也说过，毫无疑问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宁肯带着花岗岩脑壳去见上帝。据《人民日报》1927年8月6日报道，原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于同年7月16日被打发回家反省自己的罪过，但他并未思过，而是全力以赴地撰写起东汉史来。这条消息读来令人饶有兴味。

百花齐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虽然使人感到失望，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这些涉及到右派分子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冲突的问题，特别是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观点冲突的问题，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到延安时代。而党的领导人们也了解这些观点冲突历来就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所以仍然感到失望，是因为没有料到正在涌现的年轻一代作家和艺术家居然会信奉老一代文化名人的异端邪说和他们倡导的创作自由，年轻一代作家和艺术家本来是与"没落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毫不相干的。象丁玲和艾青这样的老作家，早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时代就从理性的角度拒绝党的严厉

的纪律约束，他们抗议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们对专业人员的指教，不愿把自己变成革命运动的简单工具，也不愿让文学创作仅仅变为宣传资料。从那时起，他们就怀着充分的信念和勇敢的决心为自己的目标而战斗，直到百花齐放时期。当然，在这样长的时间中，他们也免不了受到压力，检讨错误、做出妥协。与此同时，来源于延安革命根据地时代的这种思想冲突也逐步演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是文化界以丁玲及其支持者为一方和以周扬及其同事为另一方的较量。后者无疑是坚持党的正统观点的人物。丁玲由于其思想观点上的异端邪说，从没得到过党的领导的完全支持，但因此就认为她不会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那就彻底错了。她虽然不时遭到批评指责，却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们的高度尊敬，也经常因为她的专业才干和组织能力受到褒奖。她和周扬之间势均力敌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952年。此后周扬逐渐占据上风，到了1957年，她就从共产党中国的文化界彻底消声匿迹了。从这种情况看，也可以说反右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斗争，而且也是党内的一种宗派斗争。

毛泽东实施百花齐放方针没能象他预期的那样争取到知识分子之后，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去安抚知识分子，也没有因此就失去对思想改造的重要潜力的信心。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要尽可能深刻地灌输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仍然要确保革命的纯洁性。为了确保这种奋斗目标，他逐步创立起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对技术熟炼的专业人员依赖较小，而对非熟炼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依靠较多。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就是将这种新型模式

运用到现代化任务中的典型例子。如果说以前的模式是强调大规模的工业化，现在的模式则旨在实现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的迅速发展；如果说前者的成功取决于大量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诀窍，后者所需的则是大量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说前一个过程是将专业技术放在首位，后一个过程则将专业人员的作用下降到第二位。我们至少可以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标志着这场实现现代化的崭新尝试的暂时结束，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奋斗目标，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培养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又红又专”的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技能的党员干部。他所用的方法，一是加强对现有专业人员的思想灌输，二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培养和造就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否成功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至今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专业技能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冲突毕竟是永恒的客观存在，人的专业知识越多，对政治灌输的抵触情况必然就越大。

第二节

反右运动的实质

党的领导在整个反右运动中做出不断的努力来证明，就象毛泽东所洞察的那样，右派分子对整个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们这样做究竟是要达到何种目的？是否是为在肉体上消灭右派分子提供理论依据？显然不是。如果中国政府的目的在此，那就会把右派分子等同于反革命分子，那就会在草率地审判之后对他们处以死刑。事实上，共产党官方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别，仅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并不想消灭右派分子。另外，从右派分子受到的处理看，也能证明我的这种观点。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形成天壤之别，他们虽然也被定为人民的敌人，却受到了最为宽容怜悯的对待。如果从理论上来解释对他们进行区别处理的原因，那我们就可以说，从理论上看，反右运动是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整肃右派分子的错误，而不是消除他们本人。《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的社论就说过，"治病救人"的方针仍适用于一般右派分子，而反右斗争恰好是一般右派分子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当

然，这其中也不乏另外的实际考虑。首先，党的领导没能说服一般公众、尤其是普通党员相信右派分子犯下的罪行已相当于反革命罪。其次，反右运动的目的在于遏制右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以便争取知识分子里面的中间派。因而党的领导有所担心，如果对右派分子采取残酷斗争的方法，作为“既不左、又不右”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就会对右派分子萌生同情，而不是进行谴责。中国政府的拥护者孙启蒙（音）曾在1957年10月号的《工商界》上写道：

> 我们不赞成残酷斗争的办法，因为这种方法是有害的。这种方法的害处何在？首先，这种方法不利于我们争取中间派，残酷斗争不利于帮助中间派认识右派分子的反革命言行。残酷斗争甚至会造成某些中间派的担心，由此对右派分子产生同情。其次，残酷斗争不利于锻炼我们的反右队伍。

1957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号召人民不要使用“急躁、残酷和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时，也发表评论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人的目的，才能击败处于少数的右派分子。

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大体可以说是一次思想改造过程，是与以前反对地主、反革命和大资产阶级迥然有别的。如果说以前各次运动的攻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那些障碍，1957年反右运动的攻击目标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宝贵人才，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共产党人至少在夺

取政权以前就有了。因而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坚决执行争取知识分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但是，在党的领导人看来，知识分子由于生长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如果不改变思想倾向，就不可能成为受人信任的公仆。所以继之而来的，是党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来促使知识分子摆脱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习气，促使他们成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理想工具。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阶段，只是以消极的方式进行的，但运动中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口诛笔伐，而不是强制审判和肉体灭绝。在整个这场运动中，党的领导一方面本着以理服人的原则，竭尽全力驳斥主要右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翻出他们过去历史中的老帐以诋毁他们的名誉，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败坏"中间派的思想，防止他们混淆参加斗争的人民群众的视线。尽管继这场思想交锋之后进行了清洗，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彻底排斥被清洗的人，而是暂时将他们与其他人隔离开，以便使其他人少受他们的言行的影响。据《北京周报》1958年第26期报道，到同年后半期，运动中被定的许多右派分子已经被摘帽，也恢复了原来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时不能担任的工作。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还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大赦。中共中央于1959年9月17日做出如下决定：任何人只要改过自新，并能在言行上有所表现，从现在起将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就是说应该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新华社又于同年12月4日宣布，包括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在内的共142名右派分子已经摘帽。早在同年4月11日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3届全国委员会名单时，其中就有罗隆基、章伯钧、费孝

通和钱端升等著名右派分子，他们代表中国民盟与会。埃德加•斯诺也于同年10月写道，政府宣布为2600人摘去右派帽子，不过他并没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斯诺在《在河流那一边》一书中还证实象章伯钧、罗隆基、钱端升、萧乾、冯友兰，费孝通等著名知识分子也已摘帽。党的领导这样做，是盼望右派分子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过"，以便证明他们确实犯了错误和罪行，从而印证党的领导人的观点，从而争取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和有些听话的人民群众。

第 三 节

反右运动的后果

短暂的"鸣放"时期一过，取而代之的是向持异端邪说的人发起进攻活动，这对于知识分子标志着从持批评意见到循规蹈矩的转变，对于政治气氛则标志着从温和口吻到激进主义的过渡。指责那些"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无异于提醒那些没有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人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易受攻击的弱点，从而在公开讲话中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从而被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的探索中畏首畏尾。长此以往，知识分子们也就学会了避免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公开谈出个人的看法；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甚至转而搞起那些不会产生争议的中国古典学问来；年轻人也不再对政治发生兴趣，而是沉浸在淫秽书画之中（见《文汇报》1958年元月24日报道）。在文学艺术界，原来的专家领导也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有马列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而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

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就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它们中有在北京出版的月刊《争鸣》、在上海出版的半月刊《萌芽》、在太原出版的月刊《火花》和在成都出版的月刊《星星》。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小，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做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的发行量剧降到1958年元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

中国政府为了纯洁文化和教育队伍，从党政机关抽调了大量的、信得过的高级干部，派往教育、科学和文化部门工作。对于公众用以表达意见的新闻媒介，也加强了特别的管理。1957年12月9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向该省第二届党代会第2次会议作报告时指出：

> 各级党组织坚决要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要把右派分子和政治上靠不住的人从各编辑部撤下来，要任命一批政治上经过考验的干部来掌管新闻出版工作。广播电台和各转播台也应该进行整顿。新闻广播工作是一项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监督。

在教育界，随之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的在于将6亿人民变为“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于是，各学校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和农场，而原来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也相继办起自己的学校。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现象：学生们同时又是工人和农民，工人和农民同时又是学生。各教育机构着眼于从劳动阶级中培养知识分子，也就在入学方针上更加强调工农及其子弟的优先录取权。江华说：从现在起，高等教育机构、中等专业学校和其它学校必须优先录取工农干部、工农子弟，和参加过体力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

还进行了纯洁党的队伍的运动，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特别的整顿，纳新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江华说：

> 总的说来，到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这段时间，不应该接纳新党员，以便腾出精力来整顿党的组织。至于说到预备党员们，为了防止不合格的人混入党内，必须加强教育、严格考察和履行必要的入党手续。

反右运动给全国造成了一种激进的气氛。党内的激进派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温和派由于对最近的自由化运动负有责任而遭到了削弱。1958年5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目的在于纠正党内的温和路线，使激进派的一统天下局面得以明确建立。那些取代右派分子而升任各条战线领导职务的人当然

也就忠实于新的激进路线，河南省的情况即是如此。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吴芝圃取代，省长职务也由他兼任。吴后来成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站出来批评党的激进方针，反倒是行政部门和管理人员的保守主义时常受到攻击。然而，如果以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目的在于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这样的激进运动铺平道路，即先把那些有可能反对激进运动的人清除掉，那就完全错了。因为开展反右运动的决定在先，而进行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决策在后。似乎可以这么说，除了其它方面的考虑，党的领导在"争鸣"时期才意识到：力争颇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合作，以便为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服务，是在甘冒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利益的风险。而且，党的领导还认识到，更加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有利于保持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人民大众的参与性这一特征。正是在"争鸣"过程中产生的这两种认识，促成了随后的大跃进和公社化那样的激进运动。

附

反右运动大事记及《人民日报》主要社论

一、反右运动大事记

1957年

6月

8日 《人民日报》指责所谓的对卢郁文的威胁，并号召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9日 《人民日报》敦促"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正确的反批评"。

11日 《工人日报》敦促工人阶级起来反击右派。

13日 章伯钧发表简短的检讨书。

14日 《人民日报》批判《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中国民主党派的机关报。

1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进行自我检讨。

18日 正式发表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

2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会举行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一直持续了5天。

25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创立一支新型警察部队，称"人民警察。"

26日 举行一届人大四次全会，周恩来总理向全会提交政府工作报告。

7月

1日 《人民日报》揭露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企图推翻共产党的右派阴谋。

3日 章伯钧向全国人大的江西省代表们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做检讨。

4日 《人民日报》公布章伯钧1957年6月6日"紧急会议"细节。

6日 北京和天津首映纪录片"与右派言论做斗争"，该片继后在全国各地放映。

12日 自该日至15日，主要非党右派分子在人大会议上做检讨。

15日 人大会议闭幕。

26日 国务院号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反右运动。

28日 《人民日报》号召农村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8月

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劳动教养办法的规定，说要建立特殊的农场和工厂来改造反革命分子、流窜犯和社会上的其他坏分子。

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会议上对著名党员作家丁玲的批评报告。

8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

27日 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中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9月

1日 《人民日报》要求捍卫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4 日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在武装力量成员中开展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

11日　《人民日报》要求对党内的右派分子采取严厉行动。

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展到工矿企业。

14日　中央发出三项指示，要求改进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将合作社的规模缩减到“一村一社”，以及用增加经济刺激的办法将上中农挽留在社。

18日　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而代之以反右运动的文章。

20日　内务安全部在北京举办展览，提供了26万件证据说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理当受到镇压，“以驳斥右派分子在镇反问题上散布的荒谬言论。”

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向三中全会提交报告，说明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

10月

6 日　《人民日报》宣布，北京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将有30－50%被调到工厂和农村工作。

9 日　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闭幕。

1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22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颁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28日　国务院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规定》。

11月

1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社会主义学习材料目录。

8 日　公布企业的部分放权规定。

9 日　促进科学研究的计划制定完毕。

18日　章伯钧和储安平分别被撤去《光明日报》社社长和总编的

职务。

12月

17日 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在所有高等学校教授为期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30日 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罢免省长沙文汉和副省长杨思一的职务，二人均为中共党员。

1958年

元月

13日 从即日到26日，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右派分子相继被免去党内职务。

27日 中共安徽省委做出决定，撤消李世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的职务。

29日 国务院做出决定，免去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并将这一决定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

31日 人大常委会批准撤消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毛泽东发布命令，实施国务院决定。

2月

1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开幕。

会议通过决议撤消10名右派分子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其它委员会的职务，撤消其在国防委员会的职务，同时决定包括这10名在内的共30名右派分子不得参加本次会议。

毛泽东发布指令，取消龙云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取消黄琪翔的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人民日报》主要社论

1956年7月12日

《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的活动》，
1956年8月2日
《珍惜人才、妥当分配》
1956年8月12日
《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
1956年9月29日
《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
1956年10月9日
《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
1956年11月5日
《庆祝匈牙利人民的伟大胜利》
1956年11月21日
《苏波会谈的国际意义》
1957年4月10日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13日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957年4月17日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1957年4月27日
《大胆放手，开放剧目》
1957年5月2日
《为什么要整风？》
1957年7月5日
《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1957年5月13日
《谈职工闹事》
1957年5月19日，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1957年6月8日
《这是为什么？》
1957年6月9日
《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1957年6月10日
《工人说话了》
1957年6月11日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1957年6月12日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1957年6月14日
《是不是立场问题？》
1957年6月22日
《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6月29日
《再论立场问题》
1957年7月1日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1957年7月8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1957年7月10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1957年7月16日
《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1957年7月23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1957年7月28日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

1957年8月10日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1957年8月16日

《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1957年8月29日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1957年9月1日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1957年9月11日

《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1957年9月15日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1957年9月18日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7年10月3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

1957年10月6日

《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1957年10月11日

《克服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

1957年11月1日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

1957年11月12日

《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